



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六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六

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

方志敏　邵式平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南昌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六

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

方志敏　邵式平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字数163,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7110·303　　定价：0.52元

目　　录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

方　志　敏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①

第　二　章

第一节　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

中国自被帝国主义侵入后，就象一个人的身体被肺痨菌侵入一样，一天一天地精枯血衰，瘦弱下来。到现在痨病已进入了三期，血肉俱竭，只剩下一把瘦骨，日益迫近死期了。国民党所宣传的什么公路建设，都市建设，不过是肺痨病者脸颊上所泛起的血潮而已，表面上好象好看，实在是更快要死亡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必须找到本地的帮手，就象强盗要抢劫人家，贼儿要偷取人家的东西，必须找到坐地的线眼一样。帮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好的帮手，那就是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阶级，他们替帝国主义强盗们作经理，把货物运销到中国各地，又从中国各地收买各种原料供给帝国主义，这□□□□□②义的嘴□吸取一点

①《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及第一章，已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编的《方志敏狱中遗著》一书中发表。（江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②□此符号代表此处原稿中缺一个字。（下同）

漏出来残唾。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保镖人，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布满全国的吸血管。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血液就被无数的吸管吸收了去，转输于帝国主义便便的腹中。因此，帝国主义要资助保护中国的封建势力以作侵略工具。最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与封建势力一起，投入于帝国主义的怀中结成三位一体，共同来榨取中国工农群众了。

在帝国主义无孔不入地侵略下，在军阀官僚贪婪的搜刮下，在豪绅地主资本家无厌的剥削下，就造成中国农村大破产，无数千万农村中的工农群众，穷得一场精光！一般手工业者的工资极为低下。贫农雇农都是没有或缺乏田地，向地主、富农租田租地来种，结果只是白费气力，亏本赔钱，他们因穷而借债，借债使他们更穷，他们还要交纳刮民党的七捐八税。加上连年不断的水、旱灾荒，更加不能生活，于是树皮、草根、观音土，都成了救饥的粮食。饿死冻死病死的，一来就是几百万人！就是各国前期的农奴，也比中国农民的生活要较好些，要有保障些，中国工农的生命真象树叶子一样，轻死一个人就象一皮树叶子从树上落下地来，再也引不起谁的注意。有一位先生自恃聪明，作了一篇特创的反俭朴论，文中曾说："一个乡下人的俭朴，西洋人不但没有看见过，也决梦想不到。孙子身上的棉袄，是祖父娶祖母时缝的。祖母赔嫁的被窝，仍旧铺在孙媳妇的床上，里面的棉絮，就象一块烧焦了的木板。还有老鼠咬坏了的木床，更不知是那一代传下来的。二百年前盖的木架房子，东撑西补……"（这位先生说这是农民的故意俭朴，阻碍物质的进步，应予以反对。但我却很奇怪这位先生竟会这样愚蠢，不知道"乡下人"的如此"俭朴"完全是他们赤贫化的结果！）除了这位先生所写的而外，"乡下人"还有许多"俭朴"：

一块小猪油，可以涂几十回的锅，（在锅内涂一个圈就铲上来，即放菜下去）整年不见肉面；不买盐而吃淡菜；热天不穿衣服，宁愿让太阳晒脱一身的皮；晚上不点灯，宁愿黑摸，生病不吃药，宁愿病死；荒年就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租和债逼紧时，就出卖儿子老婆，或吊颈投水而死。这样"俭朴"，这样轻生，大概那位先生更加要皱眉吧？！是的，中国工农群众，早也起来反对过分"俭朴"和轻生了。他们在共产党指导之下，逐渐觉悟起来，他们要求过较好的生活，要求不饿不冻，要求不吃树皮、草根、观音土；要求不出卖儿子老婆；要求不吊颈投水，总之，他们要求生存，要求不轻易死掉。要达到这个要求，就要革命，要革掉豪绅地主高利贷者的命，把他们占有的土地没收过来，实行平均分配，把高利贷者的债务取消，不再受重利的剥削，不再交捐税给刮民党。因此，就要求实行武装暴动，就要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自己的工农红军。以保护从武装暴动夺过来的利益。

弋阳九区的工农群众，在革命前受到的压迫和剥削的生活的痛苦，正如上述，心里所怀的愤恨和不满，急待发泄！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北伐军到江西后，就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纷纷捕捉平素为他们所切齿痛恨的土豪劣绅，多数罚款，少数并处死了。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九区首先遭到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在这一次进攻，工农群众集合了三千余人，用土枪土炮，配合一连哗变来的军队作战。因无健全的领导，以致被敌攻入，烧去了三十余村的房屋。加上一个农民领袖——方远杰同志，又因试放土炮，装硝过多，炮管炸裂，受伤而死，运动曾有一时的沉寂；但革命的怒火，仍在各人心里燃烧着。以后，我由吉安潜回九区，又恢复工作，

重起运动，接着又遭大劣绅张大纲引兵进攻，又烧去了几村房屋，后张大纲所勾来之兵退走，群众立集三四千人反攻，将张劣绅及其爪牙驱走。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宣传工作，有五十余村的农民革命团成立了，虽未成立苏维埃，但他们实际的统治了乡村。在暴动中他们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解决了急要解决的问题。从此就遭受了白军长期的进攻和蹂躏，七十一村的房屋，被烧去了六十八村，有的全烧，有的烧去十分之八九，有的烧过四五次的，只剩三村未烧。被群众驱走的豪绅地主，一旦挟兵回来，群众又躲避不见面反来抗战，乃施用烧杀淫抢手段，以作报复。在共产党顽强不屈的领导之下，敌人愈残暴，斗争愈激烈，到底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白军虽用四十倍的兵力，进据九区各村，搜山捉人，不间一天，然而终无效果。白军士兵又有部分哗变，卒至败逃。有领导有组织，顽强斗争的群众，好象一座焰红红的火炉，任何反革命的东西投进去，终被融毁！就是目前敌人筑碉进占九区，我可以预断，这些碉堡，在群众不断的打击之下，仍将归于消灭无踪。

第二节　一九二七年横峰的年关暴动

在二十五天极短期的准备下，接着弋阳九区暴动之后，横峰来了一个六七万人的年关大暴动！横峰工农群众在革命前生活的穷苦无告，不弱于别地，一听到共产党的煽动，立即秘密组织武装的农民革命团。一声号令，六七万有组织的武装群众，一致起来捕捉豪绅地主，抢借字，抢田契，杀猪起伙食，整顿队伍准备与敌军对阵，同时出发各未革命区域打土豪，十分威风。在工农群众未团结之前，豪绅地主吸血虫们，个个都象老虎，谁也不敢在他们老虎头上拣饭生；在

群众团结起来之后，他们就闻风生怕，不敢照前横行，等到群众暴动起来，他们就由老虎变成了小鼠，捉到的叩头乞怜；未捉到的不顾命地逃窜一空！谁说我们无力？谁说他们的统治牢不可破？谁说少数人应该永久统治多数人？只要我们觉醒起来，团结起来无畏惧的（毫用不着畏惧）斗争起来，我们一动手就可以把他们从高高的宝座上拉滚下来。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世界是我们创造的，虽被他们霸占住，这要看我们知不知道敢不敢伸手去夺。如果我们都知道而且都敢一齐伸出手来去夺，谁还有力量拦阻着不交还我们！横峰的年关暴动，使群众十分清楚地认识：谁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应用什么方法去打倒它？打倒它之后立刻就会获到何种利益。

横峰的群众暴动，因无主力红军作斗争骨干（当时只有二十余杆枪，未成军队），只经过三个多月就被敌人暂时镇压下去，但不久又起来斗争，终成为赣东北苏维埃可靠的根据地。

第三节　一九二八年——极端艰苦斗争之年

敌人知道苏维埃是危害他们统治最可怕的敌人，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份，就开始对我们残酷的进攻！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小游击队，枪三十余枝，（添买了十余枝枪）战斗力极弱，敌人却有一个足团，（枪一千二百余枝，近四十倍的兵力）来进占我们横直只有七八十里的根据地。所有的重要一点的村坊，都被扎了敌人。这一年的环境，是十分险恶艰

苦的。在这年内，我们没有走过大路，只走山僻小路；没有住过房屋，只住在山巅岩下的小茅篷。一面是我们的坚持领导，一面是敌人定期的军阀混战，每进攻二三个月，就开走了，给了我们一点喘息的时间，以便我们整顿队伍，作第二次的迎战。敌人一面惧怕我们的发展，一面又藐视我们，认为不值一击。每次进攻，敌人总是怀着狂妄的心思，以为一下就可以消灭我们。但每次都遭到我们有力的抵抗和打击，粉碎他的阴谋企图。在这年年终，有一连和一排白军哗变过来，这不仅使他们从革命区内溃逃出去，并增长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小，同时，德兴有三十余村的群众暴动，增加了几十里区域。

在这年的三月，虽开了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但实无一点工作，斗争的领导，全由党直接当任。

第四节 一九二九年——开始新的发展之年

在一九二九年的上年，敌人仍猛烈进攻。群众因经过一九二八年长期的斗争，斗争经验加多了。红军又因添加一连一排白军的武器和战斗员，战斗力有极大的增强。同时，弋阳贵溪的秘密工作，有大的发展，敌人经半年筹备而来的砍树运动，遭我们击破后，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威信，大大的提高，国民党县政府，在群众眼目中看来，不但可厌，而且无用。在秋收时节，首先，贵溪发动七万余人的秋收暴动。接着弋阳八万人的暴动也起来了。在两三个月间突然扩大了三倍以上的苏维埃领土。到了年终，又爆发了万年、余江的年关暴动。横峰苏区，向外发展不小，上饶也有百余村的群众起来斗争了。德兴苏区也扩大了一倍以上。各地的秘密工作也在发展着。

我们的红军，继续打了好些胜仗。尤以贵溪周坊之战，消灭了敌军一个整连，第一次夺获了敌人一架重机关枪。大家都很快乐，军委会主席邵式平同志，看到送机关枪来，乐得在地上打滚。在周坊胜利之前，曾攻下横峰城，把横峰县衙门的官吏吓得连爬带滚地逃走。红军由三连发展到六连。各县还成立了小的游击队。

我们开始筹备召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准备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

第五节　一九三〇年——大发展之年

一九三〇年一月初，我们召集第一次全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代表三百余人，庄严热烈，可称空前。此会选举了苏维埃委员，正式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从此，我们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建立起政权的领导了。

因蒋阎冯在津浦线上大混战，抽调了一部分对我们的兵力。剩下来的军队，数近一师，然区域太宽，不敷分配，形成各方面的空虚。我们的红军独立团，又严加整顿训练，迭次胜利，士气极高，战斗力较前大为增强！自“五五”乐平秧坂战争胜利后，兵力所指，无不奏捷。先后攻克上饶、河口、弋阳、余江、乐平、德兴、景德镇、鄱阳、秋浦、彭泽等城市。七月中即成立红十军。苏区的发展，横直达五六百里，人口约一百万。可惜当时执行立三路线的领导，又因斗争经验不足，以致对于分配土地，开展群众的阶级斗争，锻炼加强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与工人群众武装斗争的准备等工作都做得十分不够。新苏区的巩固程度是薄弱的。自蒋介石深感全国苏维埃和红军的威胁，迅速结束自己内部的军阀战争，用全力来对付新兴的革命势力后，我们又受到十倍以

上的敌军的进攻。烧杀淫抢。备极凶残，新苏区亦失去许多，老苏区因群众基础坚强，虽受尽白军蹂躏，仍能支持。此年环境极顺利，若能得正确有力的领导，红军的胜利与新苏区的发展巩固，必有更可观的成绩。

在八月一日，我们曾开了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江西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这是依照立三路线的指示做的。

第六节　一九三一年——发展了闽北苏区

在这一年内，中央红军，接连击破敌一二三□□大举进攻□□□□□□□消灭了一部分，其余的驱逐□□□利是大大落后于中央区了。主要的原因，还是军事领导不强和右倾，缺乏战争计划。故未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一个领导国内战争的党，如果它的军事知识，组织和领导战争的艺术，战略战术的了解和运用，有欠缺不够者，它的胜利自然是要落后的。

在五月初，我红十军渡信河而南，第一次出征闽北。这一次战绩极佳，消灭了许多敌人，将闽北苏区从危急中巩固起来，并奠定了它以后向前发展的基础。闽北红军，亦因红十军的独立营留下作它的骨干，很多成为可畏的红军。

三一八开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十月革命纪念节，又□□□大会同时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许多重要决议。检阅过去工作的错误，指出今后工作的方针，并□□□□了领导机关。

第七节　一九三二年与一九三三年

这两年间，因为党的领导，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

故苏区没有多大发展，且缩小了一部分；红军的胜利，也极不够，应记载之事，计有下列各项：

（1）开展了肃清地主残余，反对富农的斗争，依照阶级斗争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检举党及群众机关中异己阶级的分子。

（2）开展了肃反斗争，将隐藏在红军和苏区的反革命组织破获了，保证红军和苏区进一步的巩固。这次肃反，当然免不了有错误的地方。如肃反中心论，肃反工作的扩大化和简单化，造成群众间一时的恐惧现象，后来也就纠正了。

（3）接着肃反胜利之后，红十军第二次出征闽北，大大地巩固与扩大了闽北苏区。

（4）红十军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间南渡，与中央红军集中行动，牵制了敌之三个师，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取得宜黄的绝大胜利，将敌人四次围剿，最后的予以粉碎。

（5）红十军南渡后，我们就开始创造新红十军的努力，经过半年来的战斗，坚强的新红十军建立了。

（6）余贵的南岸与金资各县，开始了游击战争，后转成了暴动。因群众的组织教育工作，都没有切实认真去做，工作人员过分估计了斗争形势，致一个小区域的暴动，遭敌镇压而失败。

（7）苏区工会工作的改善，建立起真正的群众的阶级工会，提高了工人阶级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

（8）苏维埃各部工作的建立□□□□□□□□□□□□□□□□□□□争的同时并进，苏维埃在群□□□□提高了。

第八节　一九三四年——五次战争之年

一九三四年，为五次战争残酷决战之年，以战争动员的广泛和深入的程度而言，以战争的持久和激烈而言，以双方兵员伤亡数之众多而言（敌之伤亡，较我多十倍以上，多数为五百队群众的地雷队用地雷打死打□□都比较从前战争为大。我们苏区根据地，虽被敌筑碉前进，造成许多封锁线，遭受白军野兽般的践踏和摧残，但他们所付的代价是不小的。我们□□□□□□□□□□□□□□□！这一年战争，全苏区的□□□红军和工农群众，都无□于受了一次军事大学的教育，许多新的战争经验，是学会了。

因为执行中央一九三三年七月反保守主义的指示信，皖赣、皖南、浙西的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了。并创造了新苏区，这使那一带豪绅地主资本家们，不能安心地收租逼债，榨取工农的血汗，就是浙皖两省的法西斯蒂的"当局"，在陪着他们的姨太太睡觉时，也要三夕三惊，深感不安呢！

目前，赣东北苏区，虽被敌筑了五六千个碉堡占据着，但这些碉堡都不能一日无兵，只要早晨离开了守兵，中午或晚上，那个碉堡就会被群众挖倒下来！现在还限制了敌人四个师，不能抽动，我相信久经战斗的赣东北党，它是会领导红军和那"战斗只剩我一个人，还是要战斗的"群众，将敌人全部消灭，将碉堡全部拆毁，而恢复原有的苏区。做到这些，并不在很远的将来。

建设我们铁的红军

志　敏

现在差不多谁都了解扩大与加强我们的红军，使之成为百战百胜的铁的红军，是我们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中第一等的中心任务了。无疑的，我们的红十军与各县独立营、团，在这一年来的残酷的战争中，在政治觉悟上，军事技术上与战斗力上，都有不少的进步与加强，故然在去年不断的战争中获得了许多光荣胜利，但我们并不能以此自满，我们的红十军与地方武装，正如中央来信所说：“不论在军事技术与政治工作，这两方面都还极大的落后于我们的主力红军”，所以我们的胜利也就没有赶上中央红军了。

现在我们“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不屈与具体性，来为着创立和锻炼壮大与强固的铁的红军而奋斗！”这里我们必先指出下列几种错误：

1.有些机会主义者认为我们的红军基础太弱，（？）干部太弱（？）战斗力太弱（？）好象是“蹩脚”红军，要很快赶上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坚强，那是很困难的了，我们要坚决指斥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对我们红军机会主义的过低估计，这种观点的来源是因为只看到我们红军的弱点，但“没有看到十军的优点，他的成份好，他的政治上坚定，他的刻苦耐劳勇敢牺牲与他在斗争中迅速壮大过程”，（省委的决议）

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决不会使我们很好的去加强红军而只会走到悲观失望的无力叹气，实际上我们这方面从土地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里面差不多都是工人，雇农，贫农的成份，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而没有丝毫动摇的红军，他具有充分的条件与力量，去克服他现在尚存在着的一些弱点，很迅速的赶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样的坚强，这是我们可以坚信的。

2.正因为对于创立与锻炼我们的铁的红军，缺乏信心与决心，所以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就没有积极努力，刻苦耐劳的去进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工作，切实的深入的，有步骤的去加强红军，看到红军中有些弱点，只会无力的唉声叹气或谩骂下级，充分表现出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脱离下层的官僚主义，这是障碍我们红军迅速的加强与壮大。

3.游击主义的残余，什么事都随便，马虎，不认真，以军事为儿戏，这是我们创造铁的红军的工作中最有害的观点，有些同志这样的了解：红军与白军不同，红军的训练也应该与白军的训练不同，白军的训练是机械的，红军的训练，则可以随便些，马虎些自由些。当然，红军是与白军完全不同，在阶级性质与阶级任务上两下是绝对不同，在训练的方法上方式上也是完全不同，我们红军的政治训练，是使战士有深刻的政治认识及觉悟，白军的所谓政治训练，则是兵士们对政治盲目，愚蠢无知；白军的军事训练是采取唾骂鞭挞的方法，训练成为他们驯顺的奴隶和炮灰，红军的军事训练，则采取耐心教育的方法，训练成为军事技术高强的阶级战士，这是红军与白军训练的不同之点，但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红军的训练可以马虎些，随便些，自由些，可以不依

照红军操典每条规定去做，对红军操典的每条规定认为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一切管理工作逐随便不认真，这即是游击主义及儿戏军事的观点是要不得的。

我们要建设我们的铁的红军，必须坚决的克服上述的错误现象，——对创造我们的红军铁军无信心的右倾思想，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脱离下层的官僚主义，以及游击主义残余与儿戏军事的观点！要切实的抓紧下列几种中心工作，用最大速度来加强我们的红军：

第一，十百倍的加强政治工作．红军政治机关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进行对红色战士政治教育和训练，特别是要注意经常的政治工作的执行，例如每日教红色战士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一个月内他们就可以了解三十个政治问题，每日教战士三个生字，有一年工夫，战士们就可以读书写信了，再如列宁室的各项工作的切实建立，党、团支部工作的改善，每个政治事变的深入解释、每种不良倾向的开展斗争，用各种方法密切红色战士与工农群众的关系，高度的提高红色战士的政治觉悟与战斗情绪发挥他们不顾一切牺牲、坚决勇敢为阶级解放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热情，这是建设我们的红军铁军的主要条件。

第二，“提高战士学习军事技术”，“以政治工作保障军事技术的提高”，这成了我们红军中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了，我们要使每个步兵战士都善于使用他的步枪，他的手榴弹，他的步枪上的刺刀，使这些武器都发挥极大的威力，这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同样要使我们的机关枪，迫击炮的战士善于发射机关枪，迫击炮，成为顶好的射手和炮手，我们要练习防空、防毒，不但会隐蔽自己的目标、防避敌机的袭击，而且要学会用我们现有的武器射击飞机，打落

飞机；我们不但要学会山地战、平地战，而且要学会河川战、堡垒战与巷战。我们只有学会现代的军事技术与军事知识，才能够保障我们每战必胜每攻必克，但是要使我们每个红色战士学到上述的各种必需的军事技术与学识，这决不是随便，马虎，学习一下可以做到的，而是要经过认真的刻苦的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做到。一个特等的步枪和机关枪射手决不是今天练习瞄准一下，再过几天又来练习一下随便可以做到的，而是应该每日有一定的时间不间断的练习（如每天一刻钟的瞄准练习）才能逐渐做到，所以在提高军事技术方面，我们过去红军及地方武装中虽然口号喊得很响亮，但认真的，切实的，刻苦的去教育去训练我们的红色战士，确实做的异常不够，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是犯了寒热性与不认真的毛病，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红军军事技术落后于中央红军的理由了。

第三，由于对红军与白军不同点的误解，也就有些同志了解为白军是靠野蛮的严格的纪律维持的，而我们红军既是阶级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什么纪律或者至少可以放松纪律，我们应该斥责这种错误的观点，红军为着统一战争的指挥，保障战争胜利的争取，不但需要纪律，而且需要极端森严的铁的纪律，不过红军的纪律是阶级的自觉的纪律，是要每个红色战士自觉的去遵守的，不论指挥员与战斗员都要严格遵守的（国民党军队的纪律，只是压迫、屠杀下级士兵，上级官长则可任意为所欲为）铁的纪律是造成铁的红军必要条件之一，谁要稍微放松红军纪律，谁就会在客观上削弱我们的红军，但纪律的执行，应该带着充分的教育性，所以我们要从政治上说明纪律的重要，使没有一个战士违犯纪律，但是如有违犯纪律者，就是一种小的错误，仍应给以必要的纠

正，小的错误不放松纠正，大的错误也就不容易发现了。现在有些指挥员对于队伍中一些小的甚至比较严重的错误，都视若无睹，不闻不问，到了火线上，个别的甚至部分的违犯纪律的严重错误就发生了，这往往妨碍着许多应得的战争胜利的取得。

第四，艰苦的细心的从斗争中从工作中去培养坚强的军事和政治干部，这是造成红军铁军没有疑问的一种中心工作了，我们要深入部队中去观察，选择，提拔好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加强他们军事和政治的教育，提高他们指挥能力，纠正其本身尚存在着的某些弱点，这样做去，我们大批的得力干部，就运用不完了，一切不注意干部的培养，而只会哭着脸干喊，没有干部，我们不能不说他们对于创造干部只是机会主义的消极与无能而已。

第五，军队中管理卫生工作，亦应抓紧，绝对肃清某些混乱的无组织的无秩序的现象，军队到处清洁，严格遵守卫生条件，不乱吃一点不卫生的东西，减少疾病发生，以减少流动现象，这同样是巩固与加强我们红军铁军的必要工作。

第六，军队政治情绪与军事技术的提高，可以保证战争的胜利，而战争的不断胜利，更加提高与发扬战士们的战斗情绪与勇气。所以在每次决定战争之前，必须正确的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不能盲动冒险，更不能右倾动摇，对于地形考察、兵力配备，战斗时间以及独营、团，游击队及广大群众武装的配合和运用，都应该有精密的布置，然后以最大决心进行战斗，以达到每战必胜，不断的战争胜利，是会吓碎敌人的狗胆，加倍兴奋我们战士杀敌的勇气，建立雄壮的军威，扩大我们的武装，这样，我们红军就可以很快的成为所

向无敌的常胜红军了。

建立我们百战百胜的铁的红十军团及坚强的地方武装，是巩固我们现有苏区与开展浙西，皖南，赣北苏区最主要最中心的工作，我们有足够的条件与力量，来达到这一伟大的目标，我们要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的情绪，游击主义的残余与儿戏军事的观点，我们在中央与中革军委领导之下积极努力的做去，成功就在面前！

（原载闽浙赣省“突击”第七期，1934年2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
诞生前赣东北初期农民运动的概况

邵 式 平

自广东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六年秋，进入江西，攻占了南昌。广大人民莫不欢欣鼓舞。汹涌澎湃的大革命高潮，飞速地向前发展。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来到了南昌，不久便谣传“国民政府要迁来南昌，将以南昌为革命首都，以便策划东进”。就在这个时候，北洋军阀孙传芳残部得以从容地由赣东北分别向皖南浙西撤退。这就造成了赣东北广大地区一时的混乱局面。在这种反革命政权已经塌台，革命政权尚未建立的混乱局面下，各阶级都纷纷起来争夺地方政权。赣东北各地的农民运动，就是在这个时期飞跃地发展起来的。

远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我们党在南昌开办了黎明中学，黎明中学的校长就是曾天宇，党的组织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国民党，在党的领导和指示下，学生党员在寒暑假回家，都要做群众工作，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在许多地方的群众中，散播了革命的影响。大革命的风暴到来了，当时赣东北各县的局面又是那样地混乱，因此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便迅速地登上

了政治舞台，开展了夺取地方政权的革命斗争。

当时在各县领导农民运动的同志，据我所知：弋阳有黄镇中、雷夏、方远辉、舒翼、余汉潮、范荷香、潘式京、彭年、黄应钟、方志纯、胡德兰和我；横峰有黄道、吴先民、邹秀峰、陈仰范、钱璧、项春福、黄球、黄端喜、李穆等；贵溪有江宗海、邵棠等；余干有董思远等；波阳有李新汉等；都昌有刘肩山等；东乡有舒同等。这些地方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共青团支部、国民党县党部、县工会、县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学生会等等的革命组织。发动了广大群众，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夺取地方政权的激烈斗争。弋阳、横峰、贵溪三个县的斗争，表现得更突出。

孙传芳指挥下的刘致陆残部从弋阳沿信江向浙西撤走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还没有出动，弋阳在混乱中，便出现三种势力：

一、原来的当权派。这一派是当时革命的对象，是代表地方豪绅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极端反革命派。他们从来就是与军阀官僚勾结在一起，残酷地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一贯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他们在这个时候，却摇身一变，五颜六色，一会儿宣布自己是同盟会员，一会儿又派自己的儿女和亲戚来要求加入国民党，一会儿宣传差不多所有革命者都曾经是他们的好朋友，实际上他们对革命是非常仇视的。他们借口“要维持地方秩序，以利革命的发展”，便到处拉拢挑拨，暗中收买流氓地痞，布置打手，运动大家签名挽留伪县长改任革命的县长。当这一切无耻阴谋被揭穿之后，他们便在表面上装得更进一步接近革命的样子，实际上则秘密派了好些人去南昌进行反动活动。

二、流氓匪棍派。这一派是土豪劣绅的走狗。他们平时

不务正业，坏事无所不为；在这个时候，与原来的当权派勾结，也想夺取地方政权。当刘致陆残部从弋阳撤退的时候，他们预先埋伏在弋阳县城东门外，从掉队的病兵手上抢到了几条枪，便盘踞叠山书院，招兵买马，网罗流氓地痞，到处送委任状，到处封官；表面上要求改编成为地方武装，实际上听命于豪绅地主当权派，并暗受他们接济。他们和前一派一样，到处拉拢，时刻散布种种谣言，并要求加入国民党。他们把自己说成是革命起义的武装，乘机向人民敲诈勒索。当时乐平、景德镇、浮梁三个地方的流氓匪棍也组成了一股这样的土匪队伍，不敢驻在当地，就开来弋阳芳家墩驻扎。弋阳的流氓匪棍派便与这股土匪相互联络，积极阴谋以武装夺取地方政权。

三、由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派。这一派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就是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革命派。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后，方志敏同志任省农民协会主席，影响很大，全县人民都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到这一派是真正的革命派。这一派积极地深入群众，召开各种群众性的会议，宣传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减租减息、烧毁借字契据、不还旧欠，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等等的革命主张和口号，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很短时期内，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成为革命的领导核心；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以及各种革命组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认识到前面两个派别都是反动的，都是当前革命的具体敌人，如果不把他们的势力打倒，革命就不能发展起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当时当地具体情况，革命力量和条件尚不够成熟，不能贸然进行斗争。为了要争取这次斗争的胜利，党动员了自己可

能动员的力量，积极贯彻执行以下的政策：（1）加倍努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一切反革命派别，从群众中孤立起来；（2）在革命力量和时机没有成熟以前，要尽量避免过早决战；（3）利用一切条件，不要错过一切有利的时机；（4）前面的两个派别，虽然都是反革命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必须有区别地对待；（5）要在各种情况下，尽可能正确地运用我们的影响，争取中间人物；（6）多方设法与党省委和方志敏同志联系，以取得上级党委及时的领导和方志敏同志的支持。这些作法，在事后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

决战有利时期很快地到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自南昌出发，十一月底经过弋阳，并在弋阳城宿营。我们动员了数千群众在城外夹道欢迎，国民革命军全体人员，极为兴奋。军民之间异常亲切，互相欢呼，高唱革命歌曲，欢欣鼓舞，热闹非常。当时豪绅地主当权派以伪县长为首，几十人自成一队，站在最显著的地方，想借此以表示他们对国民革命军的"欢迎"。但是国民革命军的全体官兵，根本不理睬他们，而且讨厌他们。没有欢迎终了，他们的欢迎队伍就散了。群众的队伍就更加兴奋百倍。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政治部了解了当时弋阳的情况之后，立刻派兵将伪县长从县衙门里叫去，怒斥了一番，并警告伪县长说："如果以后，你有一点违抗县党部的领导，就枪毙你。"国民革命军就这样地支持了革命派，因此，豪绅地主当权派阴谋在混乱中夺取县政权的企图，便一时被打击下去了。

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次日就离开弋阳，继续东进了。这个时候，盘据叠山书院的流氓匪棍派及其武装都感到特别恐慌，表示靠拢革命派，并且为豪绅地主当权派说和。为了避

免发生意外，我们对他们说：“你们与那些当权派是有区别的，不应恐慌不安”。几天之后，第二师又开到弋阳宿营，该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特别约我谈了一次话。对于弋阳政治情况的看法，我们完全一致。当晚该师即派队伍解除了流氓匪棍派的武装，并将他们的头子逮捕入狱。与此同时，该师还派了部队把盘据在芳家墩的乐平、浮梁、景德镇三个地方的土匪也消灭了。这场斗争的结果，革命派基本上获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

弋阳的革命派夺取了政权后，为了发展革命力量，认为普遍深入农村、扩大宣传、组织群众并武装群众，是最重要的环节。因此，便派了很多干部下乡去开展农民运动。这个时候，省里派了新县长到弋阳来，并逮捕了伪县长送省处理。新县长到任后，未通过县党部，便派出了一大批旧人员去各乡捐款，这是与我们普遍深入地发展农民运动直接矛盾的。有了农民运动的地方，都纷纷反对。我们认为新县长这种做法，使县政权有脱离革命领导的危险，实际上这是争夺政权的问题在新的情况下的继续发展。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纠正新县长这一错误，必须使新县长接受和依靠革命的领导。办法是经过县农民协会决定，各乡农民协会有逮捕贪官污吏之权。这样一来，区乡一切政权实际上都归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就更进一步高涨起来了。这个运动一开始，弋阳漆工镇的伪巡官便带了两条枪到县里来辞职，这两条枪即交给县农民自卫军。同时，东进部队有个病兵背着半条枪（截了一节的）来县党部请求医治，这半条枪也交给农民自卫军负责保管。当时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是完成在党领导下由党员方远辉同志掌握的。后来群众相传红十军团是两条半枪起义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在

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已开始感到武装的重要。漆工镇伪巡官辞职后，立刻决定派雷夏同志去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党交给雷夏同志的任务是：（１）必须把武装交地方农民自卫军，警察的职务也由农民自卫军担任；（２）必须与黄镇中同志等一起做农民运动；（３）必须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因为当时黄镇中等同志在漆工镇业已成立党支部。由此，漆工镇的农民运动，便以暴风骤雨的形势，开始向封建主义的基础直接冲击了。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向豪绅地主进攻和执行省政务委员会的财政任务起见，我们与新县长谈妥了，应该向豪绅地主官僚资本家捐款来解决，并由农民协会和工会去执行。各地的农民群众在农协领导下，取得了向豪绅地主捐款的权力，革命情绪更加高涨。漆工镇一带的农民背起枪到豪绅地主家里要北伐捐款。根据农民群众的分析，豪绅地主能拿出多少，就向他们捐多少。如果豪绅地主不接受群众的意见，便坐下来要同豪绅地主算账，算多少天，就吃多少天。如果豪绅地主反抗，就把他们逮捕起来，押送农民协会法办。有的豪绅地主不服，偷着逃亡县城，农民马上到县里来追捕。这时豪绅地主的威风体面扫地，农民协会权力大得很。农民群众开始领会革命对农民的利益，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农民群众说："共产党领导坐天下，我们就真出头了。"实际上，这不只是取得向豪绅地主捐款权的问题，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向豪绅地主专政。这是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初步尝试，也是后来弋、横农民大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演习。

当弋阳在混乱局面中，各阶级争夺政权斗争正在开始的时候，横峰县黄道同志从报纸上知道我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的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知道我早已与党省委取得组织联系，即派邹秀峰同志到弋阳与我商谈工作。我从邹秀峰同志那里了解到当时横峰比弋阳要好一些。横峰的主要特点是流氓匪棍没有另外形成一种力量，因而在他们那里只有原来的豪绅地主当权派与代表工人农民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派对立，双方旗鼓相当，而且不象弋阳那样分化得明显。邹秀峰同志回县后，他们也和弋阳一样，积极发动工人、农民群众，并把各种革命组织都建立起来了。省政务委员会派了新县长和公安局长到横峰后，豪绅地主当权派头子就暂时地消声匿迹，有的逃亡到河口镇去了。横峰县的革命派和新县长合作了一个时期，革命是在比较和平斗争的情况中向前发展着。但农民运动逐渐深入，又在弋阳漆工镇一带的农民运动直接影响下，必然发展到直接向农村的豪绅地主斗争。实际上横峰的姚家垅、青板桥、霞坊等地的农民协会，已开始发动了农民群众向土豪劣绅清算地方各项公款的斗争了。

那个时候，蒋介石和他的司令部驻在南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用圈定的办法，支持右派段锡朋等夺取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取消了省政务委员会，并任命右派李烈钧为江西省主席，江西省的右派便开始猖狂起来了。这一情况的变化，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全省各地正在发展着的农民运动。横峰县的新县长和公安局长，是当时国民党右派分子，与段锡朋等的关系较为明显。当农民一起来斗争，土豪劣绅就利用各种关系，诬蔑农民运动，并收买拉拢一批狗腿子，到县政府告状。县长就装作中间人，采取仲裁的形式，来缓和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运动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南昌爆发了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把国民党右派李烈钧、段锡朋等打倒了，成立了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并改组了省政府。我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之后，即被任命为没收张天师财产委员和省农协特派员。四月五日我视察了赣东北各县农民运动，回省报告工作，第二天即从朱克靖同志（当时省政府的秘书长）手上，接了省政府任命我为赣东北各县特派员的委任状。党委告诉我，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风声很紧，要我迅速返回赣东北各县视察。我即从捷径直趋横峰，在横峰党委的同意下，根据省政府给我的权力，撤销了横峰县长和公安局长，成立了县政务委员会，任命邹秀峰同志为政务委员会主席，吴先民同志为公安局长。当时县公安局有武装警察20人，步枪14枝，均由吴先民负责掌握。这样横峰县的革命派，才真正地掌握了政权和武装。同弋阳漆工镇一样，警察的枪支都交给了农民自卫军。这也是后来弋、横农民大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一个有力因素。

形势变化很快，当我处理了横峰的问题之后，上饶的国民党已经反动，贵溪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很紧张，我即赶往贵溪视察。

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之后，贵溪的情况与弋阳相似。在刘致陆残部撤退后的混乱中，一下子出来三种势力争夺政权。贵溪的特点是流氓匪棍乘机而起的土匪部队没有及时消灭，他们在组织以后，即进占了河口镇，就在那里招兵买马，积蓄力量，伺隙而动。另外一个特点是时间长了，情况越来越复杂化。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派去的新县长，带了一连部队去贵溪上任。新县长一到任，原来的豪绅地主当权派即退了位，并在表面上装做不问政治的样子，实

际上却暗中与驻在河口镇的土匪相勾结。革命派虽然把革命的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党的支部也建立起来了，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很不够。这样革命派虽然与县长合作，实际上决定权在县长。这时流氓匪棍的武装还在河口镇，他们对于革命总是一种威胁。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四月二日，南昌群众的革命运动，把国民党右派打倒了，把省主席李烈钧赶走了。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省。贵溪的右派分子有些恐慌，便暗中与豪绅地主勾结，并通过他们，要河口镇的土匪潜兵袭击贵溪。土匪到了离贵溪仅十里的流口地方，县城才知道。这个时候，县长和我们党的各领导同志仓猝出兵应战，幸而一战大胜，缴获步枪15枝，俘虏三个土匪，都是贵溪的恶棍，人心大振。贵溪的党决定要发动群众，镇压反动派，打击右派，召集了一万多农民入城，开祝捷大会。正在这个时候，我到了贵溪。

这天，到会的农民群众，革命情绪非常高涨，万多农民，拿着锄头，集合在大会场上，俨然是一支革命的大军。这是当时贵溪农民运动的最高峰。但在大会之后，游行示威的时候，群众采取了请愿的方式，一致要求枪毙俘虏来的三个土匪，弄得县长极为被动。县长说："省政府特派员在这里，只要特派员批准就行"，这样一来搞得我也十分被动。我立刻要求党支部开会。在党支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枪毙土匪对发动群众，打倒反革命，反对右派都有好处。我便以特派员的权力批准了群众的要求。从这一点，我认识到贵溪当时党的领导也是被动的，事前并没有考虑到群众请愿，也没有决定要枪毙俘虏来的三个土匪。群众里面没有党的领导，而是各人指挥自己所影响的一部分群众，个别同志不经过党就指挥群众行动，这是错误的。事情来不及检讨，革命

的转折点就到来了。第二天上午十时许，自南昌逃出来的李烈钧率领着二、三百人的卫队，突然进了贵溪城。这时我正在贵溪中学向学生宣传打倒蒋介石，城里面的枪响了，这就是枪杀贵溪革命领袖江宗海同志的枪声。恐慌和哀悼的情绪，一下子笼罩了贵溪城。贵溪的革命和农民运动，就这样受到了虽然是暂时的，但是严重的挫折。

自南昌逃出的李烈钧及其卫队，打了贵溪，又打了弋阳，到了上饶，便与赣东北各地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会合，成立赣东伪省政府。紧接着便是“四一二”事变，赣东北各县的情况，就处在宁汉对立的接触线上，许多县的革命和农民运动，便开始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一九二七年开始，我即调离开弋阳，由方志纯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当革命进入武装斗争的时候，方志纯、舒翼、方远辉等同志领导的弋阳县农民自卫军，退出了弋阳城，转移到漆工镇与黄镇中、雷夏、方远杰等同志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会合。他们在会合之后，声势大振，动员了一万多农民武装，把李烈钧的反动武装赶走了，又进占了弋阳城，但由于情况日紧，便主动地撤退，再回到漆工镇一带打游击。“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许多革命的部队，不断地哗变。自蒋介石那里哗变出来的队伍，有一部分（约一个连）来到漆工镇想与农民自卫军结合，虽然结合没有成功，但他们赠送了农民自卫军几条枪，这对于增强农民自卫军的力量和信心是很大的。这时横峰吴先民、邹秀峰、黄端喜、黄球等同志领导着农民自卫军武装，在情况紧急中也主动地撤出横峰城，转移到山区坚持打游击战争，并三次率领农民自卫军攻入横峰城，救出了许多革命同志、革命群众和革命家属。

蒋介石反革命势力，自上饶步步向南昌进逼，弋阳、横峰、贵溪及其他邻近的一些县城，先后均为反革命所占。赣东北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都向农村转移。弋阳、横峰的农民自卫军，因为有武装，便在漆工镇、青板桥、姚家垅一带山区一面坚持游击战争，一面派员去南昌请兵增援。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到廿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全省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了省党部。方志敏、黄道当选为常务委员，我也当选为监察委员，因此我们三人都在南昌工作。弋阳、横峰的同志不断来南昌要求早日出兵增援。南昌的情况，正处在"八一"起义的前夜。朱培德从"四一二"后，日益动摇，不久，就完全反动了，停止工农运动，"礼送共产党"出境等等反动罪行，接二连三地发生，方志敏和我都先后离开了南昌。弋阳、横峰来省请援的干部，本来是和我们联系的，我们一离开南昌，他们也先后各自回去，仍然打游击去了。

"八一"起义后，全国的反革命势力，急于争夺地位，他们相互矛盾，尖锐复杂，无法集中火力来进攻弋、横山区的农民自卫军。同时弋、横山区的农民自卫军武装，因为与上级党的领导失去了联系，也开始转为无定形的小股革命游击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方志敏、黄道和我在"八一"起义后，都失去了联系，各人只好回到农村去，依靠群众，继续工作。我们都先后回到弋阳、横峰与那些坚持打游击的同志相会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方志敏同志召集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的共产党员开会，这就是有名的弋阳窖头会议。这次会议以后，赣东北的农民运动便进入了新的阶段。

关于窖头会议的情况，一九四五年红十军团在延安的同

志，集体写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献给“七大”，其中对窖头会议曾有一段：

弋（阳）、横（峰）的同志虽与上级党失去联系，但仍在山区坚持斗争。此时，方志敏同志回到弋、横，即与坚持斗争的黄镇中、雷夏、方志纯、吴先民、黄端喜等同志会合，于十一月召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当时到会的有：

弋阳	方志敏、邵式平、邹琦、彭皋、方志纯、黄镇中、方远辉等
横峰	黄道、吴先民、邹秀峰等
贵溪	邵棠等
上饶	汪同志（会后赶到）
铅山	缺席

会议在听取了方志敏同志报告后决定：

1.当前形势与党的方针：指出国民党已经反动，革命任务没有解决，革命必然在新的形势下向前发展，目前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党的方针是以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2.武装起义纲领：

推翻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匪党。
铲除贪官污吏，　　肃清土豪劣绅。
平债分田分地，　　建立劳农政府。
如果中途变心，　　刀斩弹穿不赦。

3.建立党的领导机构：

大会选出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七同志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志敏同志任书记。规定未与上级党发生关系前，工作委员会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窖头会议之后，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弋(阳)横(峰)农民大起义。赣东北其他各县的农民运动，也多方派人前来联系和响应起义。从此便创造了闽浙皖赣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强大的红十军团。

以上便是红十军团诞生前赣东北初期农民运动的概况。

一九五八年二月廿八日

弋横暴动

缪　　敏

一九二七年“八一”起义后，方志敏同志从吉安化装回到了故乡弋阳九区湖塘村，立即把隐蔽在各地的同志方志纯等，一个个的找来开了一个会。大家认为必须反对悲观动摇、灰心消极，应该重起炉灶，从下层群众做起，不要怕艰苦。会后分头到各村去进行活动，在七天之内，居然组织了二十几个党支部和二十几个群众团体如农协会等。

这个地方的革命组织发展得这样快，是因为这里的群众深受革命的影响。在北伐军到江西的时候，这里就成立了农协会，捉了该区的大劣绅张念诚。其余的土劣逃的逃，罚款的罚了款，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后来反动军阀李烈钧到了赣东，土劣就请了一连人来报复。因为无人指挥，九区人民虽然集合了五千余人，打退了他们的一次进攻，但是终于失败了，被李军烧了二十几个村子，漆工镇被烧得精光。因此，群众恨透了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所以这次一有人去宣传组织，他们就很快组织起来了。

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当时检查了一下武器，实在太少，力量太不够，于是决定派方志敏同志到波阳去搞些枪来。波阳原有一个警备团，有枪一百枝。团长是共产党员胡烈同志，波阳珠湖人。志敏同志从吉安回弋阳途经波阳时，曾在船上找到了波阳的同志谈话，要他们把警备团带到弋阳去，

以保存实力，他们答应可以。这次去波阳，志敏同志满以为可以把警备团带来，至少可带一半；那知到了波阳后，才知道警备团内部有反动派，将警备团断送了。胡烈同志被撤职，共产党员都被开革，警备团变成了豪绅地主的走狗。只从一个负责人家里弄到十来枝枪。

在波阳，志敏同志遇见省委派去的特派员，听了关于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经过的报告，土地革命的口号，举行秋收暴动等决定，好不欢喜！志敏同志速将十来枝枪运回，准备秋收暴动先攻下弋阳城，即以此为根据地。

大革命时被弋阳九区农民捉去关在南昌的大劣绅张念诚，在“八一”起义时，乘机逃出来了。就这时，他运动了一营白军，来进攻革命的农民。

当时，志敏同志在湖塘村召集各村的农民代表开会，讨论秋收暴动问题，我们虽有十几枝枪，但还没有组成队伍，枪还分散在农民手里，自然没有抵抗力量，只好散会。

张念诚带着白军，一来就进攻志敏同志的家乡，放火烧屋。志敏同志带了几个同志和十几个托枪的农民，到丁山村暂避。住了两天，张念诚又派兵来包围，幸好早就有人向志敏同志报信，连夜离开了丁山，让敌人扑了个空。

后来志敏同志因过度劳累，吐血病复发，不得不休养。三个星期后，他到波阳县委去请示工作（当时弋阳、横峰都是区委，均属波阳县委领导），县委认为志敏同志在弋阳工作目标太大，决定调他到横峰工作，将原在横峰工作的黄道同志调到弋阳。

志敏同志回弋后，九区农民干得很起劲，还缴到了敌人两条枪。后来白军退走了，志敏同志就领导群众去打张劣绅的根据地——烈桥。应召到的群众有三百多人，沿途临时加

入的群众则有三千多人。攻入烈桥时，张劣绅与其党徒均逃遁一空（张逃到南昌上海等地，以后病死在外）。从此，弋阳九区就成了出色的九区了，坚持了八年的斗争，成为赣东北苏维埃最巩固的根据地。

* * *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志敏同志遵照党的决定潜赴横峰工作。

横峰农村的经济也很衰败，农民群众受的剥削和生活的贫困痛苦，比较弋阳，有过之无不及。千千万万的农民缺地或无地，经年劳累，得不到温饱，群众在贫穷、痛苦、怨恨中，迫切要求解放。志敏同志在他的遗著中曾写道：横峰象一个革命的火药箱，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烧线人，我走进横峰，把火药箱的线点着，火药暴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暴发起来了。

志敏同志到横峰后，首先找到黄道同志，他是在“八一”起义后跑回来隐藏在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志敏同志将许多情况对他说明之后，在打石坞召开横峰共产党员会议。黄道同志介绍志敏同志与横峰的同志认识，讨论了横峰工作问题之后，就到弋阳九区工作去了。志敏同志就带着半截套筒子步枪到各处进行活动，他有时化装成一个商人，有时化装成一个农民。

他到蓝子坂村时，是化装一个商人，戴着一顶绒帽子，穿一件灰色袍子，有时赤着脚，穿一双草鞋。志敏同志到蓝子坂村先找花春山同志，说是书友（即同学）。花春山同志是中农出身，小时念过几年书，后在蓝子坂开杂货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

志敏同志化名汪祖海，在花春山家里住下，白天就在屋

里休息和看书，晚上就到各地进行活动，积极地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大家都叫他老汪哥或汪先生。他首先是通过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过去农民协会的会员如花春山、蓝长金等），再去串连欠债最多、生活最苦的贫雇农民，找他们谈话，提出平债分田的口号。

那时正大革命失败之后，横峰的共产党员和群众都受到反革命的相当打击，有的罚过款，有的才从福建逃回家来，情绪不免低落了一些。他们说："欠财主佬的债，会让我们平了吗？地主佬的田，会让我们分了吗？"有的还说："你是不是有谕旨来的？没有谕旨来的就是犯法。"遇到这种情况，志敏同志总是耐烦地进行解释，一而再，再而三，说得他们思想通了才罢。

几天之内，居然被志敏同志说服好几个群众了。他们高兴地说："照你这样说，革命是会成功的。"志敏同志回答说："当然。"并嘱咐他们拿这些道理去向村中别的穷人宣传，邀伙结伴，组织一个团体。经过他们邀集介绍，没得一两天，有个村子就邀集了三十四人请志敏同志去他们村里开会，帮他们把团体结好。志敏同志在会上问："没有钱用，欠了财主佬债的同志有几个？请举手！"三十四个人一齐举起来。志敏同志又问："自家没有田种，向地主佬租田种，交租给地主佬的有几个？请举手！"大家又一齐举起手起来。他们嘈杂地说："那一个不是穷的；不穷也不来革命了。"随后，志敏同志又问："大家赞成平债分田吗？"大家一齐举手，一边齐声喊道："赞成啊！"又说："这个还不赞成！？我们吃尽了他们的亏！"

于是一个一个的宣誓："斗争到底，永不变心！"在红纸名单上画过押，喝过一杯鸡血酒，编好小组，选出团长委

员，这村子的农民革命团就算是成立了——当时认为农民协会这个名字弄腻了，故取名叫农民革命团，凡村中的工人、雇农、贫农、中农都可以加入，是农村工农群众统一的联合组织。主要的口号是："打倒豪绅地主"、"建立工农政府"、"实行平债分田"等。

志敏同志以蓝子坂为中心，到处发动和组织群众。在蓝子坂起初发动和组织了花春山、蓝高茂、王国师、王启发、蓝何玉、蓝挺怀、张世恩等七人。以后由这七个同志去宣传、串连，共发展到三十多个革命同志。

一天夜晚，志敏同志随带二、三人到琯山进行秘密活动，召开了贫雇农座谈会。当时参加的有张德远、张大礼、张相木、张世恩、张兴有、张相来、张明、张大栋等八人。经过一个时期的秘密活动，该村就发展了十几个团员，到暴动时参加的有四十多人，并杀猪宣誓：

"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扶助工农群众，大家努力革命，如若反党，刀斩弹穿"。宣誓完毕大家都嘻笑地喝鸡血酒盟誓，农民将鸟铳、土炮、花枪准备好，集中了百余人准备暴动，成立了农民革命团。

之后，志敏同志又到青板桥进行过活动，住在吴先民同志家。吴先民告诉他妻子说："来了一个同学，你不要对人说呀。"到晚上找五、六个贫雇农和手工业者开会，并要吴先民的老婆买了一只鸡，要了水酒和香，进行宣誓。

志敏同志住在蓝子坂时，那里正在打醮，要吃素，花春山打了一条狗吃，封建头子蓝金元说他破醮，罚他一堂斋烛，否则要赶他走。花春山不肯接受，封建头子就勾结国民党派了几个警卫团的人来捉他们，志敏同志得到了消息，又化装由蓝高茂和蓝玉河两人送到楼底村去住在蓝辉和家里继

续进行革命活动。

志敏同志到楼底村后，也是找欠债最多和生活最苦的人谈话。他问人家家里有多少人，种多少田，欠几多债；并问欠了债准备怎么办。当有人说慢慢还时，志敏同志就耐心地对他们讲贫苦农民和豪绅地主都不是天生的道理；要是有人说要抗租抗债，志敏同志就告诉他："对豪绅地主的租不能缴，债不能还，而且他们的田地都是我们的，一定要拿来分过。要分田，就得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的统治，这就要我们农民团结一条心。"

一个村的农民革命团组织起来后，即由这一村发展出去，不上十几天，周围三、四十里的村坊，都逐渐有了农民革命团组织。农民革命团一经建立，这村中的权力，即暗中转入于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之手，农民对于地主的租和债，也学会了拖的办法。他们对地主说："先生，今天没有，明天再说。"周围的人也围上来，一边拉，一边劝，一边说："逼死了人，可要偿命。"就这样把欠租欠债拖着不交。

到快过年的时候，豪绅地主都纷纷向工农群众逼租逼债。起初还设词拖延，但愈逼愈紧，无法拖延下去，于是各村农民革命团体的群众，每天总有十几批跑到志敏同志跟前来催问：

"什么时候暴动？"

"还早啦，准备还不够呢。"志敏同志回答。

"赶快动手，实在忍不住了，要逼死人呵！"他们再三说。志敏同志再三说服解释，才把他们劝走。但过几天，他们又来催问："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暴动？"

* * *

志敏同志所以从蓝子坂转到楼底村组织农民革命团，作

为暴动起点，是因为楼底村有很多优越条件：一、这里群众是靠挖煤推车为生，全村只有一户富农，没有地主；二、这个村的群众斗争性强，不怕闯祸；三、地形好，有茂密的山林，北通葛源磨磐山，东通舖前目灵山，南通弋阳横峰；四、武装基础好，打鸟的很多，有很多鸟铳，并有煤洞便于隐藏。

楼底村的农民革命团团长蓝长金同志，是个性情暴躁的人，他与同村的几个人，开了个煤洞，每天钻进洞里去挖煤，好的日子每天能挖出两块钱的煤来，不好的日子只能挖出块把钱的煤。为着每天一、二块钱的煤，要脱得一身精光，在漆黑无光，水蒸汗臭的煤洞里劳动十几个钟头，挖的挖，拖的拖，爬出洞来一身乌黑，真不象个人样。这样赚来的几文钱，真是一文钱、一滴血！可是横峰县的衙门却每月要抽他们的捐，怎叫他们不痛心呢！

十二月十九日，县衙里来了一个收煤捐的委员，到他们的茅屋煤厂里坐下。这委员的神气十分傲慢，眼睛朝天不理人，一下轿就冒火：

"你们每月五块钱的捐，不按期送县缴纳，还待我来催，是何道理！"

"近来煤出得不旺，凿进一洞又一洞，尽是些石壁烂皮！"一个煤工，一边吸烟，一边懒洋洋地说。

"我们官府，不管这些，我们只是要捐！"委员说。

"没有煤，我们饭都没有吃，没有钱交捐嘛，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蓝长金忍不住大声叫起来。

"呵！原来你们是抗捐不交，我早听到你们这里结党要造反，现在弄清楚了。看吧！老子回衙门报告，明天就把你们捉进牢里去，坐到头发三尺长。你们这班狗东西！"委员

破口骂起来。

“你说那个是狗，你才真是狗！就不交捐，咬我的卵去！”蓝长金站起来回骂。

这一下气得委员跳起来，赶上去照着蓝长金的脑壳一拳打下去。蓝长金是个活手，有一手好武艺，他一个能敌过两三个，早将来拳架住，顺手向委员的胁下轻轻一推，委员是个斯文人，官格虽大，力气却很小，给蓝长金这么一推，早已两脚朝天，滚倒在地上。看看今天势头不对，倘再不识时务，必定还要吃大亏，于是很快翻身从地上爬起来，急向外跑。一边跑，一边喊。

“你们抗捐不交，还要殴打委员，看！明日再来和你们算帐！”

“咬我的卵！咬我的卵！”蓝长金还在回骂。

人们见闯下大祸，有的不免有些担心，明天要是县衙门发兵来不是好耍的，不是家破便是人亡，蓝团长呢，毫不畏惧，用拳头往胸前一捶，说：“怕什么！组织农民革命团是做什么的，打起锣来，召集各村革命团的人来，追上去把那委员捉回来，把他杀掉，就没有人去请兵来了”。

人们都赞成蓝长金的意见，大家就飞跑回村，把锣大敲起来。一面敲锣，一面喊：“革命团的人快来，捉回那县衙的狗委员，他要去班兵来捉我们人啦！”

这伙人跑到离县城几里的地方转回来，并不解散，集合到蓝家村的祠堂里，杀猪煮饭吃，准备第二天真有队伍来，就同他们杀一场。

那时志敏同志到弋阳九区开会去了，他们就连夜派人请志敏同志回来。志敏同志一到，大家就围拢来了，有一千多人。志敏同志考虑暴动准备虽不十分充分，但事已至此，是

不能再按下去了。所以当他们围拢来要求他下命令时，志敏同志回答说：“照往日开会所讲的计划去做，暴动吧！”

在这天晚上，群众拿着刀枪绳索，自动地到高利贷者、地主的家里去取回借字契据。平素，他们一升租谷一文利钱都不肯让的，这时却驯驯服服将借字契据全部拿出来，交给暴动者，并假意说：“革命也是好事啦。”

当晚，志敏同志发出通知到葛源、青板桥，指示各地同志同时举行暴动，那时黄端喜同志在姚家垅，吴先民同志在青板桥，程伯谦同志在葛源，黄道同志在弋阳一带进行工作。这一带已有八十来个农民革命团，也都举行暴动了。

自志敏同志到横峰至暴动日止，只有二十五天，暴动的范围却占了横峰县的一半地区，参加暴动的群众有五万多人，这可见工农群众要求革命的迫切！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诞生

——弋（阳）横（峰）农民武装大起义——

邵　式　平

"八一"起义后，全国形势起着激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当时的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也并不例外，只是由于当时各地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也有不同。

在"八一"起义前，革命高潮时期，弋阳、横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基本上打倒了地主阶级，取得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蒋介石在"四一二"叛变后，造成了革命与反革命汉宁对立的局面。李烈钧在南昌被革命群众打出去了，便逃到上饶，组织反革命的赣东省政府，同南京蒋介石合夥，与武汉、南昌革命政府对抗。弋阳、横峰在这种对抗局面中，处在反对反革命李烈钧赣东省政府的最前线。这个时期，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是不断的，而且是较为激烈的。农民自卫军和广大武装农民群众，完全以自己的力量夺取弋阳和横峰县城，曾经数进数出。只因当时蒋介石在南京不断增援上饶的反革命力量，而弋、横农民自卫军和革命力量，便不得不被迫地逐步转入弋、横山区。

"八一"起义的影响很大，所有的反革命势力，无论是南京或武汉，无论是南昌或上饶，都不能不集中力量去应付

当时的那种激烈变化。南京的反革命蒋介石政府和武汉的反革命汪精卫政府合并了；上饶的反革命赣东省政府撤销了；原来集中在上饶和联系南京、上饶之间的一些较大的反革命分子，争夺地位去了，在他们指挥下的反动武装也抽走了；反革命的赣东省政府原来占领的几个属于江西的县分，仍划归江西南昌反革命朱培德的省政府管辖了。当时的朱培德和他的政府怎样呢？（1）朱培德在汉宁开始对立的时候，特别是在南昌革命群众打走李烈钧的时候，把自己装扮成为革命的，企图以此来欺骗广大工农革命群众。但他在革命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过程中，便逐步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例如：诬蔑工农运动过火；三次“礼送”共产党出境；发布停止工农运动的反动命令；最后就变成了南昌“八一”起义的直接敌人。（2）“八一”起义的胜利，打得朱培德狼狈不堪，不得不集中力量去收拾这种残局。（3）“八一”起义之后，接着秋收起义，江西地区差不多遍地都发生农民起义，虽然没有能够把当时反革命朱培德的政权打倒，但也迫得他们手忙脚乱。正是由于这些，当时反革命朱培德的省政府，除了派几个反革命县长去接管赣东和弋、横各县的反革命政权外，对我们已经转入弋、横山区的农民自卫军武装，一时确实无力组织进攻。

这个时期，弋阳、横峰的反革命情况怎样呢？赣东北各县的反革命情况怎样呢？我们原来被迫转入山区的弋阳、横峰农民自卫军的情况又怎样呢？

弋阳、横峰的反革命，在革命高潮时期，就基本上被革命力量打倒了。他们的政权和武装都已失掉，他们的影响在群众中大部被扫除，他们的财产有的已被革命没收。“八一”起义后，逃亡在外的反革命分子，虽然能够依靠反革命

县长勉强回到县城，但不敢回到乡村的老家。已经回到县城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争夺反革命的领导权，内部矛盾重重。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反革命武装力量的增援，他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组织必要的反革命力量，立即向已经转入山区的农民自卫军作坚决的进攻，是不可能的。

赣东北各县的反革命，在革命高潮的时候，都起了变化。原来在北洋军阀时代无恶不作的老反动分子，一时不能不退到政治舞台的后面去。有的就地隐藏起来，有的逃到南京，有的逃到武汉，也有的逃到南昌、上饶，还有的隐藏在革命队伍中。“八一”起义后，这些反革命分子，也和弋阳、横峰的反革命一样，都争着出台。他们反对革命虽然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为要争夺本县的反革命领导权，镇压本县的革命群众，因而，各县的反革命分子要想迅速联合起来，进攻弋、横地区早已转入山区的农民自卫军武装，也是不可能的。

弋阳、横峰已经转入山区斗争的农民自卫军和党的领导怎样呢？在“四一二”之后，经过多次的战斗，被迫转入山区。在战略上已由进攻转到防御，一面积极地保存革命的力量，另一面不断派人到南昌求援。派出求援的同志，在“八一”起义之后，不断地回来了，都带来许多好消息，特别是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给了大家以极大的鼓励。大家认为，南昌起义胜利了，必然会有军队派来赣东北。坚持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胜利了。但消息总是消息，光靠好消息，坐等外援，是不行的，只有时刻注视着局势的变化，机警灵活的决定自己的行动。

根据当时局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八一”起义后，在全国形势激变中，弋阳、横峰以及赣东北地区，反而

出现了一时较为平静的局面。这种一时较为平静的局面，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具体表现。但这只是表面的、一时的现象。实际上，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力量。大家都意识到，更大更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久必然到来。

弋阳和横峰的反革命怎样组织反革命力量，向革命作坚决的进攻呢？弋阳的反革命分子首先以反革命县长为中心，组织国民党反革命的县党部。其次，便进行反革命清党运动，把地主、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都收集起来。第三，积极组织反革命的警察队，并多方欺骗群众。第四，向反革命朱培德省政府请求派武装增援。第五，散布谣言，并派反革命的警察大队逐步向农村进行勒索，要税要款，甚至带着地主、土豪劣绅，收租逼债，追捕曾加入过农协的会员。横峰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县长，首先在河口镇集中，由驻在河口的反革命朱培德的军队派了一个连掩护，才敢进占横峰县城。进占县城以后的做法，大体上和弋阳的反革命活动相同。

这个时候，弋阳和横峰的农民自卫军虽然早已转入山区，并且相依为邻，但在对敌斗争上，还没有直接联合起来行动。他们的武装虽然少，人数不多，行动不定，但他们和广大农民群众有密切联系。出城收租逼债的地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如果没有反革命武装掩护，或掩护的力量太小，都有被农民自卫军和农民群众消灭的可能。

正在这样斗争的局势下，方志敏、黄道、方志纯同志和我等都先后回到弋、横山区，并与农民自卫军取得联系。革命阵营，大为振奋。因为这个地区的革命，从头就是我们领导和组织起来的，并且有密切联系的。

以方志敏为首，迅速地在弋阳窖头村召集了五县会议。除铅山外，弋阳、横峰、贵溪、上饶（会后赶到）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秋收割禾的时候召开的。这个时候，各县的地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正开始带着武装向农村进行收租逼债、索捐勒款，广大农民群众深刻感到，不革命就无路可走。同时全国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消息，又在不断传来。出席会议的同志，革命情绪，极为振奋。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赣东各县的情况，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怎样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呢？

一、会议制定了宣传大纲。大意是：国民党反动了，汪精卫、蒋介石合豩了，他们向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投降了。他们要来向革命进攻，他们要来向革命的人算账，要向工人、农民算账，要向工会会员和农协会员算账。在这些反革命的统治下，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是永远也见不着天日的。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坚决革命的，是坚决忠诚于国家和工农群众利益的。广大的工人、农民要想解放，要想见到天日，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共产党员一起，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夺取政权。我们工人、农民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一百个中国人里面，我们有九十五、六个人，敌人只有四、五个人。我们团结一心，坚决打击敌人，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二、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把宣传大纲上的思想编成为下面的几句话：

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

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

废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
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这个纲领，特别是废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普遍深入人心，并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三、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这个组织，当时名为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发展。团下设排，排下设班，每团须在三十人以上。秘密串连，到了三十人以上，就组织成团。在举行成团典礼时，每个团员都要宣誓，要忠诚于革命事业，要遵守如下公约：

1.绝对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

2.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新团；

3.利用打猎名义，各人准备武装；

4.大家齐心努力，听从上级指挥。

四、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成立武装起义指挥部。会议决定党必须统一领导，成立了五县的党委会。选举了方志敏、黄道、吴先民、邵棠、方远辉、方志纯同志和我为党委会的委员，并以方志敏为书记。规定在未与上级党取得联系以前，党委会就是五县统一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党委会之下，成立了起义指挥部，并以方志敏兼任总指挥。

窖头会议，使弋阳、横峰的革命形势起了显著的变化。自“四一二”以来，革命不断退却的局面终止了，开始向反革命进行反攻。

在窖头会议后，绝大多数同志展开了艰苦的工作。有的日夜奔跑，进行秘密的宣传活动；有的改名换姓，到陌生的地方去进行工作；有的日伏夜出，进行活动。就这样，窖头会议的精神和决议，迅速传布到广大农民群众中去，新的革命力量，迅速地增长起来。

当时在广大的农村，特别是曾经组织过农民协会并发动过斗争的地方，反革命的进攻极为频繁。抢劫勒索，非刑拷打，捕人杀人，残酷非常，无数的革命群众遭受了惨祸。广大农民群众在反革命武装进攻和残酷的蹂躏下，感到“命运相同”。当他们秘密听到窖头会议的精神和决议时，好象听到“救命王菩萨到了”，参加革命团的农民非常踊跃。有的自然村，一时没有人去工作，农民只要听到消息，就自动派代表冒险来山区找革命团的关系。

当时的农民自卫军积极地进行游击活动，密切配合秘密组织农民革命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出城下乡，农民革命团的团员就会很快地密报自卫军。自卫军得到消息，了解情况，就把枪支隐藏在便衣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进行袭击。这样不断地行动，吓得反革命分子躲在城内，没有武装掩护就不敢出城下乡。即使有武装掩护，也不敢远离城区，在乡过夜。这对于展开农民革命团的工作，造成了有利条件。

由于窖头会议决定的正确，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农民自卫军武装的积极配合，农民革命团的组织发展得很快。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组织了上百个团。弋阳北乡地区和横峰的大部分地区，除少数较大的自然村以外，大多数的村子都有革命团的组织。以弋阳漆工镇和横峰青板桥为中心的地区都组织起来了。纵横数十里，相互联成一片。群众的革命情绪极为高涨。革命武装起义的形势，迅速地成熟起来。

窖头会议，预计革命武装起义的时间，在旧历年。因为旧历年关，地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利用年关习惯，向农民进行收租逼债，而广大农民反抗的斗争也必然激烈。这

个时候，举行革命的武装起义，较为有利。农民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就迫切地要求迅速起义。他们说："要掀开来，再也秘密不住了。"我们劝告农民革命团，要争取时间，尽量扩大组织，以免起义地区过小，不易战胜敌人。这个时候，全国各地起义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从反革命报纸上可以看到。特别是广州起义，井冈山会师，都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在弋阳、横峰县城内的敌人，怕旧历年关到来，革命势力更加发展，也争取时间，提前加紧收租逼债。年关越近，逼债越紧，农民真的"再也秘密不下去了"。大概是旧历十二月初，公历十二月底，横峰的反革命派了警察队二十余人，到楼底蓝家勒收税款。这里恰好是方志敏亲手组织农民革命团的地方，农民早就迫切要求起义了，无奈找不到机会。反革命警察队到来，农民革命团一面暗中武装埋伏在村里，一面派人殷勤地招待他们吃饭。当他们正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伏兵四出，倾刻之间，就将反革命警察队武装缴了。轰轰烈烈的弋、横农民武装大起义的序幕揭开了。

起义总指挥部当天得到楼底蓝家的起义消息，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通知各村农民革命团，即日就地武装起义，并积极支援邻村，坚决进攻，扩大革命地区。

凡是接到总指挥部通知的农民革命团，都立即武装集合，召开本村群众大会。当场宣布武装起义，进行全村革命户口登记，并立即扩大农民革命团组织，成立农民军。强迫地主交出契据、租约、借字，立即当众烧毁。实行废除债务，实行分田分地和镇压反革命。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办，并当众宣布没收其财产。各村没收的反革命财产，一部分用以分给本村的贫雇农和革命的人，另一部分用作本村的革命经费。对于一般的地主，如果不作反革命，自愿捐助一

部分财产，他们的户口也准登记，但登记他们的户口是另一本册子。这样各村的农民革命团武装革自己村里的命，各村的反革命是无力抵抗的。一、二日之内，都取得了胜利。

取得了本村革命胜利的农民革命团，立即扩大，组成农民军，自动武装出发，援助邻近尚未起义的村庄。如果某村反革命武装抵抗，就结合几个村的农民军，组织联军，坚决进攻。

武装起义的消息，很快的传遍远近。邻近的地主、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一时吓得手忙脚乱。邻近的农民群众，兴高彩烈，纷纷派代表来起义的村庄，要求支援起义。因此兵分五路，积极向周围发展。

第一路，由花春山、邹秀峰、黄端喜、蓝广平等指挥，以楼底蓝家为中心，积极向横峰城和弋阳城发展。当时横峰的敌人很快就得到河口敌人一个连的支援，并出发向楼底蓝家进攻。我军得到这个消息，预先通知各村的农民军，埋伏在沿途附近，掩旗息鼓，让敌人进来。敌兵进到楼底蓝家，突然四面山上和树林里，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敌人不知农民军有多少，便调头逃跑，一直跑进横峰城，紧闭城门，死守待援。弋阳城内敌人吓得一时也不敢妄动。于是两城之间数十里，所有村庄，都竖起了革命胜利的红旗。

第二路，由吴先民、黄球、钱壁、项春福、吴先喜等指挥，以青板桥为中心，积极向铺前、霞坊等地发展。农民大军所到之处，各村内部立即响应，未经战斗，兵不血刃，连下数十村庄，直逼横峰城。

第三路，由程伯谦、丘金辉、胡粹方、喻传才、黄立贵、李穆等指挥，以枫树坞为中心，向葛源、璜村等地发展。进攻葛源街，一战而胜，军威大振。数十村庄不战而

下。那时有民谣："葛源三千烟，出了程伯谦。伯谦开了口，举人老爷也得走。"

第四路，由黄镇中、方远辉、方远杰、方华日、邵伯平、洪坤元、方胜喜等指挥。以漆工镇为中心，向中湖坂、芳家墩、姚家坂一带发展。这一带大村大姓较多，不易进攻。但大村附近的小村，都在农民军援助下，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第五路，由雷夏、余汉潮、舒翼、甘遇霖、方华根等指挥，以樟树墩为中心，向周围发展。在起义之后，周围各村农民派代表请求支援的很多。农民群众说："只要雷夏到，红旗竖起来，我们各村的革命就会胜利。"当时有许多事实也的确如此。雷夏到哪里，哪里的红旗就高高飘扬。

五路农民军同时积极向前发展，捷报频传，声势浩大，这是武装起义胜利的最高峰。

弋、横农民武装大起义之前，弋阳、横峰的敌人，早就千方百计，向反革命朱培德省政府求救，朱培德只派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率领一个连进驻河口。当起义爆发后，这个连在横峰楼底蓝家被打败了。农民军猛烈向外发展，声势日大，反革命阵营甚为恐慌，于是朱培德又增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到河口。该团到河口后，迅速分兵进驻弋阳城和横峰城，并布置向弋、横革命起义地区大举进攻。

弋阳的反革命得到反革命朱培德的军队支援，秘密派便衣队进占了马王坡村。这个村子当时正在酝酿起义。反革命便衣队进村以后，酝酿起义的活动就停下来了。反革命便衣队和当地的反革命分子即利用这个机会，派人伪装革命农民，请雷夏前去支援和领导起义。雷夏一时大意，未辨真伪，中了敌计。刚刚进村，伏兵四出，雷夏和他的父亲及随

从数人，拔刀格斗，杀死了几个反革命分子，自己也英勇壮烈地牺牲了。这一路农民军的发展，开始受阻。

横峰的反革命利用新增援的反革命军队，伪装起义，开到青板桥要求吴先民、黄球亲自收编。吴、黄二人未将情况了解清楚，便亲身出来收编。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了他们。这一路农民军的士气，暂时受到挫折。吴、黄二人被捕后，关押在河口天主堂。天主堂的窗户，都是铁条的窗栏杆，铁条与铁条之间空格相当大，吴、黄二人身体矮小，当晚就钻窗而逃。吴、黄二人逃脱后，急速回到青板桥。这一路农民军的声势，又复大振。当时的民谣说："横峰有了吴先民，不愁天下不太平。"横峰敌人逮捕吴先民和黄球的阴谋，完全失败后，随即派兵进驻葛源。

程伯谦、丘金辉等率领的农民军，机动的退出了葛源，并派人到起义总指挥部报告情况，请求集合各路的农民大军，夺回葛源。当时认为，乘敌脚未站稳，彻底消灭敌人是可能的，于是集合五路农民军，会攻葛源。由于走漏了消息，敌人早在中途埋伏。农民军万余人，浩浩荡荡，正在弯曲的山地里前进，突然山上枪声大作，我军大乱，火速分路撤退。敌人见我军众多，甚为恐慌，在山上打了一排枪，便从山后溜走了。

葛源之役，虽然没有获得胜利，但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是极为有益的。这就是农民军如果没有主力军为核心，而贸然与反革命军队进行正规作战，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

敌人进攻的消息不断的传来，情况又起了新的变化。从消息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河口敌人不断在向弋阳、横峰城增兵。横峰敌人已分兵进占葛源和铺前。弋阳的敌人也派兵出城进占了过港埠、中湖坂、樟树墩等地。敌人的围攻与我们

的反围攻战争开始了。当时我们知道，当前的敌人，不是过去的地方反革命警察队，而是反革命蒋介石、朱培德指挥下的正规军队，要战胜这样的敌人，是不容易的。如果象起义时一样，仍用大量的农民军作战，将会招致严重的损失，甚至招致革命的失败。各村的农民军在葛源之役后，均已回村，也不容易集合起来作战。怎样办呢？我们的办法是：

1.各村的农民军即作为本村革命群众不脱离生产的武装。就地保卫革命群众，严密警戒，巩固革命胜利，侦查敌情，镇压反革命，并相机打击敌人。

2.干部尽量不脱产，就地与群众结合，依靠群众和各村农民军进行工作。不得不脱产的少数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镇压反革命，严密封锁敌人，积极地扰乱敌人，分散敌人目标。

3.集中各路的步枪，建立脱产的革命正规军。当时集中的步枪有二、三十枝，编成一个连，由邹琦、彭皋负责率领，密切结合广大革命群众，巧妙地保存自己，壮大自己，积极配合武装工作队和农民军，集中力量，机动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就这样，以集中的正规军为主力，以干部武装工作队为各地的骨干，以不脱产的农民军和广大革命群众为基础，这些，结合为一体，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轰轰烈烈的弋、横农民武装大起义开始转变为全民的革命游击战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便从此诞生了。

—完—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写于南昌

赣东北革命斗争的回忆

方　志　纯

一、弋阳革命青年社

一九二三年，我在我的家乡——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加入了弋阳革命青年社，迈出了参加革命的第一步。从此，我开始了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弋阳革命青年社是以漆工镇地区的革命青年为主组成的一个进步团体，它是方志敏同志创建起来的。

我的家乡同中国农村的其它地区一样，是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中国社会激烈动荡起来，我们家乡这一带的穷乡僻壤，也开始波动起来。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也开始传播到赣东北。在这个时期，那些外出读书的进步学生，走在前面，起了很重要的先锋和桥梁作用。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方志敏同志是我的堂兄。由于家境贫困，按照不成文的宗族家规，只有老大的长子才能入学。而志敏同志的父亲排行第三，因此，方志敏同志是没有机会入学读书的。但是，因为志敏同志小时就异常聪明，颇具天资，因而，被私塾老先生看重，破例收留他入馆就学。一九一六年秋，方志敏以优

异的成绩，由祠堂保举到县城里的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方志敏同志由于成绩好，斗争性强，能说会道，能团结人，富有号召力，因而，在他周围很快就集结了一群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为了联络感情，增强友谊，方志敏同志将这些学生组织起来，于一九一七年成立九区青年社。

九区青年社成立后，组织和参加了几次反帝反封建的小型活动。但是由于认识不一致，九区青年社成立不久就开始分化，不少社员就退了社。方志敏同志认识到光靠青年学生是不够的，必须要联合贫苦的工人、农民参加才行。于是，他又在家乡发展一些进步青年农民加入九区青年社。到一九一九年，又在九区青年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弋阳青年社，这时，弋阳青年社已有很大的发展，成份亦有很大的变化。并改名为弋阳革命青年社。

弋阳革命青年社的成员后来大部分人都入了党。入党后都表现很好，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其中有不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如黄镇中、方远学、方远杰、郑香、舒翼、郑祖全、黄宫武等同志，都为革命而光荣牺牲了。当然，也有少数人逃避革命，脱离队伍，也有成为反动派的。

弋阳革命青年社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反对弋阳县大地主、大恶霸黄理卿竞选参议员。这个家伙用钱收买群众，骗取选票，想当省参议员。方志敏同志一方面写文章揭露他的罪行；另一方面带领学生在漆工镇讲演，鼓动群众把选票带回，不投黄理卿的票。结果，黄理卿虽然还是当上了议员，但漆工镇穷苦选民的票，他一张也没有得到。

组织爱国青年示威游行。一九一九年，全国人民掀起反对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的高潮，北京等大城市先后掀起了反对国贼、抵制日货的浪潮。消息传到弋阳

后，方志敏首先将自己身边的很不容易买来的日货，毅然销毁，然后组织青年社成员及县城的爱国青年游行示威，抵制日货。

赶走江亢虎。江亢虎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弋阳人，一九一九年，江亢虎衣锦还乡，耀武扬威地来弋阳讲学，宣传反革命理论，当他来到弋阳高小放毒时，方志敏同志和革命青年社的一些学生和他辩论，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后，把江亢虎驳得哑口无言，终于将这个连县太爷都不敢得罪的"权威"，赶出了校门。

出版《寸铁》旬刊。《寸铁》是一张八开的传单式的小报，油印好后，到处张贴，在弋阳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极为震惊，他们视《寸铁》为炸弹。弋阳县的一些反动名人，还专门为此事联名写信到伪警军公署，并将贴有《寸铁》的门板抬到伪警军公署告状，污蔑方志敏同志宣传"赤化"，鼓吹"邪说"，要求伪警军公署"查办"方志敏及青年社成员。《寸铁》旬刊的出版，反映了方志敏同志重视武装斗争的思想。他认为，要和敌人斗争，光有文的还不够，还要有武的——哪怕是一寸铁也是斗争的武器，故刊名"寸铁"。

创办旭光义务小学。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还在表面上提倡办学校，学白话文，但封建势力的阻力很大，各地都办不起来，依然是办私塾。方志敏认为此事可以利用来宣传革命，便写了个报告给县教育局，要求批准创办义务小学。报告获准后，方志敏就领导青年社的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办起了旭光义务小学。方志敏自任校长。但因方志敏经常要到外地去从事革命活动，便要革命青年社成员、德兴人祝炎到学校负责。祝炎同志多才多艺，既教语文，又教算术、音乐。祝炎同志既是校领导，又是教员，管理人员也只有一个方远辉，

并且是业余的。方远辉不在时，我也参与过该校的管理工作。旭光义务小学白天教小学生上课，晚上吸收贫苦农民入学，学文化，贯输革命道理。亦称为“贫民夜校”。我在学校一是帮着管理学校的经费，二是晚上叫农民来上学。旭光义务小学在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起来革命方面，起了不小作用的。

弋阳革命青年社的活动，一直坚持到一九二五年，到弋阳党支部成立后才停止。

就在方志敏同志组织革命青年社的同时，邵式平同志在弋阳邵家坂组织了“益友社”，黄道同志在横峰组织了“岑阳学会”汪群等同志在贵溪组织了“象山书院”，等等。在这些同志的宣传下，赣东北地区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及青年农民，都在各种进步团体中组织起来，为赣东北党组织的产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了准备。

二、弋阳党支部

弋阳党支部的产生，是几个在外地入党的同志，回去秘密发展党员，然后组织起来的。

方志敏同志是一九二三年在上海入党的，邵式平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入党的，我是一九二四年在南昌入党的。（一九二三年底，我到江西省委机关任机要交通。并经赵醒侬同志介绍入党。）我们入党后，首先在漆工、湖塘等地，物色了几个革命青年社的社员，吸收入党。

一九二五年夏天，方志敏同志回弋阳时，在漆工组织成立了党小组。这时，除方志敏及我外，发展的党员有：黄镇中、邹琦、彭年、祝炎、方远杰等同志。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又发展了一些党

员。这样，到一九二五年底，方志敏同志又将党小组扩大为党的临时支部。这时，新发展的党员有：饶恭美、洪坤元、方远学、方远辉、方华根、彭皋、陈祖令等同志。

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党员人数更多了，斗争的形势要求成立党的支部。正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同志，积极投入领导和参加学生的革命运动，革命风暴一天天高涨，"三·一八"惨案后，即被反动政府通缉，在北京就呆不住了，党组织派他到江西搞农民运动，并回到了弋阳。于是，在邵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弋阳特别支部在弋阳县城正式建立，弋阳特支直接由党的江西地区委员会领导，第一任支部书记是邵式平同志。这时，又增加了新党员雷夏、舒翼、杨立程、黄品珍、余汉潮、陈有福、黄令正、范荷香、胡德兰、潘式京、缪敏等人。

为便于公开活动，弋阳党支部成立后，一些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如邵式平和我等人，即着手帮助国民党组建了国民党弋阳县党部，邵式平同志为县党部书记。他走后，由我接任。

弋阳特别支部成立后，党支部派黄镇中同志到九区工作。黄镇中同志到九区后，在湖塘、大溪头、林背、义星源、洪家等村进一步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小组。不久，由于县城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严重，党支部便从城里迁入九区，一些在城里不便活动的党员，也到九区一带的农村开展活动。

弋阳特别支部成立后，主要是在八区九区一带农村，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物色和培养农民工作的骨干。其次是推荐了一些骨干到省农民运动训练班学习，同时，还经过省委，介绍了一些同志到黄埔军校学习。如邹琦就是在这个时

候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进入江西，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弋阳党支部及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都有很大发展。同时，赣东北的其他县，在黄道、吴先民、邹秀峰、钱壁、李穆、黄端喜（以上为横峰县）、江宗海、汪群、邹棠、邵忠（以上贵溪县）、舒同（东乡县）等同志的领导下，也于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六年底，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

弋阳及赣东北其它县的党组织，也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潮中建立起来的。当时，在一些青年中，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认为不需要党。还有一些青年学生，抱着知识分子的固有偏见，认为工农落后，不能入党，只有知识分子才行。方志敏等同志引导大家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组织讨论，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从此，赣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崭新局面。

三、漆工镇暴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白崇禧部第一师经过弋阳，并在弋阳宿营。弋阳党支部动员和组织了数千名学生、农民、工人、市民到城外夹道欢迎，军民互相欢呼，情景异常热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政治部派人了解了弋阳的情况之后，立即派兵将伪县长从县衙门叫来，教训了一番，并警告他说："如果以后，你有一点违抗县党部的领导，就枪毙你。"国民革命军就这样地支持了革命派。豪绅地主及右派的反动气焰，便一时被打击下去了。

趁着这个大好形势，弋阳党支部组织各界人民群众，主

要是以二区、八区、九区的农民为主，打进了县城，活捉关押了北洋军阀的县长。同时，组织了县政务委员会。委员由工会、农会、商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组织推选。邵式平同志以国民党弋阳县党部书记的名义，领导了政务委员会。工会主任是我（副主任是余汉潮）、农会主席是方远辉、妇女解放协会主任是范荷香、商民协会的主任名字我忘记了。县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要求省里派县长来，后省里派了个姓范的县长来弋阳。

县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颁布了很多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公告、布告、法令、条例等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同时，县政务委员会有干部任免权，于是，派出了许多共产党员到各区任职。这样，在共产党员的发动和组织下，各地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著名的漆工镇暴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在方志敏同志的指导下，在弋阳党支部的具体组织下，漆工镇的农民运动非常活跃，农民协会普遍成立，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越来越多；斗争声势越来越大。打土豪、斗地主，抗租、抗息、抗债、抗税。一切权力归农会。

当时，漆工镇还是被反动军阀盘踞着，在漆工镇设有江西警察厅漆工镇派出所，派出所掌握有十枝枪的武装，反动势力藉此欺压人民，鱼肉百姓，破坏农运，镇压革命。漆工镇的人民群众早就对它恨之入骨。当时，各地农运发展很快，漆工镇事实上已处于包围之中，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在一九二六年冬，由方远杰等同志直接组织和指挥，漆工镇农民协会一举举行起义，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了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服务的漆工镇派出所，赶走了反

动巡官余麻子，夺取了反动警察派出所的武装，并用来武装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把革命推向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当时，这个派出所的十枝枪中，七枝是土枪，只有三条步枪能用。三条步枪中，一枝是德国造的“双套筒”枪，一枝是武汉造的“汉阳造”，一枝九响毛瑟枪（少机柄），故称“两条半”枪。这就是赣东北人民争相传诵的“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的由来。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漆工镇暴动胜利后，党即派共产党员雷夏同志担任漆工镇派出所巡官的职务。

漆工镇暴动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赣东北的人民群众，一九二七年初，横峰县的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赶走了反动县官，并由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派赣东北特派员邵式平委任了共产党员邹秀峰、吴先民同志为县长和公安局长。解除了伪政权的武装，并用来武装农民自卫军。这样，横峰县的政权和武装就掌握在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手中了。贵溪县农民协会，在邵式平同志的直接组织领导下，于一九二七年初，进剿龙虎山，大闹上清宫，在闽赣两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就在赣东北党组织领导漆工镇暴动的同时，全省其它地方的农民运动也发展很快，为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省委开办了农民运动训练班。漆工镇暴动胜利后，我即由省委机关调往农民运动训练班，任干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又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由于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投降国民党，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革命、赣东北党便处在一个紧要

关头。早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在改选省执委的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就排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夺取了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虽然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鉴于他们的威望，仍分别被选为省农民部长、监察委员会主任、宣传部长，但以朱培德、段锡朋为首的右派势力占了上风，省党部已被他们控制。

由于当时朱德同志在南昌，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的武装力量，由于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江西有较强的力量，由于当时江西省农民协会和工会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右派还不敢明目张胆出来镇压革命。但是，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情况就变了，朱培德公开反共，将省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缴械，宣布对共产党人“礼送出境”。一九二七年六月，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领袖，就在“礼送”中被排挤掉了。

与此同时，李烈钧在上饶把持的伪赣东省政府，与弋阳、横峰等地封建势力、流氓地痞相勾结，对赣东北的革命力量发动了猖狂进攻。

在反革命的武装镇压面前，赣东北的党，也在积极准备武装自己。“四·一二”政变后，赣东北党按照毛泽东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根据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同志的指示，想方设法从各方面收集了百余枝枪，准备武装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但是，当时江西省委内的王力生等少数领导人，追随陈独秀，主张放弃党的领导，取消革命武装。他们压制工农运动，反对掌握政权。因此，当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中央及省委得知我们在准备武装时，硬逼着我们交出枪枝。虽然我们进行了斗争，方志敏同志还为此受到了警告

处分，但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威逼下，还是服从了上级决定。

在党内党外情况如此紧急的关头，赣东北党组织并没有灰心丧气，还是勇敢地发动群众进行了斗争。一九二七年阴历五月十一日，在弋阳党支部的领导下，由方远杰等同志率领，以二区、四区、八区、九区的农民协会力量为主，联合工会等各界人民群众二万余人，在国民党一个起义连队的配合下，攻克伪县党部，烧毁县衙门，刀劈伪县长，镇压土豪劣绅百余人，又一次将红旗插上了弋阳县城。

国民党这个起义的连队，后改为工农革命军赣东北大队，方远杰同志任大队长兼党代表。这支队伍在方远杰同志领导下打进县城后，对偌大一个县政府束手无策，便经省委和方志敏同志打来电报，要求派人去领导。省委和方志敏同志接电报后，就派我和黄镇中同志去弋阳。但当我和黄镇中步行赶到弋阳时，队伍已经撤出县城了。原来，方远杰等同志打进县城后，李烈钧即派军队反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第三天，农民便被迫退出了县城。回到九区后，由于方远杰同志试放土炮，装硝过多，炮管炸裂，受伤而死。方远杰同志牺牲后，这支队伍因无得力领导等原因而溃散了。

我和黄镇中同志赶到弋阳后，队伍都已经散了。因为斗争受到挫折，党员、群众情绪低落，一些负伤同志待安排。于是，我首先把党支部成员找来开了会，整顿了支部。接着，做党员和骨干分子的工作，从而整顿了农民协会的队伍，处理了一些战斗失败后的遗留问题，群众的情绪才慢慢安定下来。但由于当时整个形势对我们不利，弋阳只有九区还在我们手里，所以，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还是比较低沉。

四、窖头会议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

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出境后，方志敏同志一直在江西农村坚持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吉安、吉水、永新、莲花四县以“二五减租”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由于吉安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方志敏同志便奉命回赣东北“重起炉灶，再来干”。

回来后，方志敏同志很快就以九区为中心，在短短的七天内发展了二十几个党支部，组织了农民协会，集合了五千余农民，又一次和劣绅作斗争。但是，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组织不严，指挥不力，斗争很快就被李烈钧等镇压下去了，他们在九区大肆烧杀，给群众带来很大损失。

一九二七年十月，正在危难之际，方志敏同志在波阳遇见江西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刘士奇，听了关于党中央“八·七”会议的详细传达。知道党已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方志敏同志立即回到了弋阳，决定召开坚持在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等县的党的负责同志的联席会，并叫我立即到这些县设法找到人，通知他们开会。

在弋阳的人很快就找到了，我秘密通知了邹琦、彭皋、黄镇中、方远辉等人。

邵式平同志这时在哪里？如何找到他？具体活动地点不

清楚怎么通知呢？但我知道，“四·一二”政变后，邵式平同志在贵溪一带活动。他与贵溪的俞君实关系很好，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学关系。于是，我就到了贵溪，果然，在俞君实家里顺利地找到了邵式平同志，并将开会的事通知了他。

到横峰是我和邹琦一块去的。我们先在姚家垅黄文中家里落脚，黄文中曾同情过革命，他家里是地主，不引人注目。以后，我们又找到了黄球，并通知他开会。我们的目的是要找黄道同志，但一直未打听到消息。但我知道，黄道肯定在家里，没有走远，一直到第三天，才在黄道家里的楼上找到了他，告诉了他开会的消息。

铅山县也是我去找人通知的。我在铅山找到了徐先兆，并请他通知坚持在铅山的党员来弋阳开会。

我到德兴县，找到了张其德和邱灵通，通知了他们准备开会。

上饶县的与会人员，也是我去通知的。

会议定在弋阳的窖头村召开。为什么选择窖头？有两个原因：一是窖头是邹琦同志家里，邹琦的父亲在村子上有点权威，人们不敢随便得罪他。邹琦还有个叔父，住在邹家祠堂里，这祠堂是个绝好的会场。二是我家有个姑姑嫁在窖头，我姑父有个哥哥是地主，这样，志敏和我等人去窖头，便可乔装成走亲戚，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再说，有个地主亲戚，人家更不敢乱说闲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通知开会的人基本上到齐了。他们是：弋阳的方志敏、邵式平、邹琦、彭皋、黄镇中、方远辉、方志纯等人；横峰的黄道、吴先民、邹秀峰等人；贵溪的邵棠。

接到通知，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会议的，弋阳有饶恭美、陈有福、黄令正、洪坤元、郑香、严毅尧等人；横峰有程伯谦、钱壁、李穆、黄球等人；德兴有张其德、邱灵通等人；铅山有徐先兆等人。

二十五日会议正式开始，由方志敏同志主持，会议开了三天两晚，至二十七日下午开完，这时，上饶的汪佑春同志赶到窖头参加会议。

会议上，方志敏同志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方志敏同志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的结果。大革命虽然失败，但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因此，中国革命必将继续发展，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接着，方志敏同志在分析了赣东北的大好形势后，指出当前赣东北党的任务就是深入发动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

会议对怎样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次会议，完成了如下任务。

（一）制定了宣传大纲。指出，只有共产党是坚决革命的，是坚决忠诚于工农群众利益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夺取政权，才是我们的出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二）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口号是：

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

劫杀劣绅地主，铲除贪官污吏；

平债均分土地，建立劳农政府；

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三）决定了武装起义的形式。组织形式是建立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发展。

（四）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了五县的党委会，同时，成立了武装起义指挥部。大会选举了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方志纯、邵棠、方远辉等同志组成工作委员会，即五县党委会，方志敏同志为书记。在未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前，委员会是五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工作委员会下设起义指挥部，方志敏同志任总指挥。

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发展起来。有的同志主张不论条件好坏先搞起来再说，提出“县县暴动，全面开花”。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在分析了当时赣东北党的领导经验，群众的觉悟程度，敌人的统治力量之后，认为，赣东北仍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赣东北的党要组织全面暴动还缺乏经验，赣东北的群众还没有这样高的觉悟和要求，如果，全面暴动，必然全面失败。因此，只能先选择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力量又较薄弱的地方进行暴动。于是，会议确定，弋阳、横峰为首先暴动的区域，其他各县积极准备。

赣东北党的窖头会议，是赣东北地区革命由退却转入进攻的一个标志，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窖头会议后，赣东北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革命不断退却的局面终止了，向反革命进攻的大好形势开始了。赣东北人民武装斗争的崭新

局面，已经势不可挡地到来了。

五、弋横武装起义

窖头会议后，方志敏、邵式平同志到横峰，黄道同志到弋阳，其他同志也都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准备组织年关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广大农村，特别是曾经组织过农民协会并发动过武装斗争的农村，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极为嚣张，敲诈勒索，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残酷非凡。无数革命群众遭受惨祸。广大农民群众在反革命的蹂躏下，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有着革命传统的赣东北人民，心里正在燃烧着渴望复仇的怒火。党的窖头会议的决议，说出了群众想说不敢说的话，群众看到许多曾经领导自己斗争的领袖和共产党员又回来了，听了窖头会议精神的传达，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纷纷要求起来斗争。

在方志敏及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宣传鼓动下，群众中被压抑了的革命情绪迅速高涨起来。各地都开展了"上名字"的运动。所谓"上名字"，就是党员串连骨干分子，骨干分子串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串连一般群众，你同意参加革命就登记一个名字。"上名字"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进行的。"上名字"的目的，是组织农民起义的武装——农民革命团。仅一个月，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弋横两地农民革命团就发展到上千个团以上。通过"上名字"的运动，群众发动得更广泛了，武装起义的思想准备更充分了，组织工作更严密了。

窖头会议后，方志敏同志在横峰楼底兰家一带，从事秘

密工作，楼底兰家有小煤窑，工农基本条件较好。在楼底兰家，方志敏同志发展了党员，成立了支部，动员了群众，准备了武装。当时，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发生，消息传来，地主恐慌万状，农民磨拳擦掌，弋横起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一个偶然的机会，点燃了弋阳、横峰起义的导火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横峰反动政府当局派了一个收煤捐的委员和数名法警到楼底兰家，催税逼债。"煤黑仔"们先用软办法对付他们，但委员总是不答应，并且动手打人，要捉人到县里去。这时，农民革命团的团长兰长金同志，便召集全村农民革命团的团员和他们斗争，将法警解除武装，将委员赶出村去。方志敏同志因势利导，召集会议，号召大家趁热打铁，向土豪劣绅进攻，并将那些作恶多端的豪绅予以镇压。就这样，武装起义的序幕拉开了。楼底兰家提出的暴动口号是："焚烧借字契据，不还债，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打倒国民匪党，建立苏维埃政府。"

窖头会议后，黄道同志在弋阳九区大溪头一带从事宣传，发动和组织农民革命团的工作。黄道同志就隐蔽在大溪头我外婆家里。我当时在离大溪头不远的义星源洪家组织农民革命团，任团长。各地农民革命团组织起来后，弋阳县的农民革命团总指挥部就设在大溪头，黄道同志任总指挥。

楼底兰家的起义胜利后，消息传开，群情沸腾，方志敏同志认为武装大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起义总指挥部通令各地立即起义，并号召各地，以百倍的勇敢，扩大起义范围。

弋阳、横峰两县，群众基础较好，又有磨盘山为依靠，大革命失败后，群众受苦较深，"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后，党员、群众起义的呼声较高。因此，当接到起义总指挥部的

通知后，各农民革命团，都立即武装集合队伍，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起义，竖起暴动红旗，在横峰方面，葛源青板桥等地当晚响应，实现暴动。在弋阳方面适逢弋阳民团团长、烈桥张家大地主张念诚（张大纲之子）派人到漆工镇和烈桥催租收捐，引起农民怒火，一举举行了起义，于是各村纷纷响应，各农民革命团武装镇压自己村里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各村的反革命力量无力抵抗，各村的权力，转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之手，在短短的二、三天内，弋、横两地绝大多数村子都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整个农村，一片欢腾，燃毁借契，没收粮食，缴出赃款，平分田地，到处都呈现着一派武装斗争的热气腾腾的喜人景象。

弋横武装起义成功后，弋阳县党的特别支部改为党的区委。同时，团的组织也建立起来，我被调往区团委，任团委书记。

在党的弋阳区委和县委领导下，为了扩大武装起义的范围，起义总指挥部将农民起义大军，分成六路积极向外发展。

第一路，由邹秀峰、花春山、黄端喜、兰广平等同志为指挥，以楼底兰家为中心，向横峰县城周围发展。在楼底兰家，歼灭敌人一个连。敌人龟缩县城内，死守待援。弋、横两城之间数十里，所有村庄，都插遍了革命胜利的红旗。

第二路，由吴先民、黄球、钱壁、项春福、吴先喜等同志为指挥，以青板桥为中心，向铺前、霞坊等地发展。此路大军，兵不血刃，连下数十村，直逼横峰县城。

第三路，由黄镇中、方华日、邵伯平、洪坤元、方胜喜、黄品珍等同志为指挥，以漆工镇为中心，向中坂、邵家坂、芳家墩一带发展。

第四路，由雷夏、余汉潮、彭皋、甘遇霖、方华根等同志为指挥，以樟树墩为中心，向弋阳县城周围发展。

第五路，以方远辉，彭年、舒翼、方远学为指挥，以漆工镇为基础，向德兴磨角桥一带发展。

第六路，由程伯谦、李穆、邱金辉、胡粹方、喻传才等同志为指挥，以枫树坞为中心，向葛源、黄村等地发展，起义部队攻克葛源，军威大振，附近村庄，不战而下。

六路大军同时积极向前发展，捷报频传，声势浩大，形成武装起义胜利的最高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弋阳、横峰地区，纵横百余里，炮火连天，夜以继日，到处是起义的队伍，到处是革命的红旗，这时，农民革命团实际上即为乡、村政权。在这些地区里，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国民党反动军队躲在城里不敢出来了，革命人民伸起腰了。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南昌、秋收、广州起义的鼓舞下，赣东北党领导和组织下的弋横起义成功了。

弋横起义成功后，农民群众热情地编了歌子，歌唱方志敏同志领导这次起义的胜利：

湖塘塌塌岭，
出了个方志敏，
一心干革命，
为的是穷人。

六、方胜峰会议

方胜峰会议，是赣东北党继窖头会议后的又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弋横起义刚胜利时，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实

力，不敢贸然行动，因此，弋横起义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不久，反动派发现革命力量的武装并不很强大，就立即开始疯狂的反扑。一九二八年二月，敌人向弋阳、横峰起义区域大举进攻，妄图一举消灭这支起义队伍。

早在弋横起义前，在张大纲的活动下，国民党省政府朱培德就派了一部分特工人员带了一个营的兵力驻在铅山的河口，这个营被我打败后，又增派一个团的兵力，并迅速分兵进驻弋、横县城，布置向起义区域进攻。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向起义区域进攻的同时，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也逐渐发展起来。敌人依靠这些反动武装，不断向起义区域进攻。但由于起义区域的人民机智勇敢地和敌人作斗争，致使敌人进攻收效甚微。敌人眼看这样进攻不起作用，又在河口纠集广信七县组织了所谓“广信七县军民联合剿匪委员会”，向弋横起义区域进一步大举进攻，除反动靖卫团二百多枝枪的部队全部开来外，还有国民党三十一军一个团六百多人，占据了弋、横两县城，并推进到葛源、铺前等腹地，在这些地方常驻有一个连的兵力，并筑起了堡垒，固守阵地。

在策略上，敌人也改变了手法。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弋、横党组织向上级报告中说，这次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第一步，利用农民制农民的策略，以软硬并用的手段，要各村农民接头，接头以后要时刻在家；第二步，要接了头的农民领徽章，徽章编有号码，可以随时找人，找不到就说你“通匪”去了；第三步，对领了徽章的人强迫加入“剿匪搜山队”，当地反动派任首领；第四步，要各乡自动交出革命领袖。

在手法上，敌人也玩弄了许多花招，欺骗农民武装队伍。在弋阳，敌人的特工人员潜入我正在酝酿起义的马王坡

村，和当地反革命分子勾结，伪装起义，请雷夏同志去支援。雷夏同志一时大意，中敌诡计，刚一进村，伏兵四出，雷夏等人，拔刀格斗，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在横峰，反革命利用新增援的反动军队，假装倒戈，开到青板桥要求吴先民亲自收编。吴先民同志未将情况了解清楚，便贸然前往，被敌人逮捕。同时，敌军袭击王荆庙，起义队伍遭受较大损失。

在反革命的猖狂进攻下，革命又遭受到严重挫折。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了低潮。革命又发展到了一个转折关头。由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逐渐转入了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赣东北党组织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军事上，挑选起义中的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大概有二、三十枝枪的武装，脱离生产，成立土地革命军，进行游击战争。

（二）各村的农民军即作为本村革命群众不脱产的武装，就地警戒，侦察敌情，保卫群众，并相机打击敌人，不得不脱产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镇压敌人，骚扰敌人。

（三）加强党的支部工作，教育党员使其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扭转整个革命形势，在敌人的“围剿”下，形势一天天地严重了，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割据，游击区缩小，联络困难，革命武装力量很少，武器弹药缺乏。一九二八年六月，游击队退到了游击中心磨盘山地带。磨盘山在弋阳、横峰、德兴三县交界的地方，方圆不到五十里，游击队被包围在这块小小的地方。敌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我们队伍内部部分人的思想逐渐流露出消极动摇情绪，眼看这支游击队无法支持下去了。

就在这紧急时刻，为了统一思想，明确方针，方志敏同志决定召开弋、横两县的干部会议。六月二十五日，在弋、横交界的一个小山上——方胜峰的破庙里，召开了赣东北党的又一次有名的方胜峰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邹秀峰、庞先飞等二十余人，方志敏同志担任会议主席。我是以团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当时，敌人正向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我带了一支游击队在九区一带活动，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我接到了参加方胜峰会议的通知。

会议一开始，庞先飞（团省委代表，黄安起义失败后调来，后叛变）就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全国各省二百多处起义，到现在都先后失败了，只剩下井冈山和赣东北等几个地方了，革命高潮何日到来，渺茫无期，现在形势又这样严重，眼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他提议，把枪枝埋起来，放弃阵地，分散隐蔽。

方志敏等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逃跑主义的想法。义正严辞地指出，这里的群众跟我们一起革命，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便埋枪逃跑，群众牺牲太大。丢下群众逃跑，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共产党员应该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谁要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可以走，我们不走，我们是要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下去的。方志敏同志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赞成。会议很快就否定了第一种意见。

接着，部分干部又提出第二种意见，主张带了枪枝，离开敌人包围圈，到根据地外去打游击，大家经过讨论，很快就得出结论，一致认为，在根据地里，我们有群众可以依靠，现在南昌站不住脚，如果转移到新地区去，人地生疏，

群众一下子又不可能了解我们，部队作战无群众支持和掩护，那岂不是自取灭亡。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去引导，革命便会立即失败。再说，即使是把敌人引出了根据地，我们回来，敌人还是跟了回来，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消灭他，引来引去，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大家认为，短时间的出击是可以的，但丢掉根据地到外面去当流寇是行不通的。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了方志敏同志提出的第三种意见：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方志敏同志详细地分析了情况，指出，我们还没跟敌人交过手，而现在敌人兵力分散，真的打起来，不见得就打不过他们。至于敌人消息灵通，紧跟着我们转，那是因为根据地内部还有反动派的耳目存在。现在敌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想走也走不了，只有打，到万不得已时，当然要转移阵地，但是也得事前有准备，在新地区先做好群众工作，万一仗打不赢，可以按照布置的步骤转移。因此，方志敏同志结论说，第一，敌人很分散，各路很弱，又没有群众，我们力量可以集中，择敌弱点，先打一路，打则必胜，以振军威。第二，反革命在活动，群众有些动摇，我们要向群众作工作，同时，为了打消群众顾虑，争取群众，要坚决镇压反革命。第三，为了作万一要转移阵地的准备，要开辟新的根据地。

就这样，会议在驳斥了第一种意见，分析了第二种意见，确定了第三种意见后，决定：

（一）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由邵式平同志统一指挥，选择从过港埠出来的敌人最弱的一路，坚决打下去，因为这路敌人最为群众痛恨，打胜了可以把群众争取过来。

（二）群众有些动摇，由方志敏同志亲自负责做宣传教

育工作，并且配备武装，给反动派首要分子以必要的打击和镇压，同时，作好根据地内的坚壁清野，阻击敌人，保护群众的工作。

（三）派黄道同志去贵溪，派方远辉同志去德兴，派邱金辉同志去上饶、玉山交界处的石人殿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方胜峰会议后，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局面。反革命对根据地的"围剿"，很快就被粉碎了。

（一）出战金鸡山，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即方胜峰会议后的第二天，为配合由邵式平同志率领的主力武装，我带着游击队，来到金鸡山。这时，弋阳靖卫团一个连，驱逼一万余农民，从过港埠那边，一路烧杀而来。

我军绕过金鸡山脚到达金鸡山背后，出其不意从敌人屁股后面杀出去，敌人自进犯以来，未受挫折，未遭抵抗，因此骄气十足，警惕甚微，再加上忙于抢劫，根本没有多大战斗力。我军一个冲锋，就将"靖卫团"一个连冲垮。被敌人威逼来"围剿"根据地的农民一见敌人已垮，都回过头来向敌人冲杀过去。同时，被敌人追赶的老幼群众，也都回过头来，为我们助威。四周山头，红旗摇动，喊声震天，杀声遍地，敌人摸不到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不敢恋战，拼命后退。敌人垮后，我军情绪高涨，乘胜追击，长追敌人五十余里，追到过港埠，捣毁了敌人的指挥部，直逼弋阳县城。弋阳城内乱成一团，伪县长闻风逃走了。敌人以为我们要攻城，遂将各路人马全部撤回县城。我们算准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地点，金鸡山战斗后，又兵不解甲，长驱八十余里，奔袭樟树墩，又击溃敌军一路，迫使敌人全部退回县城，打退

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与此同时，方志敏同志深入虎穴，大义灭亲，将我家的反动叔父方高雨予以镇压，把有动摇情绪的大部分群众争取过来了。

（二）攻下横峰城，粉碎敌人第二次局部"围剿"。

一九二八年八月，敌人重新增兵，从河口调来四十六军杨劲部的罗英团为主力，配合地方靖卫团，向我举行第二次局部"围剿"。

杨劲部原为土匪。进入我区后，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九月，我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放出空气要"攻打烈桥"，而暗地里却集结了红军两个连的兵力，准备攻打横峰，敌人听到风声后，果然上当，在弋阳烈桥等地，赶修工事，增援人马，而放松了对横峰县城的戒备。九月二十三日晚，在邵式平、吴先民等同志率领下，我军急行五十里，直扑横峰县城，二十四日拂晓攻克该城。这是赣东北武装起义后第一次攻下县城，群众个个欢欣鼓舞，处处庆祝游行。横峰县城攻下后，敌人内部更加混乱，朱培德疑杨部不稳，乘机将该部调回，全部缴械，敌人的第二次局部"围剿"又被粉碎了。

（三）瓦解敌军队，粉碎敌人第三次局部"围剿"。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敌人增加兵力，以周志群旅为主力向我进行第三次局部"围剿"。

当时，根据地内已实行坚壁清野，时届年终，天气寒冷，周部士兵尚衣单裤薄，肚饥腹空，兵士厌战，怨声载道，军心浮动。

一九二八年底，该部十一连，在连长匡龙海带领下，在德兴县磨角桥举行起义，投诚红军。这一连哗变后，周匪内部一片混乱，我军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入开展政治攻势，瓦

解敌军，一九二九年二月，该部十二连，在副连长杨廷辉、排长龙志光的带领下，在弋阳县程家桥举行起义。至此，这个营十一、十二两个连起义，余下一个连的白军士兵包括连长颜文清在内也偷偷地个别地来投降。一个营就这样不战自垮，周匪狼狈逃去。

这个营的起义，一方面动摇了整个周志群的部署，另一方面使红军又进一步扩大，力量增加一倍以上，顺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局部“围剿”。

（四）大战长茅岭，粉碎敌人第四次局部“围剿”。

一九二九年四月，国民党王钧第七师第四十团又向我发起第四次局部“围剿”。这一次，敌人改变了战术，采取“久困穷追战”。我军初与接触，还没有摸到规律。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我军逐渐摸到了敌人的弱点和作战规律，当时，敌人从上饶、德兴、弋阳从三路向磨盘山包围。其中，弋阳长茅岭一路最为薄弱，而这一带地形又对我有利，于是我们便集中两个连的兵力，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弋阳长茅岭伏击。我所率领的部队，也参加了这次伏击。一战便把进犯之敌击退，之后我们又在团林打了一个大胜仗。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局部“围剿”。

七、贵余万暴动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宗海、汪群等同志就在贵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农民协会，开展了群众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斗争虽然受到挫折，但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

方胜峰会议后，黄道同志到贵溪与邵忠、邵棠取得联系，积极开展活动。七月下旬，方志敏同志亲自到贵溪的裴

源、周坊、江家坪一带活动，和黄道、邵忠等同志研究了贵溪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按照方志敏同志的指示，学习弋阳、横峰的经验，在贵、余、万农村开展了"上名字"运动。

为了加强贵、余、万方面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党又派程伯谦、方培龙等同志到周坊。经过这些同志的努力，革命很快发展到贵溪的塔桥、泗沥、横山，余江的划桥、大桥、象鼻湾，万年的富林、陈营一带。为统一三县的领导，在贵溪周坊的江家坪成立了贵、余、万中心县委。受信江特委领导。

贵、余、万中心县委成立后，就着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准备和培养骨干，在江家坪秘密举办了积极分子训练班，吸收各地的农民积极分子参加，方志敏同志亲自向训练班作报告，告诉他们如何去工作，如何去领导群众斗争。训练班结束后，领导和骨干分子都分派到各地，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革命团。

一九二九年一月，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群众要求起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贵、余、万中心县委立即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形势，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举行起义了，并报告了信江特委。于是，方志敏同志决定派武装力量支援贵、余、万起义。

当时，敌人为防止和镇压贵溪农民的武装起义，派了一个正规连和靖卫团驻在贵、余、万三县交界的地方——周坊。红军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红军一攻周坊，敌军正规连在正面和我交火，后方宿营地让给靖卫团防守。我军派出一个连队向敌后冲去，靖卫团一击便溃，我军顺利占领此地，即向敌正规连队射击。敌人见背后打起枪来，还以为靖卫团搞错了目标。待回头来看，见山上插了红旗，才知阵地已被红

军占领，急忙退出战斗。我军将敌人前后夹击，四面包围，一连白军，束手就擒，战斗取得彻底胜利。

周坊战斗的胜利，扫除了贵、余、万起义的最大障碍，鼓舞了贵、余、万三县人民的斗志，农民革命团立即举行起义。周坊坂背吕家的农民群众，捉杀了外号“水蛇仔”的大地主四兄弟，首先竖起了暴动的红旗。

周坊起义胜利后，紧接着贵溪的神前、库桥，余江的大桥、划桥，万家的富林等地，也举行起义。尚未起义的村庄，看到其他村庄的农民已经起义了，也纷纷要求派人帮助起义。中心县委为扩大起义区域，选派了一批经过起义锻炼的优秀干部分赴贵溪、余江、万年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武装起义。于是，整个贵溪的信江以北，周坊周围的余江、万年方圆六、七十里地，都先后暴发了农民武装起义。

为了镇压革命，贵溪大恶霸翁志高带领靖卫团和一百多人的警察队到桃源胡家，我军早有准备，乘敌午睡时，红军在几千农民的配合下，突然袭击翁匪，缴枪四十余枝，当场镇压了翁志高。翁志高失败后，敌人不甘心，又以正规军队第十八师一个营，于一九二九年秋天，向周坊大举进攻，亦被我军歼灭。

这两次大的战斗后，反革命气焰已被打下去，农民武装起义的烈火进一步燃烧起来。农民起义之处，反动的靖卫团被消灭，封建统治势力被打倒，基层苏维埃政权成立起来了，整个农村，欢天喜地，气象一新。

这就是继弋横起义后，持续发展了半年多的贵、余、万武装起义。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三县的起义成果，信江特委决定建立贵、余、万三县游击司令部，派我去任该部的司令兼政委。

同时，我还兼任着团的信江特委书记和中共信江特委的贵余万特派员。

就在贵、余、万暴动的同时，上饶、德兴、铅山也都举行了武装起义，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样，赣东北的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等八县，除少数县城及附近村庄外，其余土地差不多都纳入了苏维埃的版图。

八、信 江 军 委 会

一九三〇年，我开始任贵、余、万游击司令兼政委，后又调任信江军委会代军委书记，在这段时间，我主要是从事军事工作。当时，信江军委会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不断加强正规红军的建设，二是组织地方武装，并不断动员青壮年入伍，将地方部队提升为主力部队。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赣东北根据地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一套办法的。

早在一九二六年，漆工镇暴动后，赣东北人民就掌握了“两条半”枪的武装，以后发展到十二枝枪，并且开始了游击战争。

一九二七年夏，国民党一连士兵起义，党派方远杰同志去整顿这支队伍，番号为工农革命军赣东北独立大队。同年底，弋横起义后，从各地农民团中挑选了一部分农民起义积极分子，脱离生产，成立游击队，叫工农革命军。有二、三十枝枪。连长由邹琦、邱金辉、胡德珍先后担任。

一九二八年二月，赣东北党领导的脱产武装正式成立。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连。这即是赣

东北红军的前身。一九二八年，粉碎敌人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时，工农革命军有所发展。反第一次“围剿”胜利后，队伍又有扩大。一九二八年八月，反第二次“围剿”胜利后，部队进一步扩大。已有两个连队的脱产武装。这时，各县均成立了地方武装。于是，革命武装的体系——主力军、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已初步具备。至一九二八年底，十四团已发展到三个连。团长先后由陈春荣（后逃跑）、章旭（后逃跑）、黄章、邹琦等人担任。

至一九二九年八月，反第四次“围剿”胜利后，部队又有扩大，于是正式成立红军，改番号为江西红军独立团，下属四个连。团长先后为邹琦、李尚达、郑孝胥、孙志清、匡龙海。其中，郑牺牲后，颜文清曾代过一段时间的团长，经过整军，加强政治工作，部队更加正规化。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独立团在弋阳余家仓整编。改番号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下属六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拥有步枪四百来枝，驳壳枪二十来枝，机关枪一挺。团长为匡龙海同志。一九三〇年六月，攻克秧板，部队大为发展，经过在弋阳芳家墩又一次整编，设立营的建制。当时，独立一团已拥有三个步兵营（一个营辖三个连）、一个特务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驳壳枪队、一个担架队，已有步枪六、七百枝。此时，团长为周建屏同志。一九三〇年七月，红军独立一团已有很大发展和加强，经过乐平众埠街的整编后，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辖步兵三个团，人数约三万余。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同志，政委由邵式平同志兼任。至此，赣东北党的武装已经很是蔚为壮观了，

我在这里想介绍一下周建屏同志。周建屏同志是红十军的创始人之一，为赣东北部队的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周建屏是金溪人，原在云南滇军中任过团参谋长、团长。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建屏同志被党组织秘密派往江西，在九江、波阳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到赣东北根据地后，一直担任赣东北红军的领导职务。一九三三年调离赣东北后，任红军廿四师师长。红军北上长征后，周建屏同志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不久，派往晋察冀边区，任北岳区四分区司令员。后来，在河北省平山县病故。党和人民为纪念周建屏同志，曾将平山县改为建屏县。

赣东北红军的战略原则是，以游击战为主，在有利条件下，有把握时，也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

红军采取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打不打操之于我，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

赣东北党在军队建设中，还以极大的注意力进行了军队干部的建设。

红军创立初期，部队的连排指挥员大部分是提拔哗变过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充任，但他们之中，有的军阀习气严重，且对革命军队缺乏了解。为了迅速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平和军事素养，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造就红军指挥员，党加强了对军事干部的培养，当红军还只有几个连的时候，就在弋阳九区大溪头创办了一个临时性的军事教导队。一九二九年秋，在弋阳吴家墩正式创办了信江军政学校。随后，该校迁至省苏维埃机关驻地横峰葛源，改名为彭杨军政学校（以彭湃、杨殷名字命名），以后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校。军校校长开始由邵式平同志兼任，后为邹琦。教育长

为薛子正同志。军校从创办到红军北上，共开办了八期，每期学员二百人左右，训练期为六个月。课程安排是：军事课占百分之七十，着重班排战术。政治课占百分之三十，课程主要有：党史、社会发展史、中国苏维埃运动等，方志敏等领导同志，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课。学员毕业后，到红军中担任班、排、连长，成为红军的基层干部。现在还在我党我军工作的吴克华、饶守坤、黄元庆等同志，都曾是这所军校的学员。

在建设主力红军的同时，赣东北各级党组织还非常重视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群众武装的建设。当时，最基本的有：赤卫军、赤卫队、少先队。

赤卫军是从各地精选出来、富有训练的地方部队，是根据地的常备军，主要任务是镇压地方反动派，肃清地方反革命，随时准备应征前方作战和编入红军。一九三〇年以后，省成立了赤色警卫师，县有独立团（营），区有大队，每大队二十至六十人不等。省赤色警卫师师长是祝荫龙同志，政委是吴先民同志。祝荫龙同志牺牲后，我接任师长。

赤卫队由二十五——四十五岁的农会会员和工会会员组成，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村有中队，乡有大队，区有纵队，主要任务是：眺高、守夜、放哨、查路条、送信、转送伤病员、运粮草弹药等。以维护地方秩序，管制当地反动派，协助保卫根据地。

少先队由十五——二十五岁的农会会员组成，是半军事性的群众武装。组织形式与任务和赤卫队大体相同，但体力和政治水平较赤卫队更高。其活动除党组织统一领导外，青年团还负责对其具体领导。

地方武装的武器，大部分是梭镖、鸟铳、土大炮、石头

炮、松树炮、挨丝炮、竹钉、竹签、竹筒炮、土炸弹、老虎箭、地老虎等，敌人进攻时，将它们装在村里村外，路旁宅边，墙上地下，橱内灶里，到处都是，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第五师周浑元部进攻葛源，我地方武装到处阻击，使该部从县城到葛源六十里路走了五天，且损伤很重。这一年，根据地群众武装击毙敌人三千余人。后来，这些土武器、土办法介绍到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中央苏区还发了号召，要求各地群众学习赣东北群众的勇敢坚定精神和创造性。

一九三〇年，就在我担任信江军委代书记的时候，年初，蒋、冯、阎正在酝酿军阀混战，各自抓紧布防，主力部队抽走，无暇顾及苏区。接着，蒋冯阎军阀混战爆发，形势对我更加有利，利用这个大好时机，赣东北红军经常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外线去作战，打击敌人，发展根据地。这期间，我率部参与或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参与了这样几个主要的军事行动：

二取景德镇

一九三〇年七月，由方志敏、邵式平同志亲率红军独立团攻打景德镇。红军夜行昼歇，从根据地中心弋阳，一夜强行一百四十余里，突然出现在乐平鸣山，消灭鸣山煤矿一百余人的伪矿警队，接着，队伍开到洛口，击溃反动靖卫团许英部，第二天行至段家化装成伪军保安团，分四路进军景德镇。景德镇增守军以为“自己人”，我军只打了几十枪，便顺利地轻取景德镇，一九三〇年秋，根据省委决议，由周建屏同志率领红军独立团第二次攻打景德镇，消灭伪江西省保安旅两个团后占领该镇，成立了景德镇临时苏维埃政府。之后，挥兵北上，连克乐平、波阳、都昌数县。二取景德镇

后，使根据地扩大到景德镇、浮梁、乐平、波阳、都昌、湖口、彭泽一线。景德镇是当时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红军打下景德镇后，影响很大，军威大振，景德镇瓷业工人、鸣山煤矿工人大量加入红军，极大地改变了军队的成分，这些工人为赣东北红军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打九江

一九二九年秋，因叛徒出卖，江西省委遭到破坏之后，赣东北的党便与上级失去联系。于是，信江特委派我和唐在刚去南昌找省委，但未取得联系。之后，又决定派唐在刚同志去上海，以期和中央取得联系。

一九三〇年七月，正当我们攻下景德镇的时候，唐在刚从上海回到景德镇，传达了立三路线，要红军立即开去打九江，配合兄弟部队，截断长江，占领九江，夺取马当，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当时，随军特委方志敏同志殊为惊异，坚持要在特委讨论，并须整顿队伍。于是，我军便退出景德镇回师根据地。回师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商量，一致认为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且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主力仅二千余人，且越湖进攻，又脱离后方，恐有全军覆灭之危。他们准备在特委会上据理力争。但在特委会之前，唐在刚根据中央指示，已将信江特委改组，增加了肖韶、李杰三（后叛变）、胡定铨（后逃跑）三人为委员，胡定铨为前委书记。

由于特委改组，结果特委会上对攻打九江的问题并未展开讨论。会上唐在刚同志传达了立三路线中央的指示，说目前形势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当时任务是猛烈扩大红军，攻打大城市，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illegible]。赣

东北党的任务是迅速攻战九江，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红一军团夺取南昌，配合洪湖、湘鄂两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和鄂豫皖的红四军团进攻武汉。最后，特委决定：红军独立团即向九江、湖口发展；后方迅速动员赤卫队一百个连加入红军。方志敏等同志对打九江仍有怀疑，因此，一面嘱率军攻打九江的周建屏同志要相机行动，胡定铨初到不了解情况，前线军事仍由周建屏同志负责。一面要邵式平同志速去中央，并带详细书面报告，希望中央指示有所改变。

一九三〇年秋，邵式平同志从中央回来，带来了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立三路线的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和中央指示。并命令赣东北红军再次攻打九江。在“左”倾路线的逼迫下，特委在万年的富林召开了扩大会，传达贯彻立三路线。

富林会议斗争非常激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是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但居于少数地位。同时，对打九江的问题，他们进行了分析，认为立三路线要我们打九江，肯定是行不通的，是盲动行为，但是九江方向的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一带，是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可以出击。因此，富林会议后，红十军再次出击九江。这次的出击行动，虽然是在立三路线指导下进行的，但并没有按照立三路线去攻坚打硬，强取九江，而是以游击战的行动，攻取江西之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一带，在都昌与波阳交界处的江桥消灭宋子文的税警团。攻克安徽的东流、秋浦等镇，占领马当要塞。扩大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并建立和发展了这一带的党组织及苏维埃政权。

这时，由于我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且地方武装骨干也

随军前往，根据地内一无主力武装，二由于立三路线时，取消了党团工会组织，领导薄弱。因此，敌人便乘虚而入。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横峰、铅山、上饶、广丰、玉山五县的靖卫团，及安徽、浙江一部分保安团，向我后方进攻，一直打到上饶的茗洋关、横峰的霞坊一线。闽北苏区、铅山苏区、上饶苏区及横峰部分苏区，均受到严重摧残。同时，蒋、冯、阎军阀混战已结束，已派大军向我军包围，正在作全国性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此时，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坚决主张下，决定红军回师根据地。

我军回师后，群众大为振奋。我军刚进入根据地，国民党第五师胡祖玉部已尾随我们到万年珠山桥，这是一场遭遇战，我军奋勇回击，敌稍有停顿，我军乘敌迟疑之机，即穿过苏区，奔袭上饶，将五县靖卫团全部歼灭。随即回袭河口，全歼敌铅山靖卫团及河口守军国民党正规军张辉瓒残部李全坤团。至此，上饶、横峰苏区已全部恢复。

红军两次打九江，取赣北，入安徽后，苏维埃政权发展到彭泽、湖口、秋浦、东流等长江一线，使根据地大为扩大。

二进闽北

一九三〇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苏区进行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以伪第九师进犯赣东北。

在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红十军很久没有打过大胜仗了。于是党组织决定方志敏同志由苏维埃主席调任红十军，暂代红十军政委。一九三一年三月，方志敏同志到任。红十军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避实击虚，跃进福建，与闽北红军会合。一九三一年四月攻占铅山，于是，我军经桐木关进闽北，攻下长涧源后，连战再克赤石街，于五月十四日打下崇

安县城。之后，红十军留下一个特务营给闽北作为骨干，其余全部回师赣东北。这时，在我军的主动进攻下，敌军东跳西窜，部署已乱，最后在葛源附近的何家坝击溃伪第九师。在闽北方面，红军独立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击溃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开辟建阳等根据地。红十军一进闽北，一共打了十一仗，仗仗皆胜。这就不仅调动了进攻根据地的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而且在闽赣两省，扩大了影响，树立了军威。同时，将根据地扩展到余江、广丰、铅山、崇安、浦城、建阳、建瓯、邵武、光泽一带。

一九三二年九月，国民党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以蒋鼎文、周浑元部配合当地驻军王锦文师向赣东北根据地进犯。赣东北的党为了打通闽北与赣东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同时让进犯之敌扑空，以便最后消灭敌人，便决定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作战。方志敏同志随军前往，担负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

红十军到铅山的紫溪后，方志敏同志在紫溪召开干部会议，决定了进军闽北的作战计划：第一步，以红十军大部攻赤石街，另派小部分配合闽北独立师去攻星村街，这两镇占领后，崇安苏区便完全打成一片了。然后，第二步，红十军与独立师前往进攻浦城，一面开辟浦城苏区，同时解决一批给养（因浦城是较繁华的县城）。最后，第三步，红十军自浦城返回赣东北，在铅山方向活动一时期，最后完成打通两个苏区的任务。部队在由方志敏同志作了动员报告后，即分路向赤石街和星村街进攻，两处皆胜，接着便先攻崇安，调动了浦城守敌，我军乘虚攻克浦城。之后，红十军开赴崇安苏区，在完成预定任务后，部队经铅山，胜利返回赣东北根据地。

此外，赣东北红军还有贵溪的周坊之战、德兴的梅溪坂之战、乐平的秧坂之战等著名战斗。

九、信南特委

经过一九三〇年的发展，中央根据地和赣东北根据地都得到很大的巩固和壮大。为了打通中央根据地和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省委决定加速开展信河南岸的赤化工作，并于一九三〇年底，建立了党的信河南岸特区委员会，信南特委成立后，省委派我任信南特委书记。

信河南岸特区包括资溪、金溪、余江（南部）、贵溪（南部）、东乡、黎川、南城（部分）、光泽（部分）等县。特委设在资溪。

一九三一年初，我化名万里，到信南特委工作，和我一同开解信南特区的有团的特委书记兰广平同志。后来，我们在信南建立了一支武装游击队，游击队队长是宣寿庭同志。

在赣东北根据地，我以前都是作团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主，到信南特委后，我开始作党的工作。

在这里我想，将赣东北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赣东北各地的秘密党员和党组织在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同时，就积极地开展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秋，弋阳等县建立了党的支部。以后，扩大发展成区委，受波阳中心县委领导。一九二七年窖头会议后，成立了弋横中心县委，此时，弋、横两县已有十二个支部，四十余个党员。

一九二八年初，又建立了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

山五县联合党委会，受设在波阳的赣东北特区区委（也称波阳特委）的领导。

一九二八年四月，弋阳、横峰、贵溪等县先后成立县委，方志敏同志先后任过弋阳、贵溪的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底，召开第一次信江党代大会，报请省委同意后，成立信江特委，并派唐在刚同志任书记。特委设在弋阳黄沙岭，直接受江西省委领导。

一九二九年秋，江西省委及赣东北特委均遭破坏，信江特委便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此时，党已发展到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铅山、上饶等八县。并与闽北党取得了联系。赣东北特委遭破坏后，失去上级关系的乐平等县党组织（原属波阳特委）亦来信江特委找关系。于是，一九二九年底信江特委又改为赣东北特委，领导赣东北及闽北各县党组织，特委书记先后由方志敏、唐在刚同志担任。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注），中央决定，在赣东北特委的基础上，建立赣东北省委，省委书记为方志敏同志。此时，整个信江特区已有七千五百余个党员，除县委外，有十八个总支，有二百九十多个支部（机关支部四十二个，农村支部一百六十个，军队支部十六个，城市、航运等其他支部八十个。）同年七月，中央正式决定将闽北划归赣东北省委领导。以后，根据地、游击区扩大至整个信江流域和赣北、闽北、浙西、皖南等广大地区，新开辟的地区也都有党的县委或区委组织。此外，游击区和部分白区，也有党的秘密组织，这些县委和党的组织均受赣东北省委的领导。

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党支部已有四百四十二个，党员已有一万二千四百三十六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赣东北省举行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全省党员已有一万三千余人。

一九三二年底，为更好领导四省斗争，中央又将赣东北省委改为闽浙赣（皖）省委。

赣东北苏维埃的工作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这与赣东北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赣东北的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在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党员也是零星的。那时，党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发展党员的方法，一般是通过亲串亲、邻串邻，在贫雇农和工人中秘密发展。要求入党的人，只要党员介绍，经支部大会通过，就成为新党员，但是在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必须喝鸡血酒宣誓。誓词是："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命令，打破宗族，不分姓氏，牺牲个人，不害同志，生死共存，永不叛党，如有变心，刀斩弹穿"，一九二六年以后，党的组织逐渐由秘密转为公开和半公开，各级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都分别设有组织、宣传等部门，这时，按照党章要求和规定，发展党员的手续也渐趋完善，要求入党的人，首先要本人申请，并填写入党申请书，再经党员介绍，支部通过，并由区委批准，宣誓之后，才能成为新党员。

当时发展党员的对象和条件，是以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威信、对革命忠诚、打仗勇敢、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成分只是标准之一。因此，所发展的党员，都是群众斗争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

党的各级干部的选择，是以在斗争中表现忠诚、积极、勇敢、有办法、有成绩、为群众所信任为主要标准。慎重选择，逐级提拔，不轻易调动工作，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和团结

外来干部，同时，注意提拔新的、优秀的工农出身的党员到党和苏维埃各级机关。其中，又特别注意培养妇女干部，如赣东北省苏维埃副主席徐大妹，青年妇女部长李火凤同志，妇女部长张荷凤、姚玉兰同志等，就是从本地干部中培养起来的女干部。

党的支部是很精悍的。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很强。一个一千多户的大村支部，也只有十几个党员，支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群众斗争，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和坚强堡垒。

发展白区党组织，也是赣东北党的组织工作特点之一。当时，党把发展白区秘密工作，看成是发展苏区、巩固苏区的一项重要任务。白区工作作好了，既有利于我军迂回出击，又能给苏区予各种支援，打破敌人封锁。方胜峰会议决定黄道同志去贵溪等地开辟第二根据地，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以后，发展白区秘密工作便成为党内外的一项经常的群众性的工作，为了发展白区工作，经常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挑选强有力的干部，经过短期训练，派往白区开辟工作，为发展新的根据地准备条件。同时，每当敌人向根据地进攻时，党员与群众，能在根据地以外找到关系的，都大量到根据地以外去，冲破一切白色恐怖的困难，深入敌后，到白色区域做群众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启发群众的觉悟，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组织，党员发展党员，团员发展团员，群众就发展群众参加群众团体。在敌人统治力量雄厚的地方，发展组织的办法，开始一般是利用兄弟会或其他带有封建色彩的形式和名义去发展的。白区工作到了一定的程度，条件成熟后，根据地就派游击队或正规红军配合行动，帮助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新的革命根

据地。

赣东北党的组织和全国所有的农村根据地的党的组织一样，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来自农民小资产阶级，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党要想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就必须加强党的教育，克服小资产阶级固有的阶级弱点，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个思想建设的任务是艰巨的。

赣东北的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教育工作，当时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加强党的理论教育，组织党员和干部参加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动员党员和干部在党的支部或小组会上，参与党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的讨论，以明瞭这些决议的是非，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抓紧方针政策教育。经常派遣党员和干部下去检查工作，开展工作，指导工作，以帮助他们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策略；重视军事教育，实现全党军事化，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学习军事知识，准备参加武装斗争，根据地除红军中的党员外，都参加地方武装组织；组织劳动锻炼，根据地的党员和干部都要有组织，有计划地经常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向工农学习，提高自己。

为了通俗地、具体地对党员，特别是工农群众中的新党员进行教育，赣东北党组织还以“二十二条”为中心内容，以“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为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二十二条的内容是：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战斗；对党忠诚；要随时随地去宣传群众；要随时随地去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

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勤学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地方观念；打破亲族观念；打破雇佣观念；打破领袖观念；打破迷信观念；不得贪污；要明瞭政治；接受批评；永不叛党。这二十二条，对根据地的党的建设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教育党员和培养干部，赣东北省委在根据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学校。卢森堡训练团等专门培养党员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一九三一年，赣东北省的党的“一大”后，又创办了一所固定性的学校。同时，各县、区委以至支部也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干部短期训练班，培养党员干部，共产主义学校是一九三一年在横峰枫树坞创办的，其任务是培养县、区级党的领导骨干。卢森堡训练团，是以德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家卢森堡命名办的一所培养党的妇女干部的学校。后改为“三八”女子学校。

各级党校及训练班，除少数专职教员外，都是同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亲自上课。

赣东北各级党组织都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当时，赣东北的党根据党员的大多数是农民，有家长制作风。根据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特点，在党的作风建设上，主要是强调与培养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赣东北各级党委会以至党的支部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原则。党委委员在集体领导下有详细的分工，党内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发扬民主进行切实的讨论。讨论的问题非常实际，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有不同意见，争到面红耳赤，一经多数表决，便完全服从组织决定，坚决执

行。这样，就大大地鼓励了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

党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党员都能奋不顾身地保护群众，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采取各种办法，减轻群众负担，大多数干部都自带口粮参加工作。根据地内，省委、县委、区委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赣东北党的这种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曾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总之，我认为，赣东北的党，在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赣东北省委领导下，政治上是坚定的、组织上是巩固的，在革命的生死关头，坚持了群众运动，开展了武装斗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实际斗争中，摸索了党的建设与苏维埃建设的一套办法和经验，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党的理论水平不高和党员文化水平低，也表现了它的朴素性，这说明在党的建设中，还缺乏系统地理论学习和总结经验。

十、巩固发展的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我离开信南特委，调任省赤色警卫师政委。

由于敌人主力进攻中央根据地，无力分兵“围剿”赣东北根据地，同时，由于我中央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一下也不敢分兵对其它各根据地轻举妄动。因此，在一九三二年，赣东北根据地得以较为稳定地巩固发展。利用这个相对稳定的大好时机，赣东北的党、赣东北的人民、赣东北的军队，做全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赣东北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根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制定的苏维埃经济政策，赣东北

根据地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的经济政策是：

一、没收帝国主义手中财产—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航运、矿山、工场等；

二、中国资本家及手工业企业，不违反苏维埃政府法令者，准许自由营业；

三、实行劳工监督；

四、保护商人正常自由贸易；

五、禁止大商人垄断价格，封锁金融；

六、禁止高利剥削，取消典当铺店，实行低利借贷；

七、发展合作社事业；

八、发展红、白区域之间的贸易事业；

九、禁止苏区内使用国民党政府纸币；

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

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首先就是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发布了各种决议，制定了各种政策，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赣东北省苏维埃作出了关于发展耕种运动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发展耕种运动，大量的增加农业生产，不但可以使工农群众有多余的生产品，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可以充裕苏区粮食及各种军需品，加强我们进行革命战争的物质准备。因此，应奖励耕种运动。

省苏准备用很大的力量发展苏区的农业生产，以发动群众耕种运动。在各种群众会议中，发动群众批评、指责那些对生产怠工的分子，而奖励积极生产者。对成绩优秀的，报告苏维埃政府给以发奖品。这样，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地区的革命和生活。

在当时，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使无土地或少土地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因此，赣东北根据地进行了很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省苏维埃成立后，正式制定了土地法。同时，苏维埃政府还规定不禁止土地租佃和买卖，但要防止地主富农乘机收回其土地；土地分配之后，非必要时，不再重新分配。如因人的生产和死亡的关系，苏维埃政府得按照情形将死亡者土地转人与生产者；农民分得土地山坑，须努力耕种，以免荒芜，如因怠工致田地山场荒废者，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得全部或一部分收回其土地，另给他人耕种。

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为了解决军用民需的工副业产品，赣东北根据地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注意发展了根据地内的工业生产。

赣东北矿藏、森林、药材等资源丰富，棉、麻、甘蔗等工业原料生产也多，有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武装起义后，就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小工业。到一九三一年，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方志敏同志亲自召开了苏维埃财经委员会，提出了大办苏维埃工业的方针，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当时，省、县、区、乡都有工业，创办了规模不等的煤矿、铁矿、发电厂、木炭厂、锅炉厂、铁砂厂、炼铁厂、兵工厂、硫磺厂、地雷厂、樟脑厂、造纸厂、硝盐厂、制糖厂、榨油厂、枯饼厂、染布厂、被服厂、织布厂、织袜厂、制鞋厂、石灰厂、农具厂、木船厂、中药厂等。并组织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基本上形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的工业体系。为此，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扬说："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

由于工业、农业的发展，交通邮电事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主要是修桥补路，建立渡口，添置船只，设立邮站，发行邮票。

随着工交、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地的财贸事业也发展和繁荣起来。并且规定统一财政收入。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两方面来源：一是取之于民的税收，一是取之于敌的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的罚款，财政委员会规定，各机关单位的缴获及打土豪的罚款，一律交政府统一入库，本单位不得擅自使用。

省苏维埃政府还定了农业税的征收和减免办法。

对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还统一供给标准。当时，军队每人每月三斗三升大米，地方干部每人每月二斗八升大米。菜金按日计算，军队每人每日五分钱，地方干部四分钱。苏维埃政府还发行纸币，发放公债，赣东北省曾在根据地内发行一元、一角、十枚铜元等三种面额的纸币，与银元通用。在反五次“围剿”时，决定发行十万元“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群众争相购买，红军，实际发行公债十四万元。乐平县一个妇女就买了三百元。当时规定公债本息一九三五年七月偿还，利息为一分息，后因条件不允许，未能偿还。但群众一直保存着，全国解放后，我们还兑换了为数不少的苏维埃纸币和如数偿还了苏维埃公债。

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当时，对调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的积极性，对巩固和壮大革命根据地，打击敌人的反革命“围剿”等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十一、曾洪易来到赣东北

就在赣东北根据地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赣东北根据地受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极大破坏和危害。

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党中央。四中全会后，中央即派万永诚（后叛变）、倪宝树（后叛变）来赣东北省委，在葛源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我当时是信南特委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由万永诚作报告，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会议认为，赣东北党还有立三路线，必须彻底转变。同时，又批评了赣东北党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等。在会议上，方志敏等同志即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赣东北党领导赣东北人民创造了工农红军，创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果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等，路线都错了，则无法解释这些事实。

省委扩大会议后，省委即部分改组。由中央指定，万永诚为省委书记，倪宝树为红十军政委，方志敏同志仍为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同志仍为军委主席，黄道同志为组织部长，派肖韶同志去闽北任特委书记。当时虽已传达四中全会和省委部分改组，但由于省委整个组织和红十军的领导都没有大的变动，万永诚初到，对各方面的情况还不熟悉，加之省委多数同志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以往的斗争传统，仍能正确执行毛泽东同志创立根据地的路线。因此，仍然取得了红十军一进闽北和反第二次“围剿”的重大胜利。

但是，正因为如此，中央认为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不彻底，一九三一年又派曾洪易（后叛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资格及吕振球同志、聂洪钧同志、杜石公（后逃跑、脱党）、关英（后脱党）等人来赣东北。

曾洪易等人到赣东北后，省委的情形就开始变化了，首

先是在省委组织之上，有一个决定一切的中央代表。其次是改组了省委，以万永诚为书记，聂洪钧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将省委委员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同志排挤在省委之外，将我和吴先民等同志分别调离红十军和团省委。再就是在省委常委内组织了一个以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为成员的三人主席团。

曾洪易一到赣东北，便积极执行王明“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组织路线，大搞宗派主义。挑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拉拢唐在刚等一部分犯过错误的同志，网罗执行王明路线坚决的柳真吾、李静愚等骨干分子，组成宗派小集团，排挤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

同时，曾洪易在政治上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赣东北党内继续反所谓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封建地方观念与保守主义。曾洪易断章取义地把同村大姓支部叫做封建地方主义的党；把富农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叫富农路线；把解决难民生活的实验农场叫做立三路线的过“左”办法；把游击战争中“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围点打援”等战术，叫做保守主义，等等。

就这样，曾洪易到赣东北后，不到半年，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将赣东北党的工作全部否定了，因而，为召开省党代会作好了准备。

一九三一年九月，赣东北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葛源开幕。这次大会，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虽然名义上参加了大会的领导，但实际上大会的领导权完全被曾洪易以中央代表的资格控制了。各种决议草案，都是由中央代表授意事先起草好，并经中央代表修改后提到大会上去讨论，大会讨论的中心不是各种决议草案，而是反立三路线、富农路线与保

守主义。会议最后通过了经过曾洪易修改的、大会没有充分讨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会议决议。在决议案中，不顾事实地指责赣东北的党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说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的，而是征服、拉夫、亲族和感情关系的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说党的支部根本不能领导群众，党的组织生活充满着富农意识、官僚主义、悲观、消极、畏缩、动摇等表现和倾向；说赣东北的雇农工会是富农工会；说赤卫队、少先队没有成为群众武装斗争的组织，更谈不上是群众的武装组织力量，等等。把赣东北的各条战线、各项工作说得一团黑。大会提出要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及四中全会路线的彻底转变，提出要消灭富农，消灭大小商业资本家。认为中农是最危险的，应该打击，贫农也是靠不住的，只能团结。

上述这些决议与指责，引起了绝大多数党员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但由于大会在曾洪易等人的把持下，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仍然按照他们的旨意，改选了省委。万永诚为省委书记，唐在刚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为省苏维埃主席、党团书记，邵式平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道为闽北特委书记，聂洪钧为红十军政委，关英为团省委书记，汪金祥为保卫局局长，并都参加了省委。以万永诚、唐在刚、涂振农、方志敏、邵式平等为省委常委。大会选举时，又将吴先民、邹秀峰、洪坤元等同志从省执委排挤出去。

大会以后，又改选了红十军的领导，聂洪钧、杜石公分别担任了红十军的政委和参谋长。

这样，赣东北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省委与红十

军就都在曾洪易的完全控制下了。

曾洪易在组织上完全控制了省委与红十军的领导之后，王明“左”倾路线便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使赣东北根据地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惨重损失，直至最后断送了赣东北根据地。

第一，军事上的盲动冒险主义。

一九三一年底，敌人已开始向我中央苏区等根据地发动了全国性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防止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敌人布置了近两万人的重兵于信江沿岸，并对赣东北苏区实行钳形包围，以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向前推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洪易在“保卫苏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下，消极防御，分兵把口，处处阻击，攻坚打硬。不要游击战，不要运动战。结果，使我军兵力分散，被动挨打。

方志敏及邵式平等同志坚决反对这一方针，因为当时我军既无炮兵，又无其它重火力武器，攻碉堡，打堡垒是极端困难的。所以，“持久围困堡垒”必然是拼消耗的、被动的、是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他们主张向皖浙方向发展，因为当时敌人为防止我们与中央苏区打通，已经集重兵于信江一线，而在皖浙边境的婺源、常山、江山方面，敌人力量则很薄弱，多是地方武装，又没有堡垒，且这一带有怀玉山为依靠，有利于我们回旋，迂回，又可威胁金华、杭州，牵制敌人，减轻中央苏区压力。我军若向这一带进军，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定能占领皖浙边境，巩固扩大苏区。再经仙霞岭与闽北苏区打通，再打通中央苏区，以取得反“围剿”的彻底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可是，曾洪易等人却认为方志敏及邵式平等同志这一主张，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是在敌人堡垒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而给以打击，将邵式平同志军委主席的职务撤掉，以唐在刚接任。

从此，曾洪易等人便发动红军主力，实现他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敌人在哪里筑堡垒，红军就开哪里去，使自己处处陷于被动，消耗实力。仅贵溪夏家岭一个碉堡，曾连续进攻四次均未攻克，部队伤亡千余人。由于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盲动冒险主义政策，结果，不仅未能打通中央苏区，而且，由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赣东北地区未能粉碎，使根据地损失很重。

中央苏区反第三次“围剿”胜利后，敌人虽然暂时停止了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但赣东北根据地只剩下横峰一个县城和弋阳、贵溪、上饶、德兴、乐平等县境内纵横二、三百里路的地盘了。

第二，政治上的极“左”路线。

曾洪易为实行其所谓“国际中央路线”，提出“明确阶级路线，反对富农路线”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修改了土地法，实行“消灭富农，打击中农，联合贫农”的极“左”政策。无条件地收回地主、富农分得的田地，驱逐地主、富农出境，叫做“减轻苏维埃负担，加重国民党负担”。结果把大批地、富驱赶到白区，增加了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力量。由于禁止敌占区群众的“白皮红心”，断绝了苏区与白区群众的来往。结果，使我党的敌后工作全部遭到破坏，使苏区边境封锁，消息闭塞。同时，在党员、干部中，则不顾党员、干部的斗争历史和现实表现，出身不好的一律被认为“异己分子”，都要给以“无情打击”。无条件地开除党

籍，撤消职务。甚至男女婚姻，因成分不好，都要退去婚约。结果，使党内不团结，干部情绪低落。

方志敏等同志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却被戴上了所谓“富农路线”、“右倾路线”、“包庇异己分子”、“立场不稳”等帽子。结果，使得地主更加反动，富农不满，中农动摇，贫雇农陷于孤立，地富子女，人心惶惶。给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第三，肃反中的严重扩大化。

曾洪易疯狂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造成军事上的失利，环境日益严重，群众动摇，干部表现不满，等等。这些情形的出现，曾洪易都看成是反革命的破坏，施以肃反压力。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三月间，鄂豫皖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曾洪易等以鄂豫皖肃反后打过胜仗，便提出了“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同时，中央亦有指示，责难赣东北肃反工作未开展。这时，适有由上海派来做文化工作的潘务行、工会工作的何东桥、互济会工作的罗子华，对曾洪易及省委领导不满，曾洪易便对他们怀疑。他们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要洗脚、爬山等，曾洪易认为是以“健康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吴先民同志亦因对曾的领导与路线不满而有议论，曾认为是反革命派别活动，逮捕吴先民。于是，惨痛的赣东北肃反就这样在地方和红军中开始了。

肃反开始时，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说反革命虽有，但不致有这样多。吴先民等是长期斗争中考验过的忠实党员，不会是反革命，并在省委常委会上同曾洪易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曾洪易即给方志敏、邵式平同志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帽子，加以隔离，强制方、邵写检讨书，并在群众中公布。

从此、肃反更加疯狂，从军队到地方，由上级到下级，由机关到农村，由赣东北到闽北，都大举肃反。在肃反过程中，既不相信同志，又不调查研究，只是滥加罪名，严刑拷打，指名逼供，乱捕乱杀。无数革命群众在这种错误的肃反政策下含冤而死。许多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群众斗争领袖与重要干部，如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同志，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同志，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同志，闽北党的创始人陈耿、徐福元同志，还有舒翼、兰广平、徐跃等同志，都被曾洪易以“A B团”、“改组派”、“罗章龙派”、“第三党”、“反共会”、“铲共会”、“大刀会”、“兄弟会”等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惨遭杀害。县、团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出身的负责干部大部被肃反搞掉。弋阳、德兴、乐平的整个县、区、乡、村干部也大都被肃反搞掉。甚至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干部和交通员也调来苏区，加以杀害。国民党正规部队及地方武装中的一些起义官兵，有的携妻带子来投奔革命的，也都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将其杀掉。同时，在群众中也开展肃反，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十七所，关有所谓“A B团”犯一千一百多人，被杀害的达三百余人。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

这次肃反错误，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五年尚未完全停止，给赣东北的党、赣东北的军队、赣东北的人民群众、赣东北的根据地建设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惨痛损失。

曾洪易在肃反中的严重扩大化，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1）由于乱捕乱杀，大伤了党的元气，造成了干部动摇恐慌，人人自危，使党内产生一种严重的恐怖表现；（2）许多军事骨干的被杀，影响了红军的作战情绪，减弱了战斗力，使军事遭受不断失利；（3）由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被杀，引起群众对党怀疑，隔离了苏维埃与人民、党与群众的

联系；（4）由于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被杀，造成了赤白严重对立，失去了苏区周围群众工作的桥梁，影响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5）杀投降官兵，杀俘虏，破坏了党对投降兵、俘虏兵的政策。

一九三四年七月，七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军。曾洪易仍为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寻淮洲为军团长。部队在曾洪易等人的指挥下，处处被动，在与敌人交战中遭受惨重损失。在此情况下，十月间，曾洪易知道中央红军已长征了，即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在部队和干部中散布失败情绪。主张党不要武装，应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至此更悲观失望，企图逃跑。方志敏同志将此情况电告中央，撤消了曾洪易的全权代表职务。后来，中央决定七军团与红十军合并，组织十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方志敏为随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部队即向皖南行动。但是，此时敌人已在皖浙边界布有重兵，我军与敌人交战，伤亡惨重，寻淮洲同志牺牲。刘畴西指挥不力，缺乏机动，部队又回到苏区，进到怀玉山区，不幸被敌人包围打散，方志敏同志被捕，英勇牺牲了。而曾洪易此时已逃去南京，向敌人告密自首，成为可耻的叛徒。不久，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闽浙赣皖苏区遭受敌人残酷摧残。

后来在延安和北京，毛主席曾多次对我说：方志敏同志牺牲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王明路线把好多同志都断送了。象方志敏、何叔衡、刘伯坚等好多好同志，都是王明路线下牺牲的。这真是血的代价，惨痛的教训呀！

写完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想说明一下：赣东北根据地这段历史，确实不应该由我来写，就我的阅历，我的水平，是

无论如何不能挑起这个担子的。但是，赣东北苏维埃的创建，迄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在这四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中，当年创建赣东北闽赣根据地的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投身到根据地建设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绝大多数都已牺牲或病故了。我是幸存者之一。为纪念先烈，为勉励自己，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我觉得我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写出来，尽管是力不从心，挂一漏万，但我还是根据我的回忆和掌握的资料，硬着头皮将这段历史写出来了，也算是对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牺牲了的同志的一个悼念吧。

一九八〇年三月

〔注〕建立赣东北省委的时间，实际上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赣东北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了省委成员后，才正式建立起来的。

——编者

漫谈闽浙赣老根据地

龙跃、江天辉、黄知真、缪敏集体漫谈

黄知真执笔

我们几个人都是闽浙赣的同志，早年是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领导之下工作的，凭着四人的记忆，将过去二十多年闽浙赣根据地的斗争，零乱的记载这一些，自然，遗漏了很多重要的环节，并且错误之处一定很多，尚请闽浙赣老根据地的一些革命先进同志们予以批评和指正。

（一）共产主义在闽浙赣生了根发了芽

一、闽浙赣介绍：

“青的山，绿的水，灿烂的山河，美的衣，鲜的食，玲珑的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着烂衬，住茅屋，吃的烂蕃薯，工农们，真辛苦，军阀要拉夫，劣绅压，土豪欺，贪官污吏抢，全世界工农们联合起来啊！”

这是大革命时候，在闽浙赣广大群众中流行的一首歌子。

的确，闽浙赣是一个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的美丽地方，东到大海，西到鄱阳湖，南到闽江口，北至长江，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有着磨盘山、武夷山、黄山、仙霞岭、洞宫山等美丽山区，有着沃野千里的平原，有着丰富的农作物，也有着无尽的地下宝藏。

可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之下，闽浙赣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基础根本谈不上，而广大的农民也过着极悲惨的生活，农民说："镰刀挂上壁，饭就没有吃。"尤其是第一次大战后，农村经济更加急剧地走向破产。

广大受压迫的闽浙赣农民，为着生存，早在大革命之前就进行过许多英勇的斗争，弋阳邵家坂的农民武装赶走过反动县官，铅山和尚坪的农民在洪门会领导下，拥护一个叫朱龙田的七岁孩子做皇帝，成立大和国，武装打下过石塘镇，福建的大刀会遍及闽北各县，吃大户，捣毁地主粮仓更是普遍发生。

革命前的赣东北，充满了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都先后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了起义之后，闽浙赣人民革命斗争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在弋阳、横峰两县开始了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底贵溪、上饶也开始了起义，苏区发展到整个信江流域，成立了信江特委和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到一九三〇年，苏区发展到乐平、浮梁、波阳、婺源和浙江的开化一带，包括整个赣东北，成立了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此时，闽北方面也早在一九二八年开始了起义，建立了闽北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中央决定将闽北划归赣东北领导后，又改为闽浙赣省，一九三五年游击战争时期，闽东北苏区与闽北苏区会合了，皖南新游击根据地发展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整个的闽浙赣苏区，实际上包括江西、浙江、福建、安徽四个省，由赣东北、闽北、闽东三个苏区根据地和皖南、浙南两个游击根据地所组成。苏区的人口约在一百万左右，游击

区的人口则在二千万以上，这个苏区在二十六年的斗争中，经过无数迂迴曲折的道路，熬过数不完的艰苦困难，牺牲了几十万宝贵的生命，始终坚持着顽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二、共产党出现在闽浙赣。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震动了全中国，也波及到穷乡僻壤的闽浙赣，闽浙赣人民的光荣领袖、不朽的方志敏，最早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方志敏同志于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入了党，黄道同志和邵式平同志也先后于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加入了共产党，通过这几个闽浙赣人民革命的先驱者，共产主义的种子播种到了闽浙赣。

一九二三年方志敏同志在南昌组织的改造社，吸收了许多闽浙赣地区的青年参加，一九二五年方志敏同志回到弋阳。在弋阳高小同学中组织了青年学会，方志纯、黄镇中、邵伯平、舒翼、汪明等都是当时的会员，黄道同志在横峰高小同学中组织了岑阳学会，吴先明、程伯谦、钱壁、李穆、邹秀峰，都是当时的会员，邵式平同志在邵家坂成立了益友社，通过这些组织，团结和教育了大批的先进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闽浙赣共产党的骨干和群众领袖。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已经进入了江西，方志敏、黄道、邵式平同志都先后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邵式平同志在弋阳与方志纯、雷夏、黄镇中、舒翼、胡德兰等同志成立了弋阳共产党支部．黄道同志在横峰与吴先民、邹秀峰、钱壁、李穆、黄端喜等同志组织了横峰共产党支部，其他如舒同同志在东乡、江宗海同志在贵溪，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陈耿同志在福建崇安也建立了党的组织。

从此，共产主义在闽浙赣人民中生了根，并且很快就萌芽了。

三、漆工镇捣毁派出所，邹秀峰坐镇横峰城。

随着共产党组织的产生，各地的农民运动也迅速的开展起来，尤其是弋阳、横峰一带，早在一九二四年方志敏同志就开始在自己的家乡湖塘村进行了工作，通过方远辉、方远杰几个同志传播革命思想，一九二五年方志敏同志回家时，又在湖塘创办了义务小学和农民夜校，通过这两个学校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农民协会，随着湖塘农民协会的成立，弋阳九区及八区七区各一部便开始成立了农民协会，到处酝酿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

在横峰方面，黄道同志在姚家垅、楼底蓝家一带，吴先民同志在青板桥一带，程伯谦同志在葛源一带都经过各种关系，发展了农民协会，贵溪、上饶等地也有些农民协会的组织。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到了江西，方志敏同志主持江西农民协会，各地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便有了更大的发展，到处收缴北洋军伐溃兵的枪械，替北伐军带路，使得北伐军能够很迅速的占领赣东一带。

北伐军虽然占领了赣东，但是各地的政权，仍然掌握在豪绅地主反动派手里，于是在北伐军胜利鼓舞下的各地农民协会，便纷纷地高举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旗帜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向地主阶级和反动政权的斗争。

弋阳九区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打下了漆工镇，捣毁了反动的警察派出所，横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攻克了横峰县城，赶走反动县官，此时，恰逢邵式平同志以省政府特派员资格来到赣东一带，立即委任共产党员雷夏为漆工镇巡

官，邹秀峰为横峰县长，吴先明为横峰公安局长，掌握这两个地方的政权和武装。

此时运动更加发展，农民协会到处捉土豪游街，到处封闭地主房子，没收地主财产，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赣东各县开展起来了。

四、姚家垅三打横峰县，吴先明首上明山岗。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赣东形势开始紧张，贵溪江宗海同志被反动武装杀死在县党部，李烈钧进到上饶成立反动的江西省政府，并且在地方封建势力的互相勾结下，于一九二七年五月间进占横峰、弋阳一带，黄道同志等出走南昌，钱壁、李佔韩等同志及黄道同志爱人吴品秀、吴先明同志爱人周嫦娥被捕下狱，各地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受到了第一次的打击。

横峰县姚家垅楼底蓝家一带的农民，听到敌人进到县城，听到许多同志被捕越发怒不可遏，在黄端喜、黄球等同志领导之下，武装进攻横峰县城。

第一次集中了七十余人带着土枪土炮，进到横峰城西五里之塔脚山时正遇到从河口开来的一连敌军，起义群众被击散。第二次起义群众正在集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已经进到姚家垅，又被迫解散。第三次集中了一千余人，带上九门土炮，于天未明即进到横峰城下，拂晓时一声土炮，农民们奋勇爬城，打开城门，一路直捣县政府，反动县长从梦中醒来，赤脚跳墙逃跑，一路农民打进监狱，用石头打破牢门，背走被捕同志，等到河口救兵赶到时，农民们早已唱着凯歌胜利而回了。

与此同时，吴先民同志率领横峰县警察局的八条枪，转到青板桥，旋又到明山岗一带，方志纯同志和雷夏同志率领

漆工镇警察派出所两条半枪转到弋阳八区山地与农民自卫军一道共同坚持游击战争。

也可以说这是闽浙赣伟大起义的前奏。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五县共产党员集会窖头村。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也笼罩着江西，许多同志被捕了被杀害了，许多同志被迫转入了地下，进行秘密工作。许多同志被通缉。

一九二七年朱培德在南昌，欢送共产党出境不久，邵式平同志回到了弋阳邵家坂，八一起义后，黄道同志被通缉，也潜回横峰姚家垅，秘密与弋、横各同志联系，九月间，方志敏同志从吉安回到了弋、横地区，带回“八七”会议决议精神，经过联系后，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集赣东北五县共产党员会议，出席会议的：弋阳方面有方志敏、邵式平、方志纯、邹琦、彭皋、黄镇中、方远辉。横峰方面有黄道、吴先民、邹秀峰。贵溪方面有邵棠。上饶、铅山缺席。地点在弋阳九区窖头村，会上方志敏同志传达了“八七”会议的决定，他说：

“大革命已经失败，但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未解决，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现在的办法只有从新革命，组织农民暴动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会议上一致同意方志敏同志的传达，并且具体规定了：1.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匪帮。2.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3.平债分田建立劳工政府。4.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等起义纲领。

为着积蓄革命力量，会议决定以村为单位，秘密组织农

民革命团，作为起义的骨干。

最后成立了弋横工作委员会，选出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等七个同志为委员，以方志敏同志为书记，并具体分工：黄道同志在弋阳九区漆工镇一带，邵式平同志在弋阳七区邵家坂一带，方志敏同志在横峰楼底蓝家、姚家垅一带，吴先民同志在青板桥一带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时，为着隐蔽起见，大家都改了名字，方志敏同志化名汪祖海、邵式平同志化名余艳王、黄道同志化名陈松寿、吴先民同志化名薛子廷、邹秀峰同志化名丁俊人。

二、弋、横各地起了农民革命团。

大革命失败后，正在被官僚地主倒算报复下，弄得无路可走的农民，看到自己的领袖回来了，听到窖头会议后各负责同志带来的革命办法，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到处传播“打倒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的口号，那些原来农民协会积极分子们更是到处找寻可靠的工作对象，非常秘密的告诉他们：

“现在共产党来了，告诉我们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不还债，不交租，你赞成吧？”

“有这样好的事？我当然赞成。”

“你赞成就上一个名字罢。”

就这样经过这些积极分子一串十，十串百的发展起农民革命团的组织，同志们就依靠这些组织来召开会议，解释政策。并且采用农村的旧形式，吃鸡血酒举行宣誓。

到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底，便在弋横交界掌握了姚家垅、楼底蓝家、青板桥、明山岗、窖头、湖塘、燕坞黄家、丁山等等大小几十个中心村，就组织了八十几个团，农民们

偷偷做好红旗子，并且以打野猪为名，把土枪土炮抬起来，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起义准备成熟了。

三、楼底蓝家的信号，伟大的起义开始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方志敏同志在楼底蓝家响起了第一声信号枪，楼底蓝家是属于横峰而靠近弋阳的一个百户左右的山庄，村内除了两三户地主之外，都是种田的农民，农民们在农闲时，还集股开了一个小小的煤炭厂，作为自己的副业收入。

早在一九二六年，黄道同志就开始在这里进行了工作，一九二七年北伐军进到横峰之后，楼底蓝家在黄道同志领导之下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过赶走反动县官和三打横峰县城的战斗，在战斗中出现了蓝长金、花春山、蓝高茂等群众领袖。

窖头会议后，方志敏同志来到了楼底蓝家，住在花春山同志的家里，为着隐蔽起见，他有时穿着草鞋化装成一个农民，有时穿着长衣裳化装象一个商人。他首先领导该村农民用软的拖欠办法进行抗租抗债，并在斗争中发展了农民革命团，农民蓝长金就是该团的团长。

十二月十日横峰法警四人，坐着轿子耀武扬威的来到楼底蓝家催讨煤炭税款，农民们先用软的办法，不行，法警要动手捉人，此时蓝长金同志在请示了方志敏同志后。即召集农民革命团十多人，把法警步枪一枝缴下来，把轿子打烂，四名法警见势不对，也狼狈逃回横峰。

当夜方志敏同志召集楼底、姚家垅、管山、蓝子坂等九个村的农民革命团领袖，聚集在花春山同志家里，说明暴动的意义后，一致决议展开平债分田，实行起义，弋、横起义的第一面红旗展开了。

起义总指挥方志敏同志，在楼底蓝家发出的信号一响，弋阳九区燕坞黄家、丁山、窖头、漆工镇一带，在黄道、方志纯、邹琦等同志领导下，在弋阳九区大溪头举行了七十多人的代表会决定“打土豪分田地”。会议结束后九区起义也开始了，横峰三区青板桥、上坑源、明山岗一带，在吴先民、黄立贵、吴先喜等同志领导下集合二千余人在青板桥召开大会，举起了义旗。

弋阳七区邵家坂一带，在邵式平同志领导下，横峰葛源在程伯谦同志领导下都举行了起义，数日之内纵横百里的广大弋横地区到处插上了红旗，农民们烧毁了地主的债据田契，没收地主的粮食，处分地主罚款，开始分配土地，农民革命团成了实际上的乡村政权。

起义胜利后，党的组织也正式将原来工作委员会，改组为弋、德、横中心县委，仍由方志敏同志为书记，并在弋阳、横峰、德兴成立三个县委，各路起义军在中心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兵数路向外出击，那些封建堡垒村就一个个被起义军打下了，那些工作较弱的村庄也纷纷写上名字，到起义中心来接头，革命浪潮迅速的展开着，至今苏区群众还深深记得暴动初期的一支歌谣：“弋阳方志敏，横峰吴先民，领导共产来革命，都是为穷人。”

四、眺高守夜打号铳，白皮红心假接头。

不久，国民党军队，探知起义武装的虚实，开始分路向起义区进攻，各地的地主武装——靖卫团也逐渐发展起来，弋阳的过港埠、曹溪、芳家墩、横峰的葛源、铺前等地，成了反革命的反动中心，敌人依靠这些反动武装，每日向起义区进攻，所到之处火光冲天，烧杀抢劫，鸡犬不留。

一九二八年一月间邹琦、钱壁、项春福等同志，在青板

桥西北三里的黄金巷被袭击，项春福同志当场牺牲，钱壁同志被捕押回牺牲于横峰，邹琦同志裤裆上打了四五个洞逃出来，接着吴先民同志、黄球同志在青板桥被伪装起义之反动军队押解至河口天主堂，幸被逃脱，同一时间弋阳方面马王庙地主利用本地流氓伪装起义，请雷夏同志领导，雷夏中计，一入村口即被打死，李穆同志亦在弋德交界处牺牲，斗争已经进入更尖锐的阶段了。

人们为着保护自己的斗争果实，每个村庄在自己村庄前后的高山上，每日都派出了人放哨，群众叫做眺高。眺高的人带上一枝敬神用的三眼铳，望见敌人打第一铳，敌人来了打第二铳，敌人到了再打第三铳，群众叫做号铳，听到第一铳群众早作好了准备，三铳一响都扶老携幼牵牛挑担的转入深山。敌人进村之后，除了走不动的房灶之外，什么也找不到，每日里沿着敌人前进的路上，号铳接号铳，坐在山头上，可以将敌人进兵方向弄得一清二楚。

敌人在到处扑空之后，觉得非取消这个讨厌的号铳不可，于是一面以烧杀相威胁，一面放出空气说：只要有人接头，就没有问题，来欺骗群众。在此情况下起义区的群众又想出了“白皮红心”的办法，来抵抗敌人，果然村村都接了头也找不到一个眺高的了，也听不到号铳声了，可是敌人所到之处还是什么也没有，还是捉不到一个人，什么道理呢？原来每天村头山上都有几个人在砍柴火，他们一声不响，有时候却突然叫了起来，谁家的牛吃了禾，群众听到牛吃禾还是照样的扶老携幼，牵牛挑担，转到山上去。原来这就是新的眺高守夜，新的打号铳。

对于那些领导起义的领袖们，群众更是保护得无微不至，同志们用不着带行李，只要到了那一个村子背后的山

上，派一个人下去通知一声，说老汪或者老余老陈来了，饭菜被褥立即送了上来，有时敌人要搜山，要老百姓派人带路，事先群众就会派人来通知你，明天敌人要搜什么山，你们要跑开，群众看到同志们总是说：同志，我们这叫做红心蕃薯，外面白，心里红，只要你们在，我们总会出头的。

五、方胜峰会议。

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敌人看到局部的一些进攻都没有用，便开始派出部队及强迫苏区周围数万落后农民，分四路向苏区大举进攻，一路由弋阳向漆工镇，一路由葛源向西，一路由鋪前向青板桥，一路由过港埠向霞阳、金鸡山，每路都有几千人带着斧子锯子扬言砍光苏区树木，带着小车箩担要抢光苏区财物，苏区日渐缩小，转来转去总在磨盘山周围打圈子，红军力量又小，又分散，战斗力又弱，加之苏区内部反革命分子又乘机活动，和敌人通消息，情况显然是十分严重的，党内的思想也不很一致。

为着统一思想，明确方针，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弋横交界一个偏僻的光山上的方胜峰冷庙里，召集了弋横两县干部会议，现在就让我们叫它做方胜峰会议吧！

出席会议的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邹秀峰、吴先民、方志纯、庞先飞（湖北黄安暴动失败后调来的）等同志共二十余人，方志敏同志是大会的主席。

一开始庞先飞同志就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他以为：

全国二百多个暴动都失败了，只剩下了井冈山和赣东北等几个地方了。现在情况又这样严重，眼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提议：

“把枪枝埋起来，把红军解散，几个负责同志到大城市去。”

这个意见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方志敏同志在冷静的分析了当时情况后说：

“我们在这里有群众，如果我们遇到困难就埋枪逃跑，群众牺牲太大，丢下群众逃跑，那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如果这样那就对不起广大起义群众。”

接着方志敏同志斩钉截铁地说：

“谁要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可以走，我们不走，我们是要同起义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坚持下去的。”

全体到会同志都一致同意了方志敏同志的意见。

但是怎样坚持下去呢？

有的同志主张把枪带走，离开敌人围攻，把敌人引出去然后再回来。

会议上对这个意见又作了分析，觉得这里有群众，地形又熟，有依靠。而到根据地以外去，情况又不熟，无群众基础，困难一定更多。

最后方志敏同志结论说：

“第一，敌人很分散，各路很弱，又没有群众。我们力量可以集中，选择敌人弱点，先打一路。第二，反革命在活动，群众有些动摇，一定要镇压反革命。第三，为了作万一转移阵地的准备，要开辟新的根据地。”

大家一致同意方志敏同志的意见，决定：

1.部队全部集中，共四十多人，四十枝枪，由邵式平同志统一指挥，选择从过港埠出来的敌人最弱的一路，坚决打下去。

2.由方志敏同志带六条枪镇压反革命，说服群众。

3.派黄道同志到贵溪开辟新的根据地。

当天晚上在蒙蒙细雨中，大家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了方

胜峰。

六、首战金鸡山，伏击樟树墩。

方胜峰会议后的第二天，邵式平同志率领集中起来的四十条枪，正在竹篷窠休息，从过港埠来的敌人已到了金鸡山，那些挑箩担子的正在金鸡山抢东西，一个连的敌军则与吴先民、花春山同志带的几条枪在金鸡山上打响了，邵式平同志听到群众接二连三的报告之后，跑到竹林外面一看，但见十多里路一片火光，被敌人追赶着的群众漫山遍野的乱跑，立即率领部队绕过金鸡山脚到达鸡金山后面，敌人还正在向吴先民、花春山同志坚守的山头冲锋呢！我军出其不意从敌人屁股后面杀出去，马上就把他冲垮了，在山上跑反的老百姓，看到敌人一垮也都回过身来，拿着鸟铳又漫山遍野的追赶下来，到处喊杀，到处喊打，那些在村里抢东西的砍柴队听到敌人一垮也都提起梭镖，丢下箩担，往过港埠挤回去，后面的人手上平拿着的梭镖，刺到前面人的屁股，前面的人，以为红军来了，一面叫“同志，我是抓得来的”，一面更拼命的跑。

敌人垮了之后，部队的情绪也很快提高了，饭也不吃，一口气追了五十里，直到过港埠，这一下把弋阳城也震动了，国民党县长连轿子也不要，望南门就跑，城里也是一片风声鹤唳，当晚再回到竹篷窠，恰遇从青板桥退回一路之敌，又一打将敌击溃。

粉碎敌人两路进攻后，算准了弋阳出来的一路一定要回去的，第三天晚上一个急行军跑了八十里，在樟树墩打埋伏，该死的敌人果然开来了，等到敌人走了一半，我们拦腰一打，又是一个大胜仗，其余一路看见势头不对，加上农民中的革命分子，乘机散布“红军来了”，被胁迫的农民一哄

而散，敌人也就退了回去。

敌人第一次的全面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与此同时，弋阳、横峰的镇压反革命，稳定群众的工作也取得了成绩，弋阳漆工镇反动地主被我们打死，横峰姚家垅反动富农黄振庐刚刚写好接头书，就被革命农民黄振久杀死在自己家里，在金鸡山胜利鼓舞下，群众情绪又高涨起来了。

七、攻打横峰县城，粉碎二次围剿。

一九二八年八月敌人重新增兵，以河口调来四十六军杨劲部的罗英团为主力，配合各地反动挨户团、靖卫团向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这个部队原来是土匪部队，进到苏区之后就在苏区内大肆抢劫烧杀奸淫。

红军与群众在与敌人转战了一个月之后，乘隙挺进到横峰城下，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攻克了横峰县城，歼灭守城靖卫团，缴枪十余支，这是赣东北起义后第一次打下县城，为着庆祝这个胜利，农民们自己编了下面一个小调：

“九月念四天，攻打横峰县，红军赶到城门边，不到五更天，

可怜的狗官，睡梦在床上，枪声一响逃到笔架山，在莲荷吃早饭，

枪声响二声，逃到杨梅岭，丢掉枪支不要紧，自己要逃命，

枪声响三声，走到大辽渡，浮桥马上两边拖，不知红军有几多。”

横峰胜利后，立即调动了进攻苏区之敌，同时加上朱培德怀疑该部不稳，将该部调回缴械，二次围剿就这样粉碎了。

八、贵、余、万与上饶的起义。

早在大革命时期，江宗海同志就在贵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农民协会，打过土豪，捉过贵溪最大地主丁佛堂游街，江宗海同志牺牲后，贵溪斗争受到打击，但是，大革命时候的影响，仍然在广大群众中，深深的存在着。

弋、横起义的影响，迅速地传到贵溪一带，农民们到处传播着弋、横起义的消息，描述着方志敏同志等的各种斗争故事。“磨盘山”的名字深入到每个群众的心里。

方胜峰会议后，黄道同志翻过大山来到周坊邵家，最先住在邵棠同志的家里，不久搬到白沙岗，最后住在离周坊三里的一个小庄子上，带着几包济众水、万金油、八挂丹，以行医为名进行工作，并成立了贵溪县委。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周坊邵家、标溪夏家、小田毕家和裴源，以及余江大桥一带都上了名字，吃了鸡血酒，建立农民革命团。

到一九二八年底以周坊邵家为中心的周围数十里地区，实际上农民革命团成了半公开的组织，置备了各种各样的红旗子和颈子上挂的红布条子，背着鸟枪的农民革命团团员，便在村子上走来走去了。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从弋、横根据地派来的八条枪来到了周坊邵家后面一个小庄上，第二天召集了以周坊为中心的几十里的农民革命团员大会，举起了第一面红旗。紧接着小田毕家、标溪夏家，和万年余江边境一带的起义也开始了。

起义之后，一方面从贵、余、万向东，一方面弋、横从东向西逐渐的会合起来。

此时上饶方面，茗洋关一带，在江立山、王礼西、李步

新等同志领导之下也举行了起义。

苏维埃根据地从弋横发展到了包括上、横、弋、贵、余等县广大地区的整个信江流域。

九、女英雄杨莲花和周志群部的起义。

二次围剿粉碎后不久，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敌人又再调周志群旅为主力，向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在苏区到处横冲直撞，大肆奸淫掳掠，群众当时有一个小调描述周志群的烧杀，歌词是这样的：土匪周志群，开兵打弋横，弋横百姓不安宁。土匪理不端，放火来烧山，农民的东西被烧光。

但是因为时居严寒，天天下雪，周匪士兵都穿着单衣单裤，士兵们怨声载道，我们则抓住这一点到处进行兵运宣传，从此周匪内部都就不断发生哗变，尤其是一九二九年二月，龙志光同志率领的一个营起义，更直接震撼着敌人的进攻部署。在这次起义中，女英雄杨莲花创造了不朽的功绩。

杨莲花，横峰三区明山岗人，贫农出身，自幼失去父亲，依靠母亲扶养，是一个年幼而聪明的女孩子。起义后参加革命，进步很快，她家里曾经三次被烧，不得已与母亲逃到山上架茅屋住。

第三次敌人围剿时杨莲花和其他十几个妇女一道不幸被捕，被捕后敌人强迫她们答应做老婆，起初她们坚决不肯，后来想想在敌人军队中也可以做工作，便答应下来了。

这十几个苏区妇女，虽然都与国民党下级军官结了婚，但是她们并没有安于享受，相反的三个多月来在敌军官和士兵中做了不少工作。向他们介绍苏区情况，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团结了象龙志光等同志这样的下级军官（当时龙同志等好几个人都是该营的排长）和广大的士兵在自己的周围。

一九二九年二月，周匪将要调防南城的消息传到了士兵

群众中，杨莲花同志抓住了这个时机与龙志光等同志研究决定组织起义，于是在一个早晨，依靠杨莲花同志的努力，依靠龙志光等同志的直接作用，强迫该营营长率领二个连举起义旗投向红军。

这个营的起义，一方面动摇了整个周志群匪部的部署，一方面使当时的红军力量增加一倍（当时红军也只有两个连），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攻，鼓舞了苏区的群众情绪。

几个月后，杨莲花同志又第二次被捕，敌人还是无耻的强迫她做老婆，这时杨莲花同志指着敌人的鼻子说："我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宁死也不愿嫁给反革命。"当晚这个贫农的女儿，一个苏区普通的小姑娘，杨莲花同志光荣的牺牲了。

接着四月间，敌人又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后，于长茅岭一次伏击战，击溃敌人一路，四次围剿也被粉碎了，苏区的局面有很大发展，人口也由十万发展到四十万，奠定了闽浙赣苏区的基础。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江西省委派唐在刚同志来到弋、横地区，决定将原来中心县委扩大为信江特委，以唐在刚同志为书记，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等同志为委员，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以方志敏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辖弋阳、横峰、贵溪、上饶、德兴、万年、余江、铅山等八个县委。

十、红旗飘扬在武夷山上。

早在一九二七年陈耿同志从福州回到武夷山麓的崇安县，组织了民众会，建立了党的支部，最初参加的有徐福元、祝维垣等同志。

一九二八年赣东北弋阳、横峰起义的消息，通过每年一

度的采茶工人带到了崇安一带的广大群众之中，立即掀起了崇安各地群众的抗租抗债斗争，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而遭受到失败。

此后崇安党便进一步深入到乡村，在抗租抗债、分田分地的口号下准备起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与准备，一九二八年六月陈耿同志首先在崇安东北地势十分险要的大小梅竖起来了第一面红旗。

大小梅的红旗一举，大悍、水对龙、大王四、王子袋、坑口、长涧源一带纵横百余里的广大山区紧接着也举行了起义。

起义胜利后国民党福建军阀卢兴邦就开始了对起义区的进攻，当时红军只有几十个人，两支枪，其余都是土枪土炮，但是起义军就依靠这些武器，依靠大小梅的丛山峻岭，依靠群众的掩护坚持着，敌人一来就上山，用土枪土炮，挨丝炮同敌人打，敌人一走就下山做群众工作，或者向外面出击。一九二八年八月起义军在崇安白水镇瓦解卢兴邦一个班，缴枪十二支，接着打下崇安以东之五夫镇，缴获步枪二支，起义军声势便更加扩大，民众会也发展到千余人，成立九个农民革命军连队。

一九二九年二月靠近福建边境武夷山麓的江西铅山县石垅、龙鹤和尚坪、篁村、车盘一带，由黄怀仁同志从横峰发展过来的党的组织所准备的起义成熟了，开始了铅山的起义，起义后革命力量迅速向上饶南乡的毛楼、禹溪一带发展，在一九二九年八月间与陈耿同志领导的崇安起义区打成了一片，并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歼灭分水关下乌石镇口税卡子，缴步枪八支，起义军发展到一个连，至此闽北根据地就包括崇安、铅山、上饶三个县交界的广大地区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正式成立了闽北红军独立团并开始吸收了赣东北的经验，从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

十一、两个根据地的会合。

如果要说闽北与赣东北两个根据地的会师，应该是从一九二九年八月铅山、崇安两个根据地会合算起的。八月会师后，赣东北便派黄富武同志首先到了闽北，帮助闽北红军的整顿和苏维埃的建立。

但是两个根据地的正式合并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中央正式决定将闽北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后开始的，并将闽北独立团调到赣东北集中。从此，闽北苏区就成了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

红十军从景德镇回师后，赣东北又派黄立贵同志率领原闽北独立团回到崇安与坚持闽北斗争的武装会师，会师后首先在崇安到坑口的白沙岭上歼灭了从崇安向坑口进攻的敌人一部，并接连攻下了崇安以东的五夫、崇安西北的大安等地。闽北苏区又得到很大的发展，除了原有的崇安、铅山、上饶地区之外，又发展到浦城、建阳一带。

接着一九三〇年底肖韶、邹琦、吴先喜同志又先后到达闽北，正式成立闽北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道同志来到闽北后，更加强了闽北党的领导。

（三）苏维埃根据地的缔造

一、两条半枪创造了红军和苏维埃。

闽浙赣男女老幼都知道“方志敏两条半枪起义”的故事，原来这是指一九二六年弋阳九区农民打下漆工镇警察派出所所缴到的三条枪而言，因为有一条枪没有退子勾，打一枪要通一次弹壳，老百姓叫它做半条枪，这是赣东北人民的

最早武器，其实在起义开始后如果将吴先民同志所带的八条枪和其他起义的武装一起算进去，实际上是四十六条枪，再要算上陈耿同志在大小梅起义的两条枪的话，应当是四十八条枪。

一九二七年起义后不久，在各地农民自卫军中抽调了二十几个积极分子脱离生产正式成立游击队，名字叫做土地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十四团一营一连，这是闽浙赣红军的最老祖宗，而正式采取红军的名字还在金鸡山战斗之后。

方胜峰会议上鉴于以往红军力量太分散，为着粉碎敌人的进攻，把四十六条枪集中四十条。金鸡山战斗胜利后，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对头而把这四十条枪固定集中起来，并正式改名为红军，番号是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到一九二八年秋这个团已经发展到二百多人成立了两个连。

一九二九年二月周志群一个营起义之后，红军扩大了一倍，成立了五个连，到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军扩大到一千余人，又改名为江西独立第一团。

到一九三〇年初，立三路线时，将所有地方武装全部合编到主力红军，主力发展到三万多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一九三〇年，红军从都湖波彭回师后，确立一人一枪，将一部分武装分散编到地方武装中去，红十军保留五千多人，另外成立了一个二千多人的赤色警卫师，如果加上地方武装仍然是三万多人。一九三三年与中央苏区打通，红十军奉命调中央后，又将原有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十军，各县独立营，游击队都有发展，如果将十军计算进去，此时约在五万人左右。

至于闽北方面，从一九二九年四月成立闽北独立团，部队经过几次胜利后苏区有了扩大，主力和地方武装都有了发

展。到一九三一年初改变为闽北独立师，约一千五百多人，如果加上地方武装，则在五千人左右。

随着红军的发展，根据地的发展，苏维埃已逐渐巩固和发展起来了。

苏维埃最初的根子是农民革命团，起义后首先党、政、军三个主要系统分开，一方面从农民革命团的先进分子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支部。一方面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解散，正式建立苏维埃政府。军事方面则自下而上建立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但是苏维埃组织的初期还是很简单的，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内部的分工也更细致了，代表会议组织制度也逐渐巩固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信江苏维埃成立后，苏维埃组织的领导系统也就完全建立起来了。

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这就是闽浙赣苏维埃区域发展的一副大体轮廓。

二、挺进景德镇，会师根据地。

长茅岭战斗后，一九三〇年二月在弋阳团林一战，结束了敌人的局部进攻，信江苏区面积迅速扩大，人口由十万人增加到四十万。

紧接着蒋冯战争暴发，进攻苏区的敌人大部北调，兵力大为空虚，我军首先乘机集中力量，隐蔽在万年，扬言进攻乐平秧坂，实际上却奔袭鸣山，乐平城敌人大为震动，秧坂敌人大为恐慌，我军乘胜会师，袭击秧坂，全部歼灭秧坂敌人，秧坂胜利后，我军稍事休息，即向南奔袭河口，占领河口后，弋阳之敌动摇，我军又乘机西进，歼灭弋阳守敌，至此，信江流域苏维埃区域比较巩固了。

在此情况下，我军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初攻占景德镇，此时，唐在刚同志从中央回来，带回中央决定，将原来信江特

委扩大为赣东北特委，仍以唐在刚同志为书记。在信江方面成立信江特委以黄道同志为书记，并带来了立三路线指示，要猛烈扩大红军，并要赣东北红军负责进攻九江。当时方志敏、黄道、邵式平同志等都很怀疑，在特委会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最后决定一面向都湖波彭进军，一面派邵式平同志去中央请示，八月邵式平同志回来，果然中央是这样决定的，在此情况下，如是将所有信江地方武装全部集中三万余人成立红军第十军，由周建屏同志为军长，攻克都昌、湖口、波阳、彭泽、秋浦等地。

但是由于地方武装的取消和红军远离根据地，敌人便乘机集中了上饶、铅山、广丰、玉山、横峰五县靖卫团向信江根据地进攻，一直打到上饶的茗洋关，横峰的霞坊一线，苏区受了不少摧残损失。同时又得知蒋冯战争结束，开始对我进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特委又再度在乐平召开会议展开讨论，在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同志坚决主张下，红军乃决定回师苏区，在回师的路上，从南昌前进的国民党第五师胡祖玉部已进到万年朱山桥，我军立即予以回击，激战一夜，将敌击退。

红军回到苏区后，首先乘敌部署未稳之际，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初奔袭上饶城，完全歼灭敌五县靖卫团，次日再挥戈西指进攻河口，驻河口之敌李全坤团曾顽强抵抗。我军一部由河口以西偷渡信江成功，占领河口以南制高点金鸡山，居高临下，经六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河口，缴枪八百余支，创赣东北空前记录。上饶、横峰苏区完全收复，此时，中央三中全会指示已到，立三路线也就结束了。

三、七星尖大捷，转战闽北，回师再战何家坝。

纠正立三路线后，接着一九三〇年第一次大围剿开始

了，敌人以胡祖玉、阮肇昌、李抱冰、赵观涛等四个师的兵力，一路由景德镇经乐平，一路由波阳经万年，一路由南昌经贵溪，一路由屯溪到上饶，向赣东北苏区大举进攻，此时闽北已与赣东北打通，奉中央命令将原来赣东北特委扩大为赣东北省委，仍以唐在刚同志为书记，黄道同志为组织部长，方志敏同志为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省委研究了当时形势之后，一方面决定将红军主力缩编到五千人，成立各县区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一方面与敌人周旋。这样经过一月，敌人到处扑空，到处遇到游击队的骚扰和袭击，疲劳不堪，终于在弋阳北乡的七星尖遭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而结束了第一次“围剿”。

不久敌人又增加了兵力，从贵溪、余江方面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德兴上饶方面则采取跃进到处寻找我军主力作战。

我军在方志敏同志亲自率领下首先乘虚向浙江西部之华埠挺进，接着从上饶附近渡过信江到达闽北苏区，与闽北独立团会师，首先占领铅山石塘镇，歼灭守敌一部，群众至今还留传一首歌子，歌颂攻下石塘及在石塘的城市政策，歌词是“三月初十天，红军有几千，说道石塘几千烟，不打不甘心，从下松岭过，石塘就打破，打死团丁几十个，枪支都缴过；红军真公平，并不乱捉人，单捉土豪并劣绅，公平又公平，石塘店老板，早把店门关，关起店门好为难，东西怕拿完；一问不独裁，店门又打开，打开店门做买卖，百姓都自在”紧接着又攻克崇安县城，再克浦城克赤石街、星村，调动了进攻赣东北的敌人后，红军又迅速出桐木关，从铅山以西渡信江回师赣东北打下余江城，至此敌人部署完全混乱，东奔西窜，就在敌人部署混乱时，我军集中兵力回师葛源，在葛源以西

之何家坝将敌全部击溃，歼其一部，又胜利的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四、两战广丰大刀会，星村和白石岭的胜利。

此时闽北方面，经过红十军的几次胜利已比较稳定了。但当第二次围剿开始时，建阳方面的刘和鼎师匪部，铅山方面的靖卫团吴仰山部仍不断向我进攻，尤其是广丰方面地主阶级所组织的大刀会对我威胁很大。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邹琦同志率领两个连到广丰，与广丰南乡大刀会首战于广丰桐家坂附近，大刀会采取吃朱砂念符咒集团冲锋的战法。而我却采取了正规的散兵群作战方法，结果被敌冲散而失利。紧接着黄立贵同志再率三个连到达广丰，黄立贵同志研究了大刀会用梭镖和集团冲锋两个战术特点，即令所部每班带梭镖三支，再度与大刀会激战于桐家坂附近，我军亦采取密集队形，大刀会无法冲进，黄立贵同志身先士卒与大刀会拚梭镖，终于将大刀会击溃，广丰方面新苏区开辟了，大刀会的威胁也大大减轻了。

此时刘和鼎部，以为苏区空虚，乘势向大安分水关方面前进，沿途遭受挨丝炮和地方武装的袭击，红军则挟广丰胜利余威回师崇安，在崇安建阳之间的星村街附近拦腰一仗，歼敌一个营，粉碎了刘和鼎的进攻，开辟了建阳、邵武、光泽之间苏维埃区域。

铅山方面，靖卫团头子吴仰山所部以铅山城为中心，为配合福建方面刘和鼎匪部的进攻，也积极向铅山苏区根据地石垅一带进攻，我军为开辟和发展上（饶）铅（山）地区，于一九三一年底集中主力在石垅恰恰碰到吴仰山率领三百多人摇摇摆摆由紫溪向石垅前进，吴匪本人坐着轿子，满以为可以大大的发一笔洋财，谁知转到石垅前面的白石岭下，就

遇到了红军的埋伏，稍一接触，吴仰山本人就滚下轿子落荒而逃，大部为我歼灭，我军随即占领紫溪、石塘，巩固了上铅苏区。

至此，闽北苏区已发展到包括崇安、建阳、铅山、'邵武、光泽、上饶、广丰、浦城各一部的纵横三百里的根据地。

五、葛源和大安街。

在横峰、德兴、弋阳、上饶四县交界的中心点，属于横峰县的有一个名叫葛源的大市镇，这就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闽浙赣老根据地的红色省会。

葛源镇位在群山环抱之中，举眼四望，东有赣东最高峰灵山，南有基尖、北有长茅岭，仅靠西面一路，沿着大岭岗迂迴曲折的山谷之中有一条大路经金鸡山通向弋阳，葛溪水沿着这条山谷日夜不停的流向信江。而葛源本身却又是一个方圆二十多里的一个大平原，平原的周围有枫树坞、黄山脚、考坑、青湖等数十个大小村庄依山而立，平原的中心葛溪两岸人烟密集，这就是葛源镇，本镇约有八百余户，五千余人，如果把周围大小数十村庄统计进去，总数是三千多户。

葛源镇是横、弋、德、上四县的交通中心，加上周围数万亩肥沃的土地，所以虽然在崇山峻岭之中，市面却也十分繁荣，而且也是周围方圆百里的封建地主集中之地，其中最大的地主要算姓刘的举人，不仅有万亩土地，还有自己的水牢。

早在一九二七年程伯谦同志在葛源就进行过工作。一九二八年初在程伯谦同志领导下曾举行起义，赶走了恶霸地主刘举人，农民们至今还流行着"葛源三千烟，出了程伯谦，程伯谦开句口，举人老爷都要走"的歌谣。

一九二八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进到葛源，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又相继成立，此后，直至一九二九年红军占领葛源止，

这里又成了反革命的反动中心。

一九三〇年十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移驻葛源，成为闽浙赣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共省委、少共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军区司令部、红军大学五分校、列宁师范、女子职业学校及合作总社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关都集中在这里。

四年来敌人对葛源曾进行过三次进攻，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敌人都到达过葛源，不久又都被红军击退，在敌人三次占领期间，葛源被烧毁十分之九，至今断墙秃壁犹历历在目，但是葛源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他们在废圩上架着茅篷坚持着，成为闽浙赣的模范区。

大安街位在闽浙赣交界，属于崇安境内的大山中，西北二十里的分水关成了大安的天然屏障，向南沿着大安溪，两山之间的溪谷一直冲到崇安城，向东向西都是高山，满山遍野的竹林，成了天然的造纸地，而依山旁水的大安街，就是该地的造纸中心。从一九三〇年底起到一九三五年二月止，它是闽北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六、从挨丝炮松树炮到农村军事化。

挨丝炮是一种最原始的武器，它的祖籍在福建的崇山峻岭之中，数百年来对于深山中之猛虎，一直发挥过它的无上威力。从一九二八年崇安大小梅起义之后，它又变成了人民对国民党匪军斗争的利器，并且走下了山，跑遍整个的闽浙赣。

它的形状很象一个小排球，铁质的，也有一个小嘴巴，嘴巴的旁边还长了两个小耳朵，耳朵上挂着一副人们打老鼠用的铁丝斫。里面如果装上火药，嘴上罩着发火帽，把铁丝斫翻过来，用一根细丝线头缚在老鼠斫机关的圆圈上，一头横过道路缚在矮树上，只要丝线一动，老鼠斫一动便会立即

爆炸起来，如果丝丝相连还可以成为连环炮，经过几年的斗争，人们又把它埋在地下叫做地雷，制在瓦罐上叫做罐雷，名目也就一天一天的多了起来。

松树炮是利用天然的松树，剖成二半，挖去树心，再合起来所制成的大炮，它的好处是成本便宜，制作容易，到处皆有，打过了几炮之后还可以当柴火烧，万一敌人太多，打了几炮还用不着掩护大炮转移阵地。

苏区的人民就用这些武器同敌人斗争，敌人进攻的时候，到处是挨丝炮，重要的山隘上都装上了松树炮，打击敌人，敌人驻守的时候，农民们便将挨丝炮装到敌人的大门口，早上敌人挑水的人，往往无缘无故的被打死在门口，掌握这些武器的就是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

赤卫军是二十五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壮年，少年先锋队是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是一种半军事性的人民武装，这种群众武装的成立早在一九二七年起义之后，苏区的每一个村庄适当年龄的青壮年都参加了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除了挨丝炮和松树炮外，还有鸟枪、梭镖和关云长用的青龙刀，在战时他们配合红军作战或单独骚扰敌人，在平时则进行军事训练。一九三一年以后的扩大红军运动，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更成连成排成营的开上了前线。

红军就依靠这样广大的取之不尽的人民武装，打击敌人，得到补充，取得胜利。

七、幸福的苏维埃人民。

“谈谈苏区景呀，同志们听一听，苏区的幸福说也说不尽呀，工人末，天天有工做，农民末，有田分，生活好得紧呀。”这是民歌“苏区景”的开头一段。

农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了数千年来对农民的封建统治，平了债，分了田，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农民得到土地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发放农贷，帮助他们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等困难，并且把农村中分散的单个劳动，组织在生产合作社和生产互助组中，每个村庄都有生产合作社或生产互助组的工作。年复一年，农村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物价也十分平稳，四块钱一担米，一块钱八斤拆骨肉，至今苏区的农民都幸福的回味着。

为着解决人民工业品的需要，共产党苏维埃政府除了发展农村手工业生产外，又在各地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以最低价格将工业品配售给人们。

妇女们也过着以前梦想不到的幸福生活，他们首先从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了，取消了买卖婚姻。只要自己愿意，可以"由"到一个好老公（这个由字是苏区的特别名词，原来是自由结婚的意思，后来人们把这个由字改成为动词，才出现了这个新名词。），此外还同男子们一样参加劳动，参加生产，参加各种群众组织。

苏区的人民，满怀信心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创造他们更幸福的未来。

无怪乎，在敌人大举进攻苏区时，农民们都高唱着"苏维埃给了我们自由和土地，为阶级，为自己，奋斗要到底"的战歌，奋不顾身的和敌人战斗。

八、从识字牌谈到苏维埃的文化教育。

假如你从白区进入到苏区的话，你一定会奇怪的看到每一个村庄的十字路口都有一块小小的广告牌，牌子上面既不是什么牙膏牙刷，也不是香烟肥皂，而是一个字，当你走近

牌子的时候，立即就有一个小孩子跑出来问你：同志哥，你认识这个字吗？如果你认识的话放你过去，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也就会慢慢的告诉你，一直等到会写会认了才放你过去。这就是消灭文盲的识字牌，上面的字是每天调换的。

你如果通过苏区一遍你更会看到苏区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所列宁小学，一所俱乐部，在苏维埃红色省会还有一所列宁师范和一所职业学校，这是闽浙赣苏区的高级学校。

至于群众的文化娱乐，更是非常活跃，从群众中创造出来的歌子四年来多到三百余个，有的歌颂起义斗争，有的歌颂红军的胜利，有的歌颂苏维埃的幸福生活，有的号召人民斗争。

九、闽浙赣人民的无上光荣。

一九三一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颁发给赣东北人民光荣的领袖方志敏同志以红星勋章，在葛源的受勋典礼上方志敏同志说："这不仅是我的光荣，而是闽浙赣全体同志和广大人民的光荣"。

的确，闽浙赣人民是光荣的，他们从二条半枪创造了红军，从几个小村庄创造了百万人口的苏维埃根据地，并且也创造了模范的群众工作。

闽浙赣苏区创造的基本特点是先有党而后有群众工作，再由群众起义中创造了红军，创造了根据地，因而党与群众，红军与群众，苏维埃与群众一开始就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

群众对于党，对于党的许多领导同志亲密到这样的程度，他们不称呼什么官衔，而是亲切的称呼着老汪老陈老余老薛，这些同志每一句话，群众都记得清清楚楚，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群众保护这些领袖们无微不至，没有饭吃，群众送来了，没有衣服，群众送来了，没有被褥，群众送来

了，敌人一来，群众就冒生命的危险来通消息，就是万一给敌人捉到了，也不会说出一个字来的。记得一九二八年青板桥一个人，有一天吴先民同志派他去探消息，不幸被人捉到，敌人用各种办法甚至用五把香烧遍了他的全身，但是他始终不露出先民同志的住所，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苏区扩大后，在这个基础上各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都非常坚强，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有党的支部、青年团的支部、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儿童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雇农工会、识字班、合作社等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党和政府的任何一个号召，立即都会百分之百的保证执行。

群众对于自己的子弟兵——红军更是无法形容的爱护，一批批的动员青年们走上前线，象一个六万四千人口的横峰县参军的就有七千六百多人，红军每到一处，妇女儿童就会成群结队的来慰劳，洗衣服，补衣服，送茶送饭，有一首歌是描述群众慰劳红军的："红军同志们！开得来，千千万万（笑呵呵）路上来（我的哥哥）镰刀斧头大红旗（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好多妹妹笑呵呵，送香茶（我的哥哥）"

"红军同志们！歇几天，妇女儿童（笑呵呵）做草鞋（我的哥哥）蒲子红丝线都安起（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做起草鞋（笑呵呵）把你穿（我的哥哥）"

"红军同志们！在此地不要挂念（笑呵呵）家中事（我的哥哥）乡村负责家中事（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特别优待（笑呵呵）是真情（我的哥哥）"

"红军同志们！要知情（笑呵呵）豪绅地主是敌人（我的哥哥）贪官污吏国民党（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杀尽敌人（笑呵呵）享太平（我的哥哥）"

对于红军的家属，照顾得好，送茶送水，送柴代耕，青年团在这里起了最大作用，他们高唱着“共产青年团，发起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来耕田”领导群众进行各种工作。

群众们对苏维埃政府的热情只要从当时敌人向苏区群众进攻时，群众是怎样来保卫自己的幸福就知道了，下面两首歌子第一首是：

“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员，青年紧急动员起来呀，武装保护苏维埃，武装上前线去呀，为了保卫土地革命利益，整连整营整团整师全体参加红军去”。

群众就这样一批批的拥上前线去。

第二首歌是：

“我们都是工农的武装，爬高山，履平地，奋勇向前进。苏维埃给了我们自由和土地，为阶级，为自己，奋斗到底。”

党、政府、军队、人民就是这样团结无间地将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起来。

（四）赣东北人民的灾难和皖赣边游击战争

一、曾洪易害了闽浙赣

到了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万永诚来到闽浙赣，改组赣东北省委为闽浙赣省委，以万永诚为书记，黄道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仍为苏维埃主席，邵式平仍为军委主席，并带来了四中全会决议案。但是，由于省委多数同志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以往的斗争传统。

接着中央又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资格来到闽浙赣，要闽浙赣进行彻底的转变，曾洪易到达后首先改组了省委，以万

永诚为书记，聂洪钧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而将黄道同志排挤在省委之外，派到闽北去，将吴先民十军政治部主任撤职，排挤在省委之外。将方志纯同志青年团省委书记撤职，以关英接替，最后将邵式平同志军委主席撤职，以唐在刚接任，就这样，虽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同志的坚决斗争，但是终于贯彻了四中全会后的错误路线。

曾洪易到了闽浙赣之后，首先批评闽浙赣党过去是"富农路线"，是"右倾保守主义"，是"封建地方观念"，而将原来的土地法修改了，实行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提出中立中农，打击富农的错误政策。

一九三一年以后，敌人为了防止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在信江沿线布置了重兵，到处造碉堡，而皖浙边界敌人则比较空虚，此时方志敏、邵式平同志曾提出向东北皖浙边发展巩固苏区，以运动战粉碎敌人碉堡政策的方针。但遭到了曾洪易的反对，认为这是在碉堡面前退却逃跑的"保守主义"，而提出长期持久围困堡垒的方针。贵溪夏家岭一个碉堡，曾连续进攻四次，均未攻克，部队伤亡一千数百人，花春山、龙志光同志，都牺牲在这里，陷自己于被动地位，伤亡很大，部队又十分疲劳。

尤其惨痛的是错误的肃反，在这种错误下，许多当年领导起义的群众领袖如吴先民、黄镇中、汪明、陈耿、徐福元等同志及不少群众都在AB团改组派名义下含冤而死，干部、群众情绪受到很大影响。

在这些错误面前，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同志一直作了一系列的斗争，一九三三年打通了中央苏区，曾洪易回到中央后，闽浙赣在方志敏、黄道同志领导下，在赣东北和闽北都有一些新的转变，根据地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一九三四年曾洪易又随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赣，带来了以“红色碉堡反对白色碉堡”、“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又重新使苏区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在敌人五次“围剿”艰苦的时期，这个所谓“坚决的布尔什维克”却又反过来认为革命失败，真的主张退却逃跑起来了。方志敏同志坚决与曾洪易错误做了斗争，并报告中央，经中央决定撤销了曾洪易的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职务。

不久，这个闽浙赣人民的灾星，无耻地叛变了革命，变成了反动派最无耻的走卒。

二、抗日先遣队的失利，方志敏同志的牺牲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七军团从中央出发，十月至闽浙赣与红十军会师于德兴重溪，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率领下向皖南挺进。经过婺源，歙县，休宁于十一月间在太平乡柯村茂林一线与敌人激战，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不幸牺牲，部队遭遇到第一个挫折，接着转战于东流、祁门、休宁、太平，泾县、石台、秋浦等地，虽屡胜强敌，但是终由于敌人早有重点驻守，我军又十分疲劳，加上给养困难，伤亡很大，不得已，乃决定于一九三四年底经休宁、婺源回师闽浙赣苏区，重新整顿队伍准备执行新的任务，沿途击退敌人拦击，不幸于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遭受失败，方志敏同志也同时被捕。

方志敏同志被捕后，虽在狱中仍念念不忘党的事业，还用各种办法寄出告同志书和遗嘱，劝告同志们继承遗志而奋斗，在遗嘱中，志敏同志谆谆教导同志们说：“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是不能再与你们奋斗了，我是如何的惭愧着和难过啊！我所说的意见，都是我最近感触到，当然里面

免不了有错误，说错了请你们批评，说对了的，请你们执行，我虽在监狱，但我们的胸中，仍是不断的思念着同志们的奋斗精神，总祈祷你们的胜利和成功，我直到现在，革命热诚仍和以前一样，我正在进行越狱的活动，我想，我若能越狱出来，我将用我最高的努力去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以恢复这次损失，同志们！越狱恐难可能（主要是无外援），那时只有慷慨就死了，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重到同志们的肩头了，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却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你们能够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我与王曹同志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是再也想不到为党为革命工作的机会了，这是无可如何的！我能丢弃一切，唯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却，同志们十分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经常记起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战友们的惨死，提起奋勇的精神，将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快赶走吧，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谨向你们领导下的红军和工农群众致热烈的革命敬礼！”

“我们临死前对全党同志诚恳的希望，就是全党同志要一致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发扬布尔什维克最高的积极性、坚决性、创造性，用尽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学习列宁同志‘一天作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积极开展城市工人运动（这仍是党目前工作最薄弱的一环），不惮艰苦的进行国民党军中的士兵运动（白军士兵不满已到极点），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争取千百万被压迫的工农士兵群众到党的旗帜下来，很快实行党提出的‘锻炼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在中国各地开展农民游击战争，分散国民党的兵力，使国民党象打火一般，这处打不熄，那处又燃烧起来，不能

集中大的兵力来进攻我主力红军，在各地积极创造新苏区来拥护和援助主力红军，使能很快击破敌人，造成全国的反攻形势，汇集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洪流，冲毁法西斯国民党血腥统治，达到自由的工农的苏维埃新中国的建立。”

“在此时如有哪些同志□□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而消极怠工那简直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而是冒牌党员，这样的人是忘记了国民党囚牢里有好几万党的同志正在受刑吃苦！忘记了国民党的刑场上党的同志流下了斑斑血迹，忘记了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川、黔、滇、湘艰苦的战斗，更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啼饥号寒无法生存。”

“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所死，固无所怨，更无所惧，只有两件事使我们不能释怀。作过某些错误，但经党指出，莫不立即纠正，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的伟大和领导世界革命的正确，我们相信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伟大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我们坚决相信在国际和中央列宁主义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全部成功，苏维埃的制度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而将中国从最后崩溃中挽救出来。”

“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中拯救出来，全世界的光明只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

同志们！让我们永远记着方烈士的最后指示吧！

三、猪头山，赭亭山烈士们永垂不朽！

抗日先遣队挺进到皖南后，赣东北敌人的大举进攻也开始了，以梁匪立柱为主力的二十一师分两路向河口出发，一

路经莲荷，一路经上坂张家，企图一举占领横峰县城。

东路敌人在进到莲荷以北猪头山时遇到我地方武装——横峰独立营一个排的抵抗，我军依靠早已做好的工事，依靠工事周围的挨丝炮，顽强的坚守着，敌人虽然用过飞机大炮作过无数次的猛攻，损兵折将七百余人，终于不能占领英雄的猪头山阵地，只好将猪头山团团围困，一个月后，我军弹尽粮绝，伤亡一半，活着的十四个同志掩埋了同伴的尸首之后，在悬崖绝壁上一个个用绳子吊了下来，下来七个同志之后，不幸被敌人发现，绳子被打断，敌人又占领了猪头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其余七个同志打烂了武器，高喊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跳下了七百公尺的高崖，为人民事业作了壮烈的牺牲。

与此同时，西路之敌在上坂张家附近的赭亭山上也遇到更激烈的抵抗，赭亭山方圆十里左右，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向南一面有一条笔直的陡路上山，从山脚到山顶共有三个关，我军早在赭亭山做了层层工事，由横峰独立营的两个排坚守着。一九三四年四月间，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到达了赭亭山下，立即遭遇到守军的坚强反击，敌人以飞机大炮猛击猛炸，我军则依靠地雷手榴弹英勇的抵抗，杀伤其八百余人，经过半月时间敌人才攻上了三关，我军则退守碉堡，碉堡外面团团围住了数百敌人，高声叫喊缴枪，但是从土地革命中锻炼出来的红军是决不投降的，他们将最后剩下的一箩火药点着，在同志们高喊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声中，轰的一声碉堡炸开了，碉堡周围百余敌人，伤的伤，死的死，我们英雄的烈士们也同归于尽了！最后有一百多参战的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员，除了逃走的几十个人外，二十余人被捕后，敌人将他们用铁丝穿上耳朵送到河口枪毙了。

英雄们！永垂不朽！

赭亭山、猪头山弃守后，敌人即占领了横峰城，此时从上饶前进之敌在攻破老鸦尖后占领了若洋关，弋阳之敌占领了漆工镇，贵溪之敌占领了标溪夏家，各路敌人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会攻葛源，从此轰轰烈烈的赣东北苏维埃运动就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了

四、仇恨沥沥在心头：

与抗日先遣队失利的同时，苏区已完全被敌人占领，到处造碉堡，造封锁线，苏区的群众纷纷转到山地，在从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用挨丝炮地雷不断的打击敌人，有的地方一直坚持了半年之久，但是整个形势是一天天的困难，敌人每日出动搜山、捉人、杀人、抢劫，将躲藏在山上的群众一批批的捉下来，一批批的残杀，侥幸未被杀害的人们又在残酷的归保运动中受到清乡委员会的凶残敲诈和被迫去做苦工，年青的妇女们一批批的被强奸，被卖掉，弄得苏区到处是断垣秃壁，苏区的人民家家妻离子散。许多村庄被烧成了废圩，许多村庄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随着国民党军队回来的地主阶级，又在人民头上更凶残的掠夺 土地被收回了，九年的租子要倒算，许多农民被打死在分得的田里，地主们说："看你还要不要我的田"。

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许多干部，除一部分进行游击战争外，许多同志为党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的牺牲了，唐在刚同志牺牲在葛源以西苏源山上，邹琦同志和徐炎荣同志被捕后牺牲在上饶，程伯谦同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黄竭喜同志被捕后临死不屈，被敌人挖出了心肝，缪敏被叛徒告密而被捕，张其德同志亦在磨盘山上被捕。

这是赣东北人民空前的大浩劫，但是赣东北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游击战争的火焰始终燃烧在皖赣交界的丛山峻

岭中，而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则始终坚信着毛主席是一定要回来的，红军是一定要回来的，苏维埃是一定要回来的，象方志敏同志的家乡——湖塘村的一个普通妇女郑绿蓉，当她重病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共产党，告诉她的丈夫说：“你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苏维埃，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我死之后，你一定要给我做一顶红军帽、一套红军衣服穿。”

五、坚持在皖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和东秋贵暴动

此时赣东北的红军，除了由粟裕同志率领的挺进师，挺向浙西南外，留在皖浙赣边的尚有刘毓标同志所领导的活动于开化、玉山、婺源、德兴一带的红军游击队，王丰庆同志所领导的活动于湖口、都昌、波阳、彭泽一带的皖赣边区挺进师，李步新同志所领导的活动于太平、泾县、石台一带的红军游击队以及其他先遣队的突围部队，总数不下数千人。

他们的情况是十分艰苦的，由于方志敏同志的被捕，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又不知道整个的形势，天天打，天天跑，部队本身的思想情况一时也很混乱，一部分在平时自称为坚决的革命者，在此时却看到情况严重而逃跑了，也有少数的人象倪宝树之流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而无耻叛变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仍然抱着一颗为牺牲先烈复仇，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的心，顽强的坚持着。

王丰庆同志率领的皖赣边区挺进师先后在浮梁、婺源之间会合了各地抗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从新整编为皖赣边区游击大队，经过浮梁、婺源、休宁、祁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间挺进到东流的秋浦、贵池一带，通过当地的一些群众领袖，逐渐地站稳了脚跟，经过几个月准备之后，并于一九三五年秋季开始起义，建立皖赣边区委部队，也发展到一千五

百人。其他各路则仍然在原地坚持着。

六、几路红军的会合、皖南游击战争的发展

但是由于策略上仍然采取了苏维埃运动时的一套，部队还没有脱离打硬仗的旧办法，东秋贵根据地起义前后不到半年又失败了，红军不得已再度分路突围，由东、秋、贵南下，经过祁门、浮梁，在婺源以北的鄣公山上会合了关英、刘毓标同志所率领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李步新同志也与关英、刘毓标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从此时起，各地互相没有取得联系的部队又会合在一块了。

为了继续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从新成立了闽浙赣省委，决定由刘毓标同志率领一部分红军在开化、婺源、德兴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由王丰庆、李步新等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在浮梁、祁门、泾县、黟县、太平一带坚持斗争，成立了三个特委，并在若干政策问题上做了一些转变，例如关于处理与白区群众的关系问题，关于部队的分散活动问题等等。

从此直到一九三五年西安事变后，皖赣边区的游击战争，就比较顺利的坚持下来了，部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五）闽北和闽东的游击战

一、退出大安街，闽北游击战争的开始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敌人调集十二师和张銮基独立四十五旅，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部子举的河南总队，周志群的十一师及江西、浙江、福建等省保安团共十万兵力开始对闽北苏区进攻，第一步由独立四十五旅和十二师二部，由崇安及河口向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前进。

十月中南路之敌进到崇安以北十里之四渡桥，经半个月的战斗敌人占领了四渡桥，十一月初河口之敌占领紫溪镇，沿途虽然遭遇到我游击队和群众的不断打击，但仍然在龟步前进。

此时为迎接新的形势，特委决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的转变，其主要有如下几点：

1.撤退乡村公开干部转入部队，乡村支部立即转入秘密状态，以白皮红心政策坚持。

2.所有党政机关随军行动，区成立游击指挥部，区苏主席任指挥，区委书记任政委，县成立游击司令部，县苏主席兼司令，县委书记任政委。

一九三五年二月两路敌人都距大安十里路，南路之敌已进至小浆镇，北路之敌进至黄连坑。在一个月亮明明的晚上，全体同志集中在大安对面的操场上，每个人都带悲愤的心情遥望着河对面静静的大安镇，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同志出现在同志们的面前。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撤出大安街。”一句话立即吸住了同志们，接着他又说：“现在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挨丝炮装满了，敌人除了得到一个空街之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形势是严重的，从今天以后将要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我们的艰苦任务，我们再胜利的回到大安来，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就这样，我们踏着月夜，我们爬上了大安以东的高山。第二天敌人在挨丝炮轰炸声中进入了大安。

二、饥寒交迫的一九三五年

敌人打通崇安、紫溪封锁线后，闽北苏区被分成两半，

接着由二而四，由四而八，封锁线不断的增加着，至一九三五年中，全部闽北苏区密密的摆着五十多条封锁线的封锁网，几乎几路都有封锁线。封锁线与封锁线之间仅仅只有十里到二十里，讲得清楚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山，山东有封锁线，爬到山西还是封锁线，所谓封锁线实际上就是碉堡线，每隔三百米到五百米立个碉堡，每天从据点出发搜山，敌人企图以此来扼死我们，按照陈诚的话，这就叫做"张开大网来捉鱼"。

除了封锁线之外，还有一个更毒辣的办法叫做移民并村。凡是封锁线据点之外的老百姓，全部赶到据点里去住，编成保甲。据点的周围用铁丝网包围起来，据点与据点之间又不能互相来往，买东西只准买一样，否则就是济匪。食米、食油、食盐都采取配给，企图这样来饿死我们，依照陈诚的话这叫做"抽干塘水来捉鱼"。

这样自然造成了我们极大的困难，我们不能好好的行动，转一个屁股都要碰到封锁线，无房子可住，终日在山上睡觉，睡了几天再也睡不着，就坐在山上看天亮。为着避免敌人发现不能高声谈笑，不能白天生火，睡了起来还要把睡倒了的草扶起来，似乎说："对不起"！我们衣食发生困难，记得在崇安西南的北坑山上，足足依靠野菜维持半个月，有时搞到一点米，几百人烧一锅五升米的稀饭连米粒也看不到，整个一九三五年冬天许多同志就看不到棉衣。

但是在共产党的面前这些困难是不能制服我们的，封锁线不能过，我们便晚上过，不能走就慢慢的爬过去，有时我们从封锁线下过，还听到碉堡里的人抽鸦片呢。白天不能生火晚上生，天黑吃晚饭，天未亮吃早饭，带上一餐冷中饭，睡不着觉就学习天文知识。

至于移民并村，那更有办法克服的，因为在敌人建立据

点之前，我们早就有了准备，群众完全是我们的，在据点里有共产党的支部，有苏维埃政府，有时一个人是支部书记苏维埃主席兼保长，这叫做“白皮红心”。红军没有饭吃，群众你一把我一把的凑集拢来，晚上用绳子偷偷地吊到围墙外面来接济。红军没有鞋子穿，群众就你买一双我买一双，自己打赤脚，送给红军穿。

因此虽然增加了我们许多困难，我们一样可以坚持，据点与据点之间敌人的运输兵，通讯兵，经常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如果有人问我们靠什么？那么回答说：“靠党、靠山、靠群众。

三、挺进敌后，闽北闽东两个根据地的会合

一九三五年底黄立贵同志从建（瓯）松（溪）政（和）回来，了解敌后非常空虚，敌人兵力全部集中到苏区，在敌人的后方许多重要的城镇，都只有少数保安部队住守，财政经济方面也有办法解决问题。特委根据独立师行动的汇报，同时又鉴于部队集中在苏区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决定部队全力向外出击。由曾绍铭、汪林兴同志坚持崇安、建阳老苏区，黄立贵、曾镜冰同志率领独立师第一团挺进闽东，吴先喜同志率领独立师第三团挺进金资贵，并解决了一系列的新区游击战争的各项政策。

一九三六年初各路部队分别向东挺进，这一下子可对了头，果然敌后十分空虚，给养也不成问题，红军一个月之内连续打下建瓯的玉山街、东溪、迪口、临江、水吉等重要城镇，接着分散活动，闽东北新游击根据地开辟起来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闽北闽东两个独立师会师在洞宫山，闽北闽东两个根据地会合了。

敌人呢？经我们这一击，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倾刻之间，东也告急西也求救，不得已便大量的从苏区撤兵去保护自已的老家，许多封锁线都解除了，碉堡也拆掉了。

这样一来，苏区形势也就开始稳定了。

现在，暂时让我们打住一下，再回过头来谈谈闽东老根据地的创造。

四、闽东老根据地的创造和闽赣省委的成立

闽东苏区较赣东北和闽北为迟。党的组织建立在一九二七年，邓子恢同志来到福安整理后，党便开始同福安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并领导群众进行反鸦片捐、秋收年捐抗租抗债斗争。一九三一年冬福州市委派叶飞同志来到福安，叶飞同志到达福安后，便开始领导群众起义，成立闽北工农红军游击第一支队，竖起了闽东的第一面革命红旗，逐渐向寿宁、霞浦、宁德方面发展。

寿宁方面在一九三一年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三三年为配合第一支队的活动，在蔡秀藩、范济等同志领导下举行了起义，成立闽东工农红军第七支队。

另外一部分在连江罗城方面，一九三〇年就建立了党，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在陶铸同志亲自领导下建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九支队。

这是闽东最早的三处星星之火，到一九三三年秋季便发展成了燎原之火，各地先后在抗租抗债的基础上举行了起义，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纵横百里、人口二十余万的闽东苏区，到一九三三年八月统一成立了闽东独立师和闽东特委。此后，闽东根据地就在叶飞、范式人、阮英平等同志领导之下坚持斗争。

一九三六年闽北闽东两个根据地会合不久，黄道、叶飞等同志都感到在脱离中央领导的情况下，为了互相配合行动，更有力的坚持斗争有统一两个根据地领导的必要。一九三六年四月黄道、叶飞同志在洞宫山会议后统一成立了闽赣省委。从此，闽东根据地也就会合在闽浙赣苏区一起了，从此这二个根据地就在黄道、叶飞、范式人、黄立贵、曾镜冰等同志领导下，唇齿相依密切配合的坚持着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五、争取林熙明，执行新政策

但是，从根据地打到敌后建立整个闽江以北游击根据地，并不是那样容易的，没有一系列的政策上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闽北白区打游击所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村村有大刀会，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大刀会打仗。我们如果要想在新区站稳脚，首先必须解决大刀会问题。经过打击和争取的两方面的努力，我们首先争取了林熙明这个在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有将近一万会徒的大刀会头子。才完成了对大刀会的争取工作。

林熙明，福建寿宁人，贫苦出身，早年曾在旧军队当过兵，不久退伍回家就组织大刀会。这个人一天到晚做着皇帝梦，如果你说："林先生，你将来要做皇帝"，他一定会笑着说："那我一定封你为一员大将"。穿着黄袍戴着小生帽，满身用朱砂写上如来佛祖、关圣帝君、齐天大圣等所有的神仙和菩萨的名字。乍看之下包你哭笑不得。但是在这落后的农村中也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并且他与国民党有矛盾。

在我们初到建瓯的时候，也曾经同我们打过几仗，使他们知道了红军的利害，再加上我们的积极争取和在国民党向其进攻时给了他必要的援助，于是逐渐和我们靠拢，最后与

黄立贵同志等吃了鸡血酒称兄道弟起来了。

通过林熙明争取了绝大多数的大刀会。

在其他政策方面也有了改变。对于保甲长采取争取而不是取消。

对于地主采取筹款减租，而不是分土地。总之这一切都是游击根据地的政策，而不是苏维埃政策。

就这样才站稳了脚，并且逐渐开辟了群众工作。

六、拖垮周志群，痛揍郜子举

三年游击战争又是怎样打法的呢？让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罢。

我们进入敌后，敌人自然不可能再造封锁线了。结果改变了方法，采取跟踪追击和分进合击的办法。发现你一个连就是一个团跟着你的屁股打，发现你一点就是几路合击，这个时期，最大的困难不是饿，也不是不好行动，而是天天行动天天打仗。

从一九三六年一月起，周志群足足跟了我们三个月，从建瓯跟到建阳，我们就象"叫化子打狗"一样，一路打一路拖，也足足拖掉了他一千五百人。到底怎样拖呢？有时我们跟敌人兜圈子，今天你追上了我，一个晚上我走八十里一百里，明天你不知道我究竟到哪里去了，等到你再跟上，老子已经休息了两天或三天，又可以再同你兜一个圈子了。有时我们同敌人对流一下，看到好地方暂时隐蔽一下，等你追过头，老子回原地宿营，等你再回头我又休息了一两天。更重要的是一路选择好的地形揍他，无好的地形不打，有了好地形狠狠的揍你一顿，打了就跑。一九三六年二月底，周志群追我们追到建阳界首附近，在一次战争中足足打掉他五百

多，打断了他的脚骨，再也不敢追了。这种情况在闽北闽东和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多得很。

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崇安、铅山根据地方面，张銮基、部子举正准备撤离苏区，我坚持内线的部队在研究了敌人情况之后，乘各路敌人收兵之际集中力量，在上饶甘溪附近的金钟山伏击部子举一个营，歼灭敌人两个连，打了一个在游击战争时算是大大的漂亮仗。并乘胜打击了张銮基，这样闽北根据地也就稳定下来了，我们就这样靠两条腿，依靠群众，采取以拖对追，有条件就打他一顿；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办法坚持了三年，保存了力量。

七、挺向将顺泰，开辟闽中游击根据地

闽北闽东老苏区和闽东北游击根据地逐渐稳定后，一九三六年八月省委决定由黄立贵、吴先喜同志率领红军一部挺进行南平、顺昌、将乐、泰宁一线，以开辟闽中新根据地，并决定以黄立贵同志为闽中特委书记。

黄立贵同志于八月间从崇安出发，经建阳、邵武，首先打下界首镇，歼灭福建保安团一部，接着攻下峡阳镇，渡过闽江挺向将顺泰，当时将顺泰敌人内部还非常空虚，我军所到之处，反动地主武装分子被消灭，等到国民党调七十五师到达这一带时，我们早已做了两三个月的工作，建立了不少的群众关系，站稳了脚了。

从此，闽赣边的游击根据地便扩大到东至大海，西到资金贵，北到信江，南到闽江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包括闽北、闽东、闽东北、闽中四个特委和一个资金贵中心县委的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也有了闽北独立师和闽东独立师及各种地方武装近三千人。

八、半碗白米饭，一片慈母心

如果有人问，你们在游击战争的时候，部队给养、伤病、兵源补充又是怎样办的呢?那末，我们回答说：这是靠群众。

红军游击队，就是武装工作队。一面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所到之处，第一件争取群众的法宝就是严明的群众纪律，无论部队怎样苦，决不动群众一针一线，有时到了一个新地方，群众不了解，跑光了，红军吃了东西把钞票放在原地方，群众回来看到这样的纪律，第二次就再也不会跑了。第二是开仓济贫，红军所到之处虽然没有分田地，但是却也将地主粮食没收分配给穷苦群众，有时少数群众不敢要，红军秘密的送给他。除此以外，还领导与帮助群众进行抗租抗债斗争，保护群众利益。因为有红军，保甲长也不敢胡作胡为。第三是建立关系，当时红军提出的口号是：第一天了解情况，第二天交结朋友，第三天建立秘密的群众团体（至于团体的名称因地制宜），这样，只要红军住了几天，同群众的关系就生了根。群众在红军白军你来我往的实际体验下，不要两次，也就投向革命怀抱了。

我们就依靠这无边无际的广大人海，坚持着我们的斗争，敌人来了有人给我们送消息。部队有消耗，不断的有人来加入红军队伍。打仗有伤亡，到处都是医院。

记得有一同志负伤之后，无法行动寄住在建瓯东溪里面一家山篷里。山篷里只有两个老人家，自己依靠玉米杂粮充饥，生活十分清苦。该同志寄住在他家里之后，老头子每天上山采草药，为他医伤，吃饭的时候，满锅黄色玉米当中放上半碗白米饭，这是专门给负伤的同志吃的。人民就是这样热爱着自己的子弟兵的。

（六）浙西南新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一、翻过灵山，挺向浙西南

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利后，粟裕同志和刘英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约七百人在德兴广田山集合。开始企图转到中央苏区一带，经贵溪小田毕家至信江边上受阻，折回德兴徐家滩，到徐家滩时，正遇到从怀玉山进入苏区之敌，经过战斗，当部队向东南翻过赣东最高峰的灵山，经上饶纸坊渡过信江进到上饶南乡的应家口，于一九三五年五月进寮竹关到闽北根据地的车盘，与闽北红军会师，正式整编挺进师，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黄富武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成立四个纵队，并决定向浙西南发展。

六月从车盘坑出发后，经过浦城、建瓯、松溪、政和，到达浙西南龙泉、庆元、泰顺一带，在庆元以南之上田街与浙江保安团激战一天，未克，再转至松阳之白姆镇，歼灭保安团一个中队，接着又一度攻克汤溪县城和衢州城，此后部队便分在龙泉、庆元、景宁、泰顺、逐昌、松阳、云和一带活动和做群众工作，粟、刘两同志则率领师直属队在龙泉一带做群众工作。

经过几个月后建立了龙泉、庆元、景宁、泰顺、松阳、云和、逐昌各县委及浙西南特委，以黄富武同志为特委书记。

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在浙西南各地开始举行起义，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府。

二、突出包围圈，创造浙西南新根据地

浙西南起义后不久，声势浩大，直接威胁敌人的心脏，加之当时根据地的政策，仍然采取了苏维埃时期的一套，所

以国民党调集其精锐部队十八军罗卓英部展开对浙西南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到处大烧大杀，群众开始发生某些动摇。根据地的坚持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在此情况下，挺进师决定分兵三路向外出击，一路由一个纵队向东阳、义乌、丽水方向出击，一路一个纵队向浦城方向与闽北打通联系，一路两个纵队，由粟、刘两同志亲自率领向浙南沿海平阳、瑞安一带，留黄富武同志坚持浙西南，不久黄富武同志不幸牺牲，浙西南根据地遭受很大的损失。

粟裕、刘英同志率领的两个纵队到达平阳地区后，首先打下平阳之朱溪、黄堂、瑞安的大学等地，歼灭保安队数百人，浙南局面迅速的打开了。

此时，在政策上已开始了某些新的转变，如将分田地改为筹款、抗租、抗债，群众组织也采用隐蔽的方式。这样，新的游击根据地就开始建立起来，部队又开始有新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一月敌人调集八十师一部向浙南进攻，我军始则采取分散方法活动．接着在平阳分水排歼灭其一个连，击溃其大部，这样，平阳新根据地也稳定下来了。

三、浙西南的恢复和东义浦新根据地的创造

此时，两广事变爆发，罗卓英部也调走了，加上浙南新根据地的创造，在浙西南方面情况开始有了改变，我们又开始派部队恢复浙西南的工作。

部队到达浙西南后，群众见了面纷纷诉说国民党匪军的残暴摧残。各地失散了的同志也纷纷的来找寻关系，就这样，经过近半年残酷摧残的浙西南地区又重新开辟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挺进师第五支队奉命再度挺进到东阳、义乌、浦江一带，创造了东义浦游击根据地。

从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便在粟裕、刘英同志的领导下，与闽东北互相密切配合的坚持着三年游击战争。

必须特别指出浙西南斗争是很艰苦的，一方面由于浙西南直接威胁着京沪杭敌人的心脏，另一方面由于浙西南完全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所开辟的新区。

（七）开上抗日前线和抗战中的浙赣人民

一、得到中央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年来失掉与中央联系，各地独立自主的坚持斗争，大家都觉得非常痛苦，各根据地先后派人设法打通与中央的联系。

闽北方面于一九三六年底派吴华友同志（过去曾在太平洋海员公会工作）带了报告到上海、香港一带找寻党的关系。在上海未找到党的组织，在香港找到了党又不敢相信。在九龙住了三个多月，于一九三七年四月间才找到太平洋海员公会，但据说太平洋海员公会已划到美国了，再通过美国党才得到中央八一宣言，民主共和国决议，红军东进山西宣言等几个重要指示。闽东和浙南方面则较早的在沪港等地找到了党的关系，接到新政策的指示。

接到这些指示之后，全体同志如获至宝一样的讨论研究，一致认为中央指示的精神完全正确，特别是在一九三七年从报纸上得到“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的消息之后，各地都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对进攻苏区敌人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但是国民党的回答却是更残酷的进攻。

二、一九三七年的紧张关头

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虽然与陕北主力红军开始和平谈

判，同时却集中大量兵力，增兵南方各地，以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剿共”总司令，亲率几十个主力师，对各游击区进行前所未有的进攻。一时各地同时紧张，部队活动困难。

同时因为失掉了与中央的联系，加上交通不便，敌人封锁等原因，一时不易了解全面形势，对新的困难估计不足，未作充分准备，所以损失很大。

在闽北方面一九三七年三月吴先喜同志率领闽北独立师第三团，挺进到金资贵地区，遇到敌人的几路进攻部队立即分散，吴先喜同志本人仅带一个连折向光泽以北的寨里一带，刚刚到达寨里，敌李玉堂第三师便进到寨里后面山上，吴先喜同志亲率部队冲出敌人包围，不幸中弹牺牲。同年五月，黄立贵同志率独立师一团，在邵武、顺昌、将乐、泰宁一线活动，敌人在该地，集中第三师七十五师及福建保安团各一部分头堵截与追击。红军由营而连由连而排分散活动。黄立贵同志则亲自率领一个排转战月余，在一个晚上渡过闽江，在界首以北，一个香菰厂休息时被福建保安团包围，黄立贵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在闽东方面，独立师师长庐文清同志也在周宁附近牺牲，部队也受了不少的损失。

在浙南方面，敌人更是集中重兵到处追击与堵截，红军根据地也受了很大的损失，粟裕、刘英也遭到几次极大的危险。

在皖南方面，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关英离开了部队，各地又失掉了联系，因失掉统一领导，受的损失更大，开化、婺源、德兴间刘毓标同志所率领的部队失利，刘同志本人不幸被俘。王丰庆同志率领的部队也在浮梁以东失利，王同志被捕后幸被逃脱。匡龙海在这严重关头又失去联系，部队大部遭受损失，只剩下王丰庆、李步新等几个同志所率领的少

数游击队仍坚持在皖赣之间。

直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各地才从痛苦的经验中体会到新形势的变化，才开始做新的转变，采取更分散，更隐蔽的方法坚持着斗争。

三、走上抗日前线

七七抗战爆发，主力红军已经开上华北前线，各地国民党军队也纷纷北调，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才不得已放弃了消灭红军游击队的计划，而被迫接受了我们的呼吁。

一九三七年八月各地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集中整训，闽北方面集中在铅山石塘．闽东方面集中在福安附近，浙南方面集中在平阳，皖南方面集中在祁门、浮梁交界的石灰山，在中央统一指示下改编为新四军，闽北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闽东独立师改编为第六团，浙南挺进师和皖赣边游击队改编为第一支队第二团。同志们为了抗战，流着眼泪摘下了为它而奋斗多年的红星帽，珍贵的打在包袱里，换上了新军装。同志们都知道，虽然为了抗战胜利，换了军服改了番号，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实现而战斗的意志是永远不变的。并且，也就是为着这个目的的实现而光荣的走上抗日前线，承担中华民族解放的重任。

红军下山后，各老根据地的群众，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慰问。妻子送着丈夫，父母送着爱子到部队里来。各地的知识青年们也都把部队看成是中华民族的希望，纷纷参加部队工作，就这样，部队得到很大的发展。

一九三八年三月各路部队除了在闽北留了曾镜冰同志，闽东留下范式人同志，浙南留下刘英、龙跃等几个同志组织留守处外，其他全部在叶挺、陈毅将军的指挥下挺进到京沪

杭抗击敌人的心脏，创造了华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部队也就成了新四军和华东敌后抗日战争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四、抗战时期的闽浙赣人民

在伟大抗日战争的运动中，闽浙赣老根据地的人民发扬了过去十多年的光荣传统，又站在抗战斗争的前面，除了对全国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子弟兵——新四军以外，各地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迅速成立起来了，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恢复。依照闽浙赣老根据地人民的话，这叫做二次革命。

但是国民党在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是不允许闽浙赣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的，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后，赣东北人民又遭受到新的灾难。数以千计的同志犯了"爱国罪"被捕了，国民党强迫他们"自首"、"诲过"。一九三九年五月黄道同志在河口被阴谋毒害，刘英同志在丽水被捕后又被杀害。尤其是一九四〇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公开的对闽浙赣老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的残酷镇压，新四军家属被关进了牢狱，到处捕杀共产党。更残酷的是将黄道同志的遗体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割头，许多当地的群众领袖如闽东的阮英平同志，闽北的王助、汪林兴同志，赣东北的杨文翰同志等等也都在这个时期先后牺牲。他们满以为这一下可以完全镇压住革命的赣东北人民。

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富有革命传统的闽浙赣人民是决不会被镇压下去的。他们又重新拿起了枪，重新上山，与敌人再度展开游击战争。在福建方面有曾镜冰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在浙南方面有龙跃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在皖赣边方面有胡明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在赣东北有杨文翰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除杨文翰同志不幸于一九四六年牺牲外，

其他各地都胜利的坚持着。解放战争开始后，他们更有力的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敌后胜利的打击敌人。

（八）红军回来了，毛主席回来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后，五月间胜利的回到闽浙赣老根据地。闽浙赣老根据地受苦受难的人民，重新看到已百倍壮大的自己的子弟兵，看到了分别十多年的红星帽徽，到处响起了“红军回来了，毛主席回来了！”的欢呼声，铅山石垅老革命女干部丘和秀说：“我看到了红五星，心里就说不出的快活”。许多群众都将冒险保存下来的苏维埃书籍、报纸、党证、钞票等拿了出来，表示他们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无限忠心。

十八年来闽浙赣老根据地人民所受的灾难是诉说不完的，仅闽浙赣老苏区部分的江西上饶专区二十六年来为革命牺牲的干部、军人和群众达二十五万六千多人，横峰一个六万人口的县，七千六百人出外当红军或做工至今继在的只有十八人，烧毁房屋二十万间以上，至今许多村庄仍看不见瓦屋，被抢的东西无法计算，根据我们在几个村庄的了解，约每户在三百担稻谷左右，加以全专区苏区户口计算总数不下亿余担，折人民币不下五万亿元。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我们几个从闽浙赣老根据地出去的同志先后回到了革命的老家。你到哪里群众就一大群一大群的围到哪里，对你控诉国民党十八年来的罪恶，对诉说老根据地人民十八年来灾难。这种悲喜交集的场面，实在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只要你身历其境，你就一定要为老根据地富有革命传统的人民而高兴，也要为老根据地人民十八年来所受的灾难而掉下眼泪。

老根据地的人民，在这种悲喜交集的会面之后，立即投入到支前剿匪的伟大斗争之中，虽然大军云集，但是老根据地人民都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小小的一个六万人口的江西横峰县在一月之内就借出粮食三百万斤。从解放开始至今，凡是老根据地，没有出现过一个土匪，那些在外面的土匪也很少能够活动到老根据地来。

两年来，老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展开了各种伟大斗争，将那些十八年来作威作福的反革命分子法办了，从一九五〇年起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又重新回到农民的手上。其他在生产建设各方面，都获得了伟大成就，现在他们正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的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祖国，为重建自己的家园而努力！

（九）先烈们永垂不朽

二十多年在这漫长的斗争道路上，光荣的闽浙赣老根据地的优秀人民为党为人民前仆后继的斗争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许多革命的先驱者作了壮烈的牺牲，其中有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群众领袖，这里我们不能将全部牺牲的同志记载下来，只能将那些闽浙赣的群众领袖们记载在下面，让他们与其他千千万万的烈士们永远活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心上。

方志敏同志，闽浙赣老根据地创造人，江西弋阳人，在一九二二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苏维埃主席，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一九三五年牺牲于南昌。

黄道同志，闽浙赣老根据地创造人之一，方志敏同志亲密战友，江西横峰人，一九二三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闽浙

赣省委组织部长，闽北特委书记，游击战争时的闽赣省委书记，东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一九三九年被毒害于江西河口。

周建屏同志，红军第十军创造者，云南人，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到达赣东北，从红军独立团起一直率领这支部队，后为红十军军长，红十军调中央后才转到中央，抗日战争时期积劳成病，故于冀察晋边区。

寻淮洲同志，一九三四年率七军团（原红军第十军）至闽浙赣任抗日先遣队十九师师长。一九三五年牺牲于皖南。

吴先明同志，闽浙赣苏区创造人之一，江西横峰人，曾任过县委书记、红十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二年在错误的肃反中含冤而死。

邹秀峰同志，横峰人，闽浙赣苏区创造人之一，曾任省委委员、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抗日先遣队失利后下落不明。

邹琦同志，弋阳人，闽浙赣苏区创造人之一，曾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一九三五年在横峰葛源被俘，押至上饶壮烈牺牲。

唐在刚同志，四川人，早于一九二八年来到赣东北，一直坚持着斗争，曾任赣东北特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一九三五年在横峰葛源苏源山被围自杀。

雷夏同志，弋阳人，弋阳八区起义领袖。一九二八年牺牲于弋阳马王庙。

江宗海同志，贵溪人，贵溪党的创造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被国民党杀死于贵溪城。

刘英同志，江西瑞金人，曾任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挺进师政治委员、浙西南根据地创造人，浙江省委书记。一九三九年在丽水被捕牺牲。

黄立贵同志，横峰人，雇农出身，一九二七年参加起

义，一九二九年到闽北，闽北独立师的创造者，闽北独立师师长。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牺牲于福建建阳。

吴先喜同志，横峰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曾任县委书记、闽北独立师政治委员、闽北军分区司令员。一九三七年三月牺牲于光泽。

阮英平同志，闽东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曾任解放军师政治委员。一九四八年牺牲于闽东。

范濬同志，闽东党创造人之一，曾任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牺牲于福州。

黄富武同志，弋阳人，一九二七年参加起义，曾任特委书记、挺进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牺牲于浙西南。

黄端喜同志，横峰人，一九二七年参加起义，曾任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被俘牺牲于弋阳城。

黄怀仁同志，横峰人，一九二七年参加起义，曾任闽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被叛徒杀害于铅山。

卢文清同志，湖北人，早年到闽浙赣，曾任闽北分区政治部主任、闽东独立师师长。一九三七年牺牲于闽东。

龙志光同志，贵州人，周志群部起义领导人，在红军中曾任团长、师长等职。于一九三三年牺牲于贵溪夏家岭。

除以上同志外，现在尚记忆得到的在赣东北有黄镇中、舒翼、江立山、花春山、钱壁、宁春生、李穆、黄开柏、裴成章等同志，在闽东北的还有徐福元、温绍卿、王助、汪林兴、汪梅亮等同志。

这些都是闽浙赣起义及苏维埃运动中的领导人物，除此以外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们。

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永远前进吧！

道路是曲折的

——忆闽赣斗争五年

方志纯

国民党蒋介石在一连三次进攻中央苏区失败后，并不甘心。从一九三二年六月起，蒋介石又调动兵力，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这次反革命“围剿”，敌人集中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攻，中苏区苏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和困难。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一九三三年初，中央命令红十军迅速离开赣东北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对这个命令，从干部到战士都感到很突然，思想毫无准备。红十军的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是赣东北的工人和农民，都有点故土难舍。我也和大家的心一样。

一月中旬，部队开始集中。二十日，部队分开从葛源、上饶等地向贵溪方向运动。二十四日黄昏时，部队开始渡信江。过江后便同三军团相会了，随及进入了中央苏区。

红十军进入中央苏区，赣东北党组织和方志敏同志决定要我和邵式平同志随军行动。并交待两个任务：一是受赣东北党组织及方志敏同志的委托，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虽然过去通过电台和“交通”同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赣东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当面向中央汇报工作还是第一次。这次适

逢中央调红十军去中央苏区，方志敏同志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二是这次红十军调往中央苏区，有不少同志不愿走；也有少数同志对中央这项决策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把我军过分集中，与敌人死打硬拼，是不对的。同时认为以赣东北为中心的闽浙皖赣的根据地应该巩固和发展，不应该削弱它。这块地区，无论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对我们都有利。如果红十军一调走，留下少数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就必然受到敌人的破坏和摧残。因此，当时少数领导干部对这个命令有不同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方志敏同志对我说，红十军调中央苏区去，有的同志想不通，不想去，这种情绪不好，要服从中央的命令。你是赣东北的"老人"，是领导干部，又是我的弟弟，你带头去，对部队有影响。经志敏同志这么一说，我完全理解了，我愉快地和红十军政委邵式平同志一起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黎川县，红十军受到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的热情欢迎和接见。黎川军民还开了欢迎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项英等同志都到会讲了话。周恩来同志还特意接见了排以上的干部并讲了话。他要求干部要带头搞好团结，努力作战，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而共同奋斗。

我们到黎川县时正值春节。红十军受到中央领导、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原来一些同志离家不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我们把部队的工作安排好了，就准备起程前往瑞金向中央汇报工作。

一九三三年春，我同邵式平同志一路扬鞭策马奔向瑞

金。在苏维埃的土地上，虽然处在紧张的战争时期，但中央苏区内广大军民情绪镇定，斗志昂扬，到处洋溢着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时，临时中央的工作由博古同志主持。我们先向博古同志作了汇报，后又到沙洲坝向毛主席汇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很激动。我们的谈话有说有笑，非常随便。在我们汇报时，毛主席详细地问了赣东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情况，并要我们画个草图加以说明。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那里很好，以武夷山为中心，逐渐地向周围发展，大有文章可做。毛主席接着问，你们为什么把部队调到中央苏区来？我们回答说是中央调我们来的呀！毛主席沉默了一会，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赣东北根据地嘛。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我和邵式平同志都非常高兴，心想我们可以回去了。我心切地问："毛主席，我们还是把队伍带回去吧？"毛主席认真地说，不行，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后来我们才知道，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以后，即对毛泽东同志进行排挤和打击，把"左"倾路线推进中央苏区。并污蔑毛泽东同志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最后以批准毛泽东同志养病为名，而实际上撤消了毛泽东同志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是，当时毛泽东同志无论是言语上和表情上，丝毫都没有流露。仍是那样充满着革命的乐观情绪和必胜的信念。使人难忘。

汇报工作结束后，中央组织局李维汉同志通知我说，中央军委来了命令，任命我为三十一师政委。

三十一师是红十一军的一个师。当时，红十一军军长是

周建屏同志，政委是肖劲光同志，参谋长是粟裕同志。该军辖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个师。三十一师原师长是寻淮洲同志，政委是王如痴（后叛变）。他们调走后，由一团包团长提升为师长，我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是陈一同志。

卅一师是个特殊的师。平时归红十一军的建制，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因为该师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挺进到敌人心脏地带去活动，故该师又名为挺进师。该师的战士和干部都是经过挑选的，够得上兵精将猛。火力很强，一个班配有五、六挺轻机枪，弹药充足，并有电台通讯联络。这些装备在当时来说是很优厚的。

我一到任便投入到第四次反“围剿”的一场大战中。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蒋介石集中九十个师，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指挥，采取分兵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进攻的敌人分三路纵队：右路纵队由宜黄、乐安、黄陂一线前进；中路纵队由藤桥、南城、南丰一线前进；左路纵队由贵溪、金溪、黎川一线前进。三路敌军企图合攻南丰、广昌间的红军主力。

当时，我军三、五军团正在围攻南丰，见敌军靠近，便命令地方部队、游击队与敌人周旋，将红军主力转移隐蔽到黄陂、蛟湖、大龙、登仙桥地区。此时，准备经过黄陂地区的敌右路军是罗卓英带领的第五军。该军辖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罗卓英因为刚升任军长，正在抚州庆贺提升，前线军事由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代理指挥。

为了集中力量消灭这股敌人，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我军主力分为左右两路，成夹击之状，埋伏在黄陂一带的丛山中。左翼部队为红一军团、三军团和廿一军，由聂荣臻同志率领；右翼部队为红五军团、十二军、

廿二军和独立五师，由董振堂等同志率领。

这次战斗，红十一军由红一军团指挥。我师于二月二十七日晚进入阵地，埋伏候敌。大家在阵地上，背靠背地挤在一起。由于风吹雨打，外寒内饥，战士们冷得直哆嗦，不时发出捂着嘴的咳嗽声。天刚蒙蒙亮，得到情报，敌人已开始运动。八时许，敌人如期进入我伏击圈。山雾细雨，迷迷蒙蒙。一声令下，红军突然自天而降，四面向敌袭击。我军喊声震天，敌军措手不及，呼天叫地，乱成一团。战斗打响不久，我军首先俘获了敌先头部队的电话总站，敌人失去联系，指挥终断，自顾逃命。战斗不到三个小时，敌五十二师全部被歼，敌师长李明被俘了。我们正在打扫战场，传来了命令，命令挺进师立即撤出战场，追击敌人。于是，我师奉命退出战场，长追敌人百余里，一直追到南丰县城附近。在追击中，我们又歼敌一部。

黄陂战斗，我军歼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两个师，两个师长一个被俘，一个击毙。据说，陈诚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沉痛。”这一仗，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我们这个师先后归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和董振堂同志率领的五军团指挥。打了几仗以后，部队便进入闽赣根据地，集结在黎川、南城一带。为了便于战争时期军政统一领导，我除军队职务外，还兼任了黎川中心县委书记。

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已联成一片，从而切断了敌人东线与北线的联络，直接威胁着敌人反革命中心的抚州、南昌。这个形势，为建立闽赣省军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中央指示在闽赣省委

领导下，成立闽赣省军区。省军区设在黎川、光泽、资溪三县交界处的牛田隘。由肖劲光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四十次常委会。会上，由邵式平同志报告了闽赣方面的工作，会议还审查了红十一军近期活动情况的电报。经过详细了解，认为闽赣苏区扩大，建（宁）、黎（川）、泰（宁）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后，对我特别有利。况且地处武夷山脉，进可攻、退可守，东可威胁福州，西可威胁南昌，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要地位。因此，争取这一广大区域成为巩固的苏区，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经请示中央后，决定把以建宁为中心的建、黎、泰根据地、以资溪为中心的根据地（包括光泽、邵武、资溪、金溪、贵溪）、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根据地（包括浦城、建瓯、建阳、上饶、广丰、铅山）合并，正式成立闽赣根据地。中央派顾作霖、毛泽民、曾镜冰、肖劲光等同志，闽北抽调黄道、肖韶等同志，赣东北抽调邵式平、方志纯、彭皋等同志到闽赣根据地工作。

我们这些同志先后来到资溪，在资溪开会商定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以顾作霖、邵式平、毛泽民、余泽鸿、钟州斌、肖劲光、周建屏、黄道、薛子正、陈荣州、方志纯、王火仔、张光发、吴家园、包维贤、刘才英、钟光来、钟宝光、曾绍铭、邹琦、黄立贵、彭皋、李德胜、刘炳龙等二十五人为委员。并以邵式平、顾作霖、钟州斌、毛泽民等九人为主席团，邵式平为主席。同时，正式成立了闽赣省委和建立了省委机关。顾作霖为省委书记，黄道为宣传部长（后肖韶）、刘炳龙为组织部长（后黄道）、张荷凤为妇女部长。还正式宣布成立了闽赣省军区，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委（后为叶剑英同志），薛子正为参谋长，并相继成

立了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组织。

一九三三年五月初，闽赣省革命委员会组织成员在资溪集中筹备后，确定黎川县城为省会，同月，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临时代表会议在黎川县湖场开幕，参加会议的有省、县、区代表和红军代表约三百余人。会场布置得很庄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条巨幅标语："罢工、罢工、罢工、逼得资本家要死""暴动、暴动、暴动、国民党何处偷生"。这次会议由顾作霖同志主持，邵式平同志作了闽赣省的"目前中心任务与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正式成立了闽赣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并选举通过了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委员。闽赣省苏维埃主席是邵式平，秘书长是吴炳怀，财政部部长是毛泽民，土地部部长是钟光来，裁判部部长是曾绍铭，教育部部长是胡德兰（女），政治保卫局局长是杨良生。

至此，闽赣省委、省军区、省苏维埃已全部正式建立。

一九三三年六月，闽赣省苏维埃政府公布了"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斗争方向的决定"，准备着手解决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等问题。"决定"的内容是：

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坚决执行土地法；

二、坚决执行劳动法；

三、号召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武装起来；

四、从深入和扩大土地革命中筹集经费；

五、发动广大群众深入肃反斗争；

六、巩固扩大苏维埃区域；

七、健全乡一级革命委员会工作，驱逐隐藏在政权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一切腐化怠工分子。

一九三三年七月，闽赣省苏维埃从湖场搬到黎川县城，设在城外的邓氏家庙里。

闽赣省成立后，我挺进师的任务就是配合兄弟部队不断出击敌人，扩大红色根据地。同时，也经常深入白区搞一些军需民用的物资，解决根据地内的燃眉之急。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开始着手进行向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敌人为了隔断我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悍然出动重兵，进犯黎川。

驻守黎川的红十一军，本来是一支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但是，由于个别领导盲目乐观，轻视敌人，未加严密防守，致使敌人攻城时，我军措手不及，黎川城于九月二十七日被敌轻易夺取。

敌人占领黎川后，一面由硝石攻占资溪桥，一面由黎川城向茶亭方向追击我红十一军的一部。这时，我师随红三、五军团由福建活动回来，在沟口与敌遭遇。沟口位以黎川的东面，是黎川通往光泽的唯一要道。遭遇之敌为国民党第五师二十七团和第六师十八旅，敌人由于自进犯以来，未遇大仗，傲气十足，加上刚取黎川，更显得不可一世，象饿狼一样横冲直撞。我军突然与敌相遇，虽然情况不明，但由于红军长期进行游击战争，善于在突然和敌军遭遇的情况下打恶仗，于是，我军很快就布置好了向敌人的进攻：第一路由茶坪、厚村、莲塘方向的进攻，打敌人的右翼，截断敌人从硝石来的增援部队，堵死敌人向南城的归路；第二路从湖场、飞鸢、荷花庄方向进攻，打敌人的左翼，截住敌人从黎川城来的增援部队，同时堵死敌人缩回黎川的道路；第三路从洋家岩、沟口方向正面进攻敌人。

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晨，我军总攻击开始，经过激烈战斗，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地败窜下去，并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剩下的敌人，想缩回黎川，被我左翼部队堵死；想退回南

城，又被我右翼部队堵死，敌人进退不得，被我军紧紧包围在沟口、莲塘、茶亭一带。敌人妄图作垂死挣扎，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军进行反扑，但都被我军打败。下午一时许，敌军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所率的三十四、三十一团全部被我军消灭，葛本人被俘。敌第五师二十七团被歼一部分，周浑元率领的增援部队三个团，也在下午三时许被我击溃。

沟口之后，威慑了敌人。我军刚从前线作战回来，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休息整顿，观察情况，选择时机，出击敌人。但是，当时的领导者，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于收复，又命令红军，北上就敌。我军打南城之硝石镇，不胜，又打黎川之资溪桥，又不胜。这时我军已处于十分被动地位。十二月十二日，红军第三次进攻，打黎川之团村。团村战斗，虽然击溃敌人十二个团，但未能全歼，而且我军损失很大。

毛泽东同志后来对这次战斗作了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总结。毛主席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到："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确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开脚一步就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在战争时期，事情往往是这样：由于自己的战略方针或战役指挥上的错误，实际上是断送自己，帮助了敌人。

当时，在对待福建人民政府的问题上，也是这样。福建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在蔡廷锴的领导下，

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并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一件好事。蒋介石对此非常恐慌，连忙从北线抽调兵力进攻福建的十九路军。当时，我师从沟口撤出后，正运动在黎川、光泽一带。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匆匆忙忙向福建前进，却不主动攻击，采取守势，还在沿线大作工事，构筑碉堡。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在纳闷。战士问排长，排长问连长，连长问团长，团长来问我，我也不知道。大家只好拭目以待，等候命令。结果，久等无令，我们只好莫明其妙地看着敌人向福建调动。尔后，我们才知道是蒋介石调兵去镇压“福建事变”的。本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理应积极地支持主张反蒋抗日的进步力量，坚决地、迅速地截击去镇压十九路军的反动军队。但是，当时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却不然，而是采取了与此相反的错误行动。他们说什么“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至使蒋介石不但顺利地镇压了“福建事变”，而且得以从容地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使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极大挫折和损失。

机会主义者，往往都是在顺利时忘乎所以，搞冒险行动；在困难时候悲观失望，缺乏信心。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敌军先向建宁方面进犯，以打通黎川、建宁一线。“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视敌如虎，他们既不敢深入敌后，到外线去作战，又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而是错误地提出“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口号，命令红军在康都、建宁一带处处设防，节节抵御。这个时候，我师开始是配合五军团守建宁的将军岭。将军岭是建宁的一扇大门，上级命令我们死守，并命令我们大筑碉堡，“以堡垒对堡垒”。我们丢掉了红军的传统打法，却把一师人分散到各个碉堡中去，敌人的

火力很猛，一发炮弹打来，将我们连人带碉堡全部摧毁。而我们又没有重武器，对敌人的碉堡毫无办法。冲不上去，撤不下来，守的时间越长，困难越多。已处于弹尽粮绝、伤员无法安排的境地。可是，上级还是一个劲地命令死守。将军岭一战，我师损失大半。结果，还是没有守住，被迫从建宁撤退到广昌。

在广昌又同敌人决一死战。我师在苦竹一带抗御敌军。英勇的红军战士，为了守卫红色的土地，同敌人死打硬拼，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毕竟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苦竹也没有守住。这一战，我师损失更加惨重，从广昌撤退时，一个师的人马已剩无几了。

广昌失陷后，我就离开挺进师了，该师在江西补员以后编入红七军团。

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间，我被任命为彭湃县县委书记兼城防司令（后为余泽鸿同志）。

这时，闽赣省的领导已有了新的变化。原来，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敌人占领黎川后，闽赣省委、省苏维埃迁到德胜关的井水和关上。十一月，又迁到建宁县，并在建宁县城的文庙召开了闽赣省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都到会作了讲话。会后，闽赣省的领导也有变动。赖昌作为省委书记，宋清泉为军区司令，苏维埃主席杨道明，军区政治部主任仍是彭祜。宋清泉原是彭祜的警卫员，所以，他虽身为司令，但对彭祜的话仍然是很听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党我军都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党内的思想统一不起来，军队内部广大指战员，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越来越不满，意见越来越大，要求毛泽东同志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呼声越来越高。这

种情绪，由隐蔽到公开，由小到大。于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的领导权，控制局势，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或不愿跟他们跑的人，就采取残酷地镇压——“肃反”、“反右倾”等在党内、军内越搞越厉害了。

在中央根据地，“左”倾机会主义者搞了个“邓、毛、谢、古”案件，他们想杀一儆百，把反对他们的人都压下去，报纸等舆论工具控制在他们手里，大造舆论。今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反这个右倾，明天又在报上批那个是反党；今天报道这个乡杀了多少“AB团”，明天报道那个县杀了多少“改组派”。搞得气氛十分恐怖，人人自危。此时，邵式平同志也被怀疑为“AB团”，调往中央审查。后来叶剑英同志、李克农同志亲自调查，才给予否定。我的名字也上了《红色中华》报，点名批判。

给我定的罪是三条：第一条是怀疑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领导上的指挥错误，在建宁、广昌战役中，仗越打越糟，人越打越少，士气越打越低。干部和战士牢骚满腹，议论纷纷。当时，我确实也有意见，并且在一定的会议上，或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把我的看法和意见，向领导上说过。按理说，这是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就犯了不得了的罪了。说对上级领导不满，就是对中央不满，怀疑中央领导，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就是“AB团”。这一条就可以致我于死地了，何况，还有第二、第三条罪呢！

第二条罪是散布悲观论调。当时，形势一天天恶化，闽赣根据地眼看着就要守不住了。在研究我们往何处靠拢时，省委内部意见有分歧。省委书记赖昌作主张往闽南运动，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主张往闽北靠。闽北是老根据地，又有黄

道同志领导的游击武装力量，再加上群众基础又好，地形有利，坚持打游击是可以的。可是，我的主张不但被否定，而且给我戴上了右倾怕死、悲观失望、不敢开辟新区的帽子。

第三条罪，是不顾群众死活。这是从何说起，我也莫明其妙。后来才知道，我曾建议过要精简省级机关人员，主张将干部家属在根据地安顿隐蔽起来，不要随军行动。因为当时的环境和形势，要求机关、部队都要有很强的机动性，家属一多，婆婆妈妈的事多，很难开得动，走得快。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和对某些问题认识上的分歧，竟成了罪，成了“反革命”。当时，既不调查，也不分析研究，任凭口供，无限上纲，草菅人命。

在外部敌人对我们的进攻越来越猖狂时，内部的“肃反”的气氛也越来越浓了。当时，闽赣省委宣传部长肖韶同志、妇女部部长李火凤同志、资溪县委书记彭皋同志都以“肃反”的名义无辜的被杀害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我也被抓了起来。

红军已撤出根据地，长征已开始了。为了坚持继续战斗，中央决定留下项英同志、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分同志，分别组成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负责指挥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当时，闽赣省还通过电台，不断与中央和中央分局取得联系。

我在被关期间，不断审讯——其实，也无须审问，罪状早已定了。一九三四年底，我从彭湃县押送到省委所在地建宁县。在建宁又吊打了三天，逼我承认是“AB团”。第三天晚上，审讯人员来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知道，这是要准备杀我了。这时我心里很难过，但不惧怕。我说，你们愿意杀就杀，我无法拦住你们。我决不是“AB团”，我不是

反革命！但我有个要求：请给我发两个电报，一个给项英同志，一个给方志敏同志，向他们报告一下。他们知道我是不是"AB团"。

我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我预感到，这是我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了。我心里翻腾着……，我出生入死在战场，天大的困难心不寒，一心跟着党干革命。可是，现在却要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被自己的同志杀害了……。可惜，我没有死在战场上，却不明不白死在这里。我还年轻，我还要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啊！不知他们会不会发电报？不知他们会不会回电报？……我正在左思右想，这时，东方已发亮了，从窗户上照进几道晨光。保卫局的人进来，把我从梁上放下来，我以为我的生命要完结了。没有想到他们的态度变了，好声好气对我说，对不起，你受委屈了，吃早饭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项英同志接到省委的电报后，立即回了电报，讲方志纯同志是个好同志，不会是"AB团"，他可作保，要省委立即放出。这样，我才免于一死。如果项英同志不回电报，或迟几个小时，我早就身首异处了。一九三七年在延安碰到项英同志时，他高兴地问我：你还活着？我感激地说，如果没有你的电报，我今天就见不到你了。

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处理了，但最使我想不通的是，当时关我的人，审讯我的人，打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互相之间都非常了解，怎么能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成了反革命，是敌人？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搞点调查研究，却让自己的同志、战友互相摧残，至使许多好同志被错杀。这种错误的作法，对党和军队的破坏和瓦解，胜似敌人数倍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常批判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路线。这是

血的教训，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红军长征以后，敌军用了二十个师的兵力占领苏区的重要城镇。前几年逃跑的地主恶霸又都跟着敌军回来了，对苏区人民进行残酷地镇压。有的村子被烧为灰烬，横尸遍野，有的枪决，有的砍头。就连小孩、老人也不放过。苏区人民可吃了苦头了。我们留下的部队多数都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闽赣省根据地，实际上就成了一块游击区。部队有时分散，有时集中，在游击区内和敌人兜圈子。在这种情况下，困难就更多了，思想情绪更复杂了，部队更难带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们在福建龙溪县境内的一个山头上和敌人遭遇。这是敌五十二师。这一仗打的很艰苦。因为敌人太多，我军边打边撤。在战斗中，我的脚被打伤了，只能爬行，不能走动。政治部主任彭祜从我身边走过，我请他派人来背我，他不肯，只顾自己。我躺在荒山上，望着迅速远去的同志们，一颗颗热泪不禁脱眶而出。

我被捕了。和我一块被捕的有朱木贵同志，他原是在中央医院工作，红军长征时转移到闽赣根据地来的。当天下午五点多钟，我们被押送到附近一个村子的祠堂里。我坐在地上，半躺着身子，伤痛得如刀绞。但我咬紧牙关，忍住呻吟。我抬头，突然看见马步英同志在祠堂外面走动。马步英同志是赣东北一位老同志，一直在部队里搞侦察工作。我意识到他是化装来侦察的。我们互相目视，但却不敢打招呼，否则，一打招呼便两个人都暴露了。

审问开始了。敌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教书的。因为我刚被保卫局以“AB团”问题抓了起来，才放出没有多久，加上连续行军打仗，身体比较瘦弱，同时，又是穿的是便衣，确实是一副穷教师的样子。敌人对我从上至下打量一

番，横着眼睛，疑视地用脚踢着我的腿说：你这腿怎么搞的？我就编个理由说，我看打仗，就向外跑，想躲一躲，谁知被枪打断了脚。我边说，边叫着伤痛。敌人搞了一阵子也没有问出什么名堂。加上我走不动，反正跑不了，又把我和朱木贵关在一起。我们两人，这一天一夜，不但没有吃饭，连口水喝都没有，口干舌苦，多么想喝点水啊！

第二天，他们将我们押送到敌五十二师留守处去。我负伤的右脚不断地还在流血，他们给我简单地上了点药，随便包扎了一下。

晚上，一个处长来审问我。他边抽鸦片，边问道："你在红军里干什么的？你们有多少兵？"

我以为他们搞清了我的底细，心里一惊。但我立即又镇静下来。我说："我不是红军，我是教书的。"这家伙想在我身上搞点"油水"，他放下烟枪，走过来，口气缓和地说，"唉！你这里有保人吗？如果有人，拿点钱来，我就放你们回去。"

"放我回去，还有这样好的事"。我高兴起来，但马上又冷静下来：这里搞的什么鬼明堂。我的脚已断了，不能走动；同时，在福建我人生地不熟，说话又不懂。如果出去，一个可能是死在路上，一个可能又被敌人捉回来。于是，我说："这里我没有熟人，也没有钱，我的脚骨头已经打断了……"

"去，去，去……"很火气地瞪了我一眼，又抽起他的鸦片了。

这样，敌人便将我和朱木贵同志寄押在龙溪县的监牢里。

当时，龙溪县的监牢里只有五十几个犯人，大部分是

“匪犯”。监狱长叫曾宗彝，看守长姓杨，还有两个看守，一男一女。按照编制，监狱允许设一个文书，但这个监狱未设，文书的工作就由那个姓杨的做。这样，曾宗彝就吃了个空额。姓杨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于是，这家伙经常找犯人给他干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敌人知道我是“教书”的。一天，曾宗彝问我，你的字写得好不好？我说，我是教书的，会写字，但写得不好。曾说，你来试试看。他就叫我写了几个字，见写得还好，就叫我填写“囚粮表”。从这个“报表”里可以看出，这些家伙，不但吃空额，而且还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克扣口粮。卡下犯人的这些钱和物，都被监狱长和看守长分掉了。

他们经常找我给他们搞点抄抄写写的事，因而，就慢慢地同曾宗彝搞熟了。我曾试探性地向曾作点宣传工作。当然要含蓄些，不能太明朗了，否则就更增加他的怀疑。开始，他总是爱理不理，似听非听。有时他又以怀疑的眼光看看我。不过我始终是以一个做教师的身份，谈点在苏区的见闻。常以道听途说的方式向他宣传一些苏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这个家伙大概也听过一点，对有些问题总是半信半疑。我记得后来他对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就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伤势渐渐地好转了，慢慢地能走路了，我心里就有些着急了，总想出去找组织，找部队去。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脱离党，脱离集体更痛苦的了。在这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多么想念党，多么想念战斗在战场的同志啊！我曾多次试着向曾宗彝提出放我出狱的要求，但这家伙就是不同意，说我的问题还没有搞清呢。有时又说，如果你能找个保人，可以放你出去。可我在福建人地两生，哪里找得到保人？！还是走不了，

真急啊！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朱德同志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也到达了陕北同毛主席会合了；日本侵占了东北，正在向华北进军，全国人民坚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已经兴起抗日的高潮。从报纸上可以看到，全国的形势发展如此快，心里既高兴，又着急。我无论如何要设法走出去。

一天，曾宗彝说，“我要调走。”我默默地想，这是个机会，乘他办移交的时候，要想办法出狱。我问他：“我在这里蹲这么久了，我的案子到底搞清了没有？”

“你是一般的案子，有人具保，我就放你走。”听他口气可能有点希望。我又进一步说：“我在这里人地生疏，有谁保我？”这家伙，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就走了。

没有过几天，米店的老板送粮来。我脑里一闪念，请他保行不行？因为这个老板常来送粮，我也见过几次面，有时也谈上几句。我把我的想法向这位老板提出，他表示可以。结果就这样，由米店老板具保，曾宗彝就办理手续报送伪县政府批准，第二天我就被释放了。

释放了，出狱了，真高兴。我正准备设法找党组织。但曾宗彝又抓我给他出一趟差：叫我和杨看守长先送他老婆回福州。后来，我知道不是他老婆，是一个姘头。这怎么办？不去，又怕他借此找我的麻烦；去吧，又怕被他缠住我走不脱。同时，这个家伙的鬼主意也毒辣得很：如果路上没有出乱子，这姘头就是他的了。如果路上出乱子，他既抛掉了这个女人，又可能嫁祸于我，再次把我抓起来。但我又想，何不就此机会，到福州去找找党的组织。如果找到了党，同党组

织取得了联系，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因此，权衡一下，我还是去。

还好，一路上还没有出事，将曾的姘头送到福州。我在福州跑了几圈，想找关系，但结果一无所得。没过几天，曾宗彝来了，他一家人就在福州住下了，等候任职。我以为这下可得放我走了，没有想到这家伙留我给他做饭。不久，曾宗彝被任命为永春县监狱典狱长。他叫我跟他去当文书。我不愿意去。我心里想，这家伙老是缠住我不放，这怎么能行，一定要设法摆脱他。但是，我找了许多理由推辞不去，结果都未成功，而且他又用威胁的口气逼着我去。再就是我的脚走长路还不行，要坐车走又没有钱，当时要离开福建还有困难。所以，我又答应了他。

永春县监狱比尤溪县监狱大得多。这里关了有二百名各种犯人，有匪犯（即土匪），有烟犯（即鸦片烟走私犯），有政治犯。这个监狱是一座极黑暗的监狱。号子里脏得很，苍蝇、臭虫、蚊子多极啦。犯人流行病很多，不要说洗澡，连喝水都困难，也不给理发，一个个长发污面，骨瘦如柴。看到我们一些同志在这里受这样的折磨，我确实目不忍睹。怎么办！我外边找不到关系，眼下解救他们，我还没有力量。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条件都要为党工作，要开展活动。因此，我就着手找几个基本群众，做做工作，视情况能否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经过多次接触和慎重选择，我选了两个人作为建党对象。

一个是刘麟（又叫刘本强），这个人是山东人，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参与者。父亲死后，在家无法生活，就出来逃难。到了福州，通过他表哥的关系，安排到这里伪县政府作勤务员。在谈话中，知道他对国民党不满。刘的表哥

是福州市闽海税务局的一个课长。该局需要税警，他表哥来信问他去不去福州。他当然愿意去。刘麟后来就到福州去了。

还有一个是王士焜。他是湖南人，大革命时期，湘赣两省的革命斗争，他虽然没有参加，但耳闻目睹。因此，对工农革命有一定的了解，比较同情。也是因生活所迫，逃到福建来的，在永春当警察。他既是法警，又是交通警，在永春县活动很方便。

这两个人我们常来往。但要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还需要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就在这时，这里突然发生一件事，我必须得设法离开这里。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永春县监狱发生越狱事件，跑了十几个政治犯——都是永春县地下党的同志。此事好得很，我非常高兴。但伪县政府把曾宗彝扣起来了。我想，这家伙为了自己脱身，肯定会把我抛出来作他的替罪羊。我决定逃跑。可是，我的脚伤还未好，走不了长路；坐车嘛，也不行。因为我一跑，他们肯定会通缉我，到时只要在码头、路口一堵，就肯定会抓到。怎么办？我就去找王士焜商量，请他给我搞个路条。

王士焜考虑了好久。他说，路条倒是容易搞，但你这个脚怎么走得呢？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走。”王士焜决定警察也不当了，拼着生命，送我离开永春。我连行李都不拿了，坐在王士焜的自行车货架上，匆匆忙忙地连夜从永春逃到了厦门。到了厦门，王士焜卖掉了自行车，买了船票，我们俩到了福州。

果然，我走了以后，永春县就通缉我。到了福州以后，我们就去找刘麟，请他表哥想办法，给我们找个差事干。过了几天，刘麟告诉我们工作找到了，但只能安排一个人。我

和王士焜就推让起来。王士焜执意不肯，坚持要我去。他为了我，已经把警察的差事丢掉不干，自行车也卖掉了，我很过意不去。我就让他去。我们俩你推我让，坚持不下。王士焜诚恳地说："冠雄(我被捕后就用这个名字)，我们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感觉你不是一般的教书人．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暂时先留下，我回家去，我回去比你要好些，至少不会杀头。"我向前抓住王士焜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王士焜同志。"

王士焜同志回去没有路费，刘麟就卖掉了他多年积攒买的一个金戒指。王士焜走的头一天，我们在福州一个偏僻的地方坐下来话别。我们本来是萍水相逢，但是他为了我，丢掉饭碗，冒着危险，送我逃生。在这患难知己面前，我还有什么不可以说呢！同时，他已察觉到我不是教书的了。我就如实地对他说，"我的真实姓名叫方志纯，是红军，是共产党员……你是湖南人，我是江西人，我们是异乡相逢，患难之交。以后，你如果要找我，可以到延安来找，我是一定要到延安去的。"

他握住我的手说要我多保重。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多年，直到全国解放了，他在报纸上知道我在江西工作，才到江西来找我。

我在闽海税务局当差，任贴票员，每天就是贴贴税票，事情很轻松。但是，全国已掀起抗日的高潮，我党我军在华北第一线同敌战斗，我怎么能在这里呆着！一有空我就到福州市图书馆去，翻报纸。了解一下全国的形势。同时，也想看看能否从报纸上找到福建党组织的蛛丝马迹。没有想到，党没有找到，同志没有找到，却看到了宋清泉、彭祜在报纸上登的"反共启事"消息。看到这个消息时，我都呆了。军

区的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叛变了，闽赣省的党和军队一定要受到更大的损失了。后来我知道，宋清泉、彭祜这两个家伙，为了向反动派表示他们反动的决心，还把省委书记钟循仁同志骗到荒野之地杀害了，作为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见面礼。

事情总是那么偶然，真是无巧不成书。一天，我去福州一家温泉洗澡，我刚进来坐下，正在准备脱衣服，突然看到彭祜衣冠楚楚地走进来。这时已经没有办法回避了。他感到非常突然地向前问我："你怎么也在这里？"

"那年我受伤，你们丢掉我，后来我就一个人流落到这里了。"我正说着，宋清泉也来了。我一看，糟了！这两个叛徒，他们只要一个人缠住我，一个人报告，或者是两个人抓住我，往国民党那里一送，我不就又完了吗？于是，我急中生智，向门口望了望说："怎么搞的，我们两个人来洗澡，还有一个人哪里去了？"我回过头给他们说："你们先洗吧，我看看去。"说完就往外走，赶快溜之大吉了。

真是冤家路窄，恶有恶报。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湖南省政府副主席袁任远同志到庐山，有一天在闲谈中，我无意中问道："你们湖南有个彭祜，你知道吗？"袁任远同志说："知道，黄老（黄克诚同志）把他安排在民政厅工作呢！"我听了大吃一惊，这家伙还活着。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袁任远同志。袁任远同志听了也大吃一惊，连忙告诉湖南省委。经过调查后彭祜被逮捕了。审问时，他供认不讳。结果，彭祜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宋清泉呢，他是瑞金人。解放后，有一次开会，我问赣南行署主任钟民同志知道不知道这个人的下落。我并把宋清泉的情况告诉了钟民同志。钟民同志回去一查，这家伙还隐藏在家里，经过查实，给了他应

得的惩罚。

这两个叛徒在福州的出现，促使了我必须迅速离开这里。我把刘麟同志找来研究下一步如何办。这时刘麟同志经我介绍已入了党。同时，我们还物色了三、四个发展对象。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裁缝家里还设了联络点，定期接头，研究问题。

我把彭祜、宋清泉的情况以及在福州相遇的情况向刘麟同志介绍了。我们商量，决定还是走。但没有路费。于是，我就用乳名写了封信给我姐姐，请她设法给我寄点路费。我姐姐又将此信转给我哥哥方远勋。哥哥见了信，着急得不得了。再困难也要设法搞钱。结果，卖了几亩青苗，凑了五十块钱给我寄来了。可是还不够我两人的路费。我们决定一路上省吃俭用，就是讨饭，也要一起走。

正在这时候，一九三七年夏，我在报纸上看到成立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消息，办事处主任就是曾经在闽赣省军区领导过我们的叶剑英同志。我高兴极了。立即写了封信给叶剑英同志，简单地说了我在福州的情况。叶剑英同志很快就回了信，并给我寄了五十块钱。我拿到叶剑英同志的信和寄来的钱，激动得两手发抖，热泪盈眶，我屏息静气地凝视着北方，党啊！我可找到你们了。

我和刘麟同志的路费都解决了，我们向闽海税务局消了差，就远走高飞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和刘麟同志到了南京。

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叶剑英同志和李克农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以后，我们经西安到了延安。一路上，我将在福建的情况，向组织上作了口头汇报。但是，由于到延安后没多久，我就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所以没有写出

书面材料。刘麟同志去抗大学习。后来，解放战争时，刘麟同志在东北牺牲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毛主席在他住的窑洞里接见了我。在谈到闽赣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时，毛主席问我："听说，闽赣苏区这次出现了好几个叛徒？"我向毛主席报告说："是啊！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几个主要领导人都叛变了。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闽赣苏区不能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点了头表示赞同。

十二月，朱总司令接见了我。朱总司令要我谈谈南方根据地的情况，他特别问了闽赣根据地失败的原因。

我向朱总司令报告说："红军长征后，闽赣根据地的力量就显得很单薄了。我曾提出，应该向闽北靠，那里有黄道同志领导的一支武装，群众基础好，地形又复杂，坚持打游击是有条件的。"

"对嘛！往闽北靠就好了。两块根据地打通了，就有力量了。"朱总司令说。

"可是，省委、军区几个领导人不同意：他们主张往闽南进攻，开辟新的根据地。结果，不仅没有在闽南站住脚，而且由于宋清泉、彭祜等人叛变，最终使军队垮了！地盘也丢了。"朱总司令听了以后，心情很沉痛，在窑洞里来回走着，但没有说话。

想起失去的根据地，想起牺牲的同志，我心里很难过。朱总司令安慰我说："革命是艰难的，道路是曲折的，牺牲也是难免的。吸取教训吧。"

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概况

李步新　江天辉　刘毓标　许登寿

前　　言

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是继承方志敏同志的革命遗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英勇的皖浙赣边区广大人民的参加和支持下，经过与敌人生死搏斗的斗争过程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它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在整个人民革命战争史中，占有光荣的一页。

编写这部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对于保存革命历史资料，积累革命斗争经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作为纪念革命先烈，激励我们自己和教育广大青年一代来说，也是有它的重要现实意义的。

要想编写好这部战争史，并不是没有困难的。第一，当时许多重要历史文献，在游击战争中被损毁了，保存下来的很少；第二，相隔时间太久了，已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近十年的和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些事实是不可能没有遗忘的；第三，当时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有的在对敌斗争（包括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了，有的为了革命工作，贡献了他的生命，剩下的人就不多了。这次在南京参加座谈的，仅有我们四人，还有倪南山、

邹志成、黄光裕、柴荣生、郑占魁、陈祥元等同志均因工作关系未能参加，只好凭着我们几个人的回忆，来担负这个光荣的编写任务了。

虽然存在这些困难，我们还应该尽我们的努力把它编写起来。我们编写的办法是：采取大家想，大家谈，个人回忆和在群众中调查的材料相结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然后把材料汇集整理起来，加以核对，从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求材料真实完整，尽管这样，遗漏和差错的地方仍是难免的。

一　皖浙赣边区概况

皖浙赣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以黄山、鄣公山、磨盘山、怀玉山等山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的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上饶、乐平、婺源、浮梁、都昌、湖口、波阳、彭泽等县，安徽的休宁、歙县、祁门、黟县、太平、石埭、青阳、贵池、秋浦、东流、泾县、旌德、宁国、宣城和浙江的开化、淳安、遂安、昌化、于潜、孝丰等县地区。

这里有世界闻名的景德镇瓷器、祁门红茶、婺源绿茶，有漫山遍野的森林和丰富的地下宝藏，盛产大米、玉蜀黍、茶油、桐油和香菇、药材以及大量的竹、木、柴、炭等，这许多大宗的土特产品运销国内外的各大城市。

虽然物产这么富饶，但是广大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却深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地下矿藏为日、英帝国主义自由地开采，由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丝、茶、桐油等大大跌价，这些都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广大农民在高额地租和高利贷……

剥削下，更是苦不堪言，“镰刀挂上壁，饭就没有吃”。就是当时农民生活苦痛的写照，在这重重压迫下，人民不得不起来为争取生存和解放而斗争。

从战略上来讲，这个地区也是十分重要的。黄山、鄣公山、磨盘山、怀玉山等，山峦起伏，连绵不绝，加上皖浙交界的天目山，构成了一道进可以出击，退可以隐伏的游击地带。

在交通上，浙赣铁路贯穿在边区的东南部，青屯公路直达黄山，西临赣水，北倚长江，内河有信河、乐河、青弋江、新安江，交通四达，不仅沟通了边区与外地的物资交流。更重要的是：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革命武装的扩大，直接威胁到九江、南昌、芜湖，特别是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这就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和破坏。于是在这个地区，就展开了敌我之间“围剿”和反“围剿”的残酷的革命斗争。

二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浙进军

当时总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继续侵犯我华北各省。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大敌当前，仍然奉行其“不抵抗”政策，反而进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欺骗宣传，积极反共，调集百万以上的大军，进攻苏区和红军。这种“反共投降”的卖国政策，不能不激起全国广大爱国人士的愤怒，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反动统治地位日益走向崩溃的局面。

我党中央鉴于民族危机已达到千钧一发之际，坚决主张团结抗日，公开对日宣战，发表了庄严的北上抗日宣言。我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先后分别出动北上抗日。全国人民对于

我党我军北上抗日的实际行动，表示全力支持和拥护。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高潮下，并未丝毫改变其“反共投降”的卖国政策，继续调集大军，一面对我西进长征的红军主力，前堵后追，一面集中力量向我各根据地大举“清剿”。

赣东北苏区是在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邹秀峰等同志领导下建立的。一九二七年，这里就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弋（阳）横（峰）起义。后来革命形势很快发展到闽北、浙西、皖南，建立了闽浙皖赣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红十军与红十军团，并粉碎了敌人先后四次“围剿”，巩固了苏区。

国民党匪军调集大军向我赣东北苏区发动五次“围剿”，苏区军民经过一年的苦战，在敌人的步步为营堡垒政策推进下，形势日趋紧张。虽然处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闽浙赣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指示，根据中央命令，中央苏区红七军团与赣东北红十军团向皖浙进军。以方志敏为领导，组成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我赣东北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逐步地被缩小了，并遭受到严重破坏。虽然革命遭到暂时的挫折，总的革命斗争形势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但是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从斗争形势的发展来看，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新的根据地，积蓄和保存力量，准备迎接新的形势的到来。

红十军团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青流、大田、古田，于十月到达赣东北苏区德兴重溪。

根据中央指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团应跳出敌人的包

围，向皖浙地区进军，北上抗日。于是红七军团复于十月二十日左右，从赣东北苏区出发，经常山、上坊、分水，克旌德县城到黄山汤口、芳村一带。红十军团于十月二十四日从葛源出发，经重山关到德兴重溪，到二十八、九号才最后突破封锁线，经婺源到开化，在婺源大坂和驻守碉堡之保安团打了一次仗，歼灭敌人大部，烧毁敌人碉堡，复在蓝渡截击敌人汽车数辆，缴获敌人弹药武器及一部分物资后，就到了黄山汤口、芳村一带和七军团汇合。

一路上，北上抗日先遣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群众见到红军，杀猪送粮，夹道欢迎，象见到自己亲人一样；而豪绅地主则纷纷逃命。北上抗日先遣队每到一处，向群众宣传我党主张和政策，散发北上抗日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反共卖国行为，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怒，而对共产党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则有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两军汇合后，部队正式进行改编，将原七军团与十军团合编成十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以方志敏为前敌总指挥，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刘英为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参谋长。军团下面设十九、二十、二十一等三个师。与此同时经中央批准，以方志敏、乐少华、刘畴西、刘英等同志组织政治委员会，方志敏同志为书记。这是当时党政军最高的领导机构。

当时我军的主要任务是：以黄山为依托，在皖浙边相机歼灭敌人一部，牵制东南方面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西进，并创立新的根据地。于是经过两天的整编后，即翻黄山，到达古竹溪。但这时敌人已布置了重兵在皖浙赣边，阻击我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二天我军抵达谭家桥，和敌补充王旅战斗了

一天，后因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且双方伤亡很重，我军便在当天的晚上退出了战斗，接着走旌德庙首、白地翻皮岭大山经泾县、茂林、青阳进入柯村苏区作暂时休息。不到三天，因敌人进攻，部队又向东流、祁门、休宁、太平、泾县、石埭、秋浦、青阳等地进军，屡胜强敌。但是终因敌人重兵堵击，我军又十分疲劳，加上给养困难，伤亡很大，乃决定回师赣东北苏区准备重新整顿队伍，补充修整后，再执行任务。于是部队就向赣东北苏区行进。但是在走到怀玉山时，部队遭敌袭击，司令部电台被打掉了，方志敏、刘畴西等同志不幸在陇首村因叛徒告密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被俘。刘英、粟裕等带了一部分红军（人数不详）进入赣东北苏区，不久，向闽浙边行动，建立了闽浙边根据地。

方志敏同志被俘以后，革命内部有一部分人丧失革命信心，而走上了动摇逃跑和自首、叛变的道路。如王弼、倪宝树、李伯钧、苏承平、徐世良之流，就叛变投降敌人，反过来破坏革命。但是绝大部分同志，继承方志敏同志的革命事业，在为方志敏同志复仇，为革命烈士复仇的口号下，继续坚定地顽强地同敌人作斗争。

三　赣东北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

红军主力离开苏区以后，敌人更加疯狂地大举“清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闽浙赣省委领导赣东北苏区广大军民转入游击战争。

这时省委机关和关英、余金德、滕国荣、邹秀峰等同志以德兴为中心，在德兴、婺源、乐平、浮梁一带，开展了游击斗争。唐在刚、邹琦、徐炎柴等同志率领一个独立团（九个连）和葛源战区游击队，以磨盘山为中心，经常活动在葛

源、篁村、槎源坞一带，并数次打进葛源街，消灭敌人。

为了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一九三五年四月，省委在德兴大田苏家召开了会议，决定成立信河和乐河特委。信河特委包括弋阳、横峰、上饶、铅山四县，由余汉潮负责；乐河特委包括德兴、乐平、婺源、贵溪四县，由程伯谦同志负责。信河和乐河特委及其所属县委均组织有精悍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据我们所知道的：在信河特委领导的地区，有上饶县何启泉等同志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在茗洋、关里及石人殿等地与敌人进行斗争；横峰的上坑源一带亦有一支游击队，在周志以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在乐河特委领导的地区，由贵（溪）余（江）万（年）中心县委组织的一支游击队，在中心县委书记赵梓明领导下，以三县岭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断地给进驻我苏区的敌人以严重打击，大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赣东北苏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清剿"，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而苏区人民革命斗争又受到极端严重的摧残，活动地区日渐缩小。省委及特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如唐在刚、邹秀峰、程伯谦、徐炎荣等亦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光荣牺牲。

敌人以无数倍的兵力继续向赣东北根据地进攻，采取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血洗苏区，使苏区军民武装斗争受到暂时挫折，苏区形成几十里地方无村庄，田园荒芜，渺无人烟。剩下的一部分群众在敌人统治下，所受的精神痛苦和生活无着，苦不堪言。但是敌人不能改变苏区人民革命决心。苏区人民仍然采取各种方式与敌人斗争着。

我们为了支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在适当时机组织了

短枪便衣队进去，打击了随国民党匪军回来称王称霸的豪绅地主、特务、流氓，捣毁了联保机关，捉杀了反动派，以揭破敌人说："红军被消灭了"等等的欺骗宣传，启发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可是因为苏区所有青壮年差不多都参加了红军，留在家乡的仅是些老弱残废、妇孺和小孩，他们见到红军游击队，在敌人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下，含泪带哭地问长问短，并打听方志敏同志等消息，有的问：听敌人说方志敏同志被俘了，可有此事？哭哭啼啼。但是他们懂得，要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一定要胜利的。他们时刻盼望着和祝福红军打胜仗。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意，把剩下一点粮食都给游击队吃，关心红军安全，派妇女带路，不让敌人发现，说发现了不得了啦。

苏区人民革命斗争，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人民革命的心和对革命胜利的盼望，给了我们极大的感动，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敌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为保存有生力量，并统一皖浙赣地区的领导起见，乃决定由关英同志带领部分同志向皖南转移。赣东北地区，成立中共赣东北特委，余金德同志为书记，领导赣东北地区革命斗争。

三五年秋，关英同志到了鄣公山后，信、乐河特委，在敌人包围"清剿"中失了联系（据上饶地委的调查材料，这些地区的游击队遭到了损失，负责同志光荣牺牲），赣东北特委在余金德，杨文翰等同志的领导下，仍继续坚持着顽强的斗争。到三七年四月间，余金德等同志率领独立营一部，与王丰庆率领的独立营两个连会师，打乐平鸣山，后因目标暴露，敌人集中兵力向他进攻，五月间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余金德同志不幸牺牲。然而这一地区，在杨文翰的领导

下，仍旧坚持着革命斗争。

此外，柳真吾、王丰庆、周成龙、匡龙海等所带领的挺进师，在一九三四年六月转到皖赣地区后，组织了赣北特委，同年秋末冬初领导了以浮梁之小源为中心，波及祁门、都昌、湖口、波阳、彭泽等地的武装暴动。暴动后，赣北特委改名为皖赣特委，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皖赣分区，周成龙为司令员，下辖一个独立师，王丰庆为独立师政委，匡龙海为师长。这次暴动后不久，敌人就集中了几个主力师和地方保安团进攻该苏区。挺进师主力大部于三五年初撤出苏区，转到贵（池）秋（浦）东（流）地区活动，皖赣苏区就转为游击区，由柳真吾等同志领导苏区军民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匡龙海、田英等同志率一部分部队由贵（池）秋（浦）东（流）仍回到皖赣的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打开新的局面。

一九三四年八月太平柯村暴动与皖南苏区的对敌斗争情况，其大体是这样的。刘毓标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夏经赣东北省委派往皖南白区工作，先在歙县任县委书记，同年年底又在太平、石埭、祁门、泾县、贵池任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四年上述地区发展很快，搞得很红，难以秘密下去，于是请示了赣东北省委，经批准后，同年八月即举行暴动。不久省委又派来宁春生同志率领的三百人的游击大队，加强苏区红军武装力量。当时分了土地与稻子，烧了田契、债券；土豪杀的杀，逃的逃，那时太平西乡一带，南北七、八十里搞得轰轰烈烈，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

三个月后，北上抗日先遣队来到皖南苏区，方志敏同志指出这里离中心苏区太远，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要求把苏区转为游击区，并决定成立皖南独立团，有两个营，六个连、

约五、六百人，一个营是原来宁春生同志率领的游击大队改编的，另一个营是方志敏同志留下的一个侦察营，原营长熊刚，政委姓张。独立团成立以后，熊刚任团长，刘毓标任政委，受皖南特委领导，特委书记是王弼（也是方志敏同志留下的，原是赣东北省委组织部长，以后叛变），前任书记是李杰三。方志敏同志还规定了独立团行动的方针和任务：（一）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二）积极发展白区秘密工作；（三）进行抗日宣传。部队最初的行动主要是掩护以柯村为中心的苏区转为游击区，在柯村周围活动，也到过九华山、黄山边境进行活动。

几个月后，王弼叛变了，皖南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独立团失去了领导，于是决定到赣东北找省委，柯村根据地则留一个营由张政委负责，地方工作由宁春生同志领导，继续坚持对敌斗争。不久，宁春生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不幸牺牲。

四　新的游击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虽然敌人集中兵力向我赣东北苏区残酷“清剿”，可是在皖浙边一带一块一块的游击根据地象雨后春笋一样地蓬勃发展起来了，皖浙边一带早在大革命时期，即开始有我党的活动，我党曾领导群众进行过多次的革命斗争，在群众中影响很深。特别是北上抗日先遣队来到皖浙边一带以后，虽然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纪律严明和坚决抗日行动，给皖浙边一带人民群众留下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当我们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又转到皖浙边一带活动的时候，人民群众象对待自己亲人一样迎接我们，我们部队继续

发扬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这样与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皖浙边一带各游击根据地就这样在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同一目标下，逐步地建立发展起来。现将皖浙边一带几个主要的游击根据地的情况，分述于后：

贵（池）秋（浦）东（流）游击革命根据地

北上抗日先遣队到皖南后，江天辉同志根据方志敏同志的指示，带了一部分部队去同在谭家桥战争中失去联系的倪宝树部队取得联系，开展游击战争，两次找到倪部，都被敌人冲散，后在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间到达婺源岈嵧山遇到了在该地坚持游击战争的王丰庆、匡龙海部队。匡龙海告诉江天辉同志说：方志敏同志已经被俘了，我们已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应该立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行活动。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王丰庆、匡龙海、江天辉等即率部到达了贵（池）秋（浦）东（流）一带活动。此后，就与在该地区活动的江纵新、黄翠山、倪南山等及其所率领的武装取得了汇合，王丰庆、匡龙海、江天辉等就一方面派人到他们的部队中去，加强其部队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又派人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从此，就在贵（池）秋(浦)东(流)地区展开了游击战争。

同年四、五月间，为了掩护以浮梁之小源为中心的原游击区的群众，免受敌人的摧残，部队去都（昌）湖（口）波（阳）彭（泽）活动，在那里检查与布置了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中心县委的工作，随后部队又转向浮梁之小源，在去浮梁小源途中，路经祁门的倒湖，消灭了一个伪保安中队，缴长枪几十枝。到达小源时，那里已经完全为敌

人所占领，因此，我们在那里了解了一下情况，布置工作，就转到了祁门的鸡毛尖。

部队经过几次行动后，我们深感没有地方党与根据地，供给和安放伤员、情况等问题，都难以解决，就想创立新的根据地。于是王丰庆、匡龙海、江天辉、陈胖子等就在祁门的鸡毛尖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创立新根据地的问题，会上有人主张去婺源蛎崌山搞，有人主张去都（昌）湖（口）波（阳）彭（泽）搞，有人主张去贵（池）秋（浦）东（流）搞，最后王丰庆说：几个地方都好，都可以搞，以后根据情况变化再行决定。会后部队向婺源出发，在鄣公山的庙里又和周成龙汇合一处，周成龙坚持要找省委，部队进到德兴，无法过去，复返回蛎崌山，在这时就决定去贵（池）秋（浦）东（流）创立根据地。三五年六月在贵池高山部队就分开了，由匡龙海、田英带一部分人去蛎崌山创造根据地（匡到蛎崌山后，由于那里条件不成熟，他便转到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和田英同志在那里创造了一块游击区），周、王、江等人留贵（池）秋（浦）东（流）一带准备创建根据地。

为了很好的准备这次暴动，首先在党内成立了江边特委，王丰庆任书记，江天辉任组织部长（后调任贵（池）秋（浦）中心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姓余（后调东流县委书记），周成龙是省委代表，苏衡发（后叛变）为青年团书记。特委对暴动范围、政策等问题，曾作了多次研究，根据过去的经验，决定采取保留一部分秘密组织，不把秘密组织全部暴动。其次积极地进行组织群众工作，组织了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赤卫队、少先队等。

在军事上也采取了积极行动，部队迅速发展到七、八百人，成立了独立团。七月间我们在猪公岭打了一次接近根据

地的安徽保安团一个中队，缴获枪二十余枝。随即转至青阳与贵池交界处伏击，活捉了国民党安徽省宣传部长。八、九月间，我们又向殷家汇发动进攻，歼灭了殷家汇驻军一个保安中队，缴获枪四、五十枝，烧毁碉堡一个。由于军事行动中的节节胜利，大大地扩大了我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巩固了群众的胜利信心，从而加速了准备工作的进展。

一九三五年秋，以丁香树、高山、火龙坑等地为中心，波及七、八十里的贵（池）、秋（浦）、东（流）地区，正式地开始了暴动。成立了江边特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陈胖子曾任过苏维埃主席，江纵新任财政部长，倪南山作保卫工作，成立了特区总工会和青年团，并且分了地主的浮财及其房屋。

不久，敌人调集了几个团的兵力，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方针和碉堡政策，大举向根据地进攻。我们的部队在和敌人的几次作战中，由于采取了硬打的战略方针，部队受到一些损失，环境处于紧张，特委即召集会议，对当前形势作了讨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部队就向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去了一趟，同匡龙海交换了意见。回来后，在贵池小姓王家和敌人打了一仗，部队遭到重大损失，杨团长牺牲，情况更加严重。这时特委又召集会议（周成龙已离开去找省委了，以后无下落，东流姓余的书记已不见），会议决定：把部队分成两部分，王丰庆率领一部，组成江南游击总队，江天辉率领一部，组成江南游击大队。会议对撤出贵（池）秋（浦）东（流）根据地后的善后问题也作了讨论。

会后王丰庆率部先离开了贵（池）秋（浦）东（流）到鄣公山找到省委，江天辉同志在对根据地的医院以及部队所

储存的物资等问题作了处理后，也率部离开根据地，在鄣公岭会师，找到省委。

鄣公山游击革命根据地

刘毓标、熊刚所带领的皖南独立团，由于王弼的叛变，皖南特委遭受破坏。经与宁春生、张政委共同研究，决定宁、张带一个营在皖南继续坚持斗争，刘毓标、熊刚率领一个营前往赣东北找省委，经过了千辛万苦，终于在德兴广田山见到了关英同志，刘等汇报了皖南情况后，关英同志即谈苏区情况不管如何严重，他仍要坚持斗争，方志敏同志交代的任务是正确的，应该很快回去，以黄山为中心，展开皖南游击战争，但必须尽量避免打消耗战，尽量保存有生力量。于是刘、熊即在苏区精编了部队，补充了弹药、枪支，带了一百多人回到皖南。

刘毓标、熊刚部队回来时，经过婺源、浮梁、祁门、休宁四县交界的鄣公山、莒莙山、休宁石屋坑等地，看到这里地形险要，山大林密，群众条件又好，早期就有先进知识分子余玉堂在传播进步思想，并且有过红军活动的影响，因此就在这一带坚持活动。在群众中积极宣传我党我军宗旨，宣传穷富对立原因，号召大家只有革命，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抗捐抗税、反对抽丁，才能获得翻身。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于是就落下了脚。不久刘、熊又外出找到了张政委，那时他与宁春生（后来牺牲）已失去了联系，柯村苏区亦已失败，不能立足，于是部队即全部会师鄣公山，开展该地区组织工作，发展了党员，最早加入的有余玉堂、余同庆、张志成等人，在鄣公山、莒莙山、石屋坑三地建立了支部，而群众参加农民团、妇女会的就非常普遍了。同时，组织也逐步发展到鄣公山附近的白山、洪源及休宁石屋坑、里广山、里

庄、上、下大连等地，以后这里发展成为皖浙赣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根据地。

泾（县）旌（德）宁（国）宣（城）游击革命根据地

泾（县）旌（德）宁（国）宣（城）早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就有我党的组织活动，以后，大别山有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教书为名，在这一带活动。中共皖南工委、皖南特委也派有人在这一带活动过。一九三四年冬建立了中共泾县县委，潘茂彬为县委书记，徐世良为团县委书记。十二月由洪维恭带领了一个四枝枪的短枪队来泾县东北乡戴阳村活动，开始进行打土豪、分粮斗争，由于枪少子弹缺，只能打些小土豪，活动范围不大，目标亦小，敌人还不很注意。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抗日先遣队到泾县新峰地方，方志敏同志决定派李步新同志在泾县西南乡一带工作，经涂振农谈话，当时改名李荣华，发展和整顿了党的组织。一月后，泾县县委派交通来西乡带李到了东北乡戴阳村。一九三五年一月由老柯（又名吴介堂）、王晓南和王歧山（王歧山同志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十九师的团长，带一个排掩护红军主力转移，被敌人截断失去联系，到青阳找到老柯），带一个排部队和青阳县的一个游击队（在青阳九华山活动到敌人清剿不能站脚）共七、八十人到了泾县东北乡戴阳村。这时洪维恭召集李步新、老柯、王晓南、王歧山等开会。讨论当前敌人进攻形势和我们部队行动方针，决定成立泾(县)旌(德)宁（国）宣（城）中心县委，洪维恭同志为书记，李步新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晓南为宣传部长，储希文为秘书长，团中心县委书记李先进、老柯因腿害病，不能长途行动，决定仍回青阳去搞秘密工作。

匪军鲍刚四六旅一个营紧跟着后面追击，当时决定部队

向宁国、旌德方向行动，把敌人引到外面去，当晚即要行动，王歧山同志提出要配一个政治委员同他一块行动，这时，洪维恭决定李步新兼游击队政委，就在当晚出发，第二天清早打宣城溪口，消灭保安队一个分队，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枝，部队就向宁国、旌德方向活动，在大王山遭敌人袭击，李步新负伤，抬到太平黄花岭刘永寿家休养。部队继续向泾县西南乡又转到东北乡，就在这几个县和敌人打圈子，这时因为有了根据地，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人枪。

中心县委决定在这四县边区发展成为一个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部队分为三个中队（实际是三个排的兵力），王歧山带一中队（有一挺轻机枪），三中队在泾县、宣城一带活动，二中队（是原青阳游击队的基础）在宁国板桥一带活动。部队行动任务是：打击地主保安队，打击敌人便衣队，宣传组织群众，打土豪筹款。地方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抗租、抗捐、抗税，反对抽壮丁，组织农会、妇女会、青年团、自卫队（任务是捉敌人的便衣），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保甲制度虽然未宣布取消，实际为农会所代替了，群众拿保甲长路条还可以到城镇去买东西。

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由于苏承平、徐世良叛变投敌，破坏了太平、泾县一部分党的组织，带敌人向泾县戴阳村根据地进攻，七月间，洪维恭同志遭敌人袭击不幸牺牲。八月间王歧山同志率领部队在宣城大小麦坑与敌作战又不幸牺牲。中心县委由王晓南代理书记，部队继续坚持在这地区斗争。但是王晓南、储希文已经腐化，各搞一个女人，把打土豪的钱掴在自己腰里，不发部队经费。不积极领导部队行动。这时部队意见很多，地方干部思想比较混乱。

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李步新在泾县西南乡活动，派人找

到部队关系，即回到部队。开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部队对王晓南意见很多，地方干部思想混乱，徐世良的叛变，对泾县东乡情况熟悉，天天带敌人进攻，破坏地方组织，有些干部动摇叛变，问题感到十分严重，真是“内忧外患”之苦。为此我们当时采取的方针，首先是从团结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部队教育，主动团结地方干部。加强地方干部思想教育，关心爱护部队，要提高警惕，全党团结，只有地方干部和部队的团结一致，才能积极打击敌人，坚持斗争。经过这样处理与教育之后，关系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时王晓南提出不担任中心县委书记，经讨论决定李步新为中共中心县委书记，王晓南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储希文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团中心县委李先进为书记。党委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决定部队积极向外出击，打击徐世良所带的“清剿”部队，经过几次战斗，打击了敌人，缴获枪枝一部。

这时根据地扩大了范围：泾县的戴阳村黄头岭、蔡村坝、丁溪、漕溪、涌溪、榆桃岭、乌雀岭一带地区；旌德的大王山、十一都、三溪；宣城的大小麦坑、禾村、青龙山；宁国的板桥等地。横直约一百余华里。此外在泾县西南乡的水东、翟万村、小河口、麻岭、茂林、后岸王家山一带亦有党的秘密组织，群众斗争情绪亦高涨起来了。

中心县委决定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动员一批工农青壮年参加红军，把三个中队充实起来，经过动员参军，这时部队已发展到二百余人。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敌人向我中心地区大举进攻，国民党调来七十八师和四十五旅，把根据地包围起来，实行分进合击，对群众采取烧房子，捕捉群众带走，损失很大。中心

县委秘书长储希文被敌人捉去，当即叛变，秘密写信勾通王晓南叛变，企图包围歼灭我一、三中队未成。这时形势更加严重了，地方组织和干部，由于王、储叛变投敌，很快遭到破坏。

因为洪维恭、王岐山等同志牺牲，又失掉了上级领导，因此我们决定部队回赣东北苏区去找省委，同时避免部队损失，迅速突出敌人包围，大家一条心，部队就从涌溪出发，经过旌德、太平、石埭、黟县到休宁西乡鄣公山脚下里庄找到省委。

此外，在开（化）婺（源）休（宁）一带，还有赵礼生（又名曹立森）、丘老金等同志，带领一部分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另有倪宝树、李伯钧二人所带的部队，经不起艰苦环境斗争的考验，对革命抱有失败的情绪。因此，在敌人的清剿下，先后投敌，变成可耻的叛徒。

五　鄣公山会师，省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关英同志来到鄣公山，这时，赣东北苏区已经转为艰苦的游击战争，关英同志带了五个人（邵长河也在）在里广山见到了刘毓标同志，急于了解皖浙赣各游击根据地分散坚持的情况，感到必须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因此积极派人，派部队前往各地联系寻找，刘毓标同志也带部队去各处行动，以便与各地取得联系。

这时各地游击队大部因为在敌人清剿下，或是内部发生

了重大的叛变事件或因策略上没有明确的转变，大都先后撤离了根据地，并寻找领导。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撤出贵（池）秋（浦）东（流）根据地前往赣东北寻找省委的王丰庆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间到达鄣公山。二月间，在泾（县）旌（德）宁（国）宣（城）坚持的李步新同志率部在休宁里庄见到了刘毓标同志，找到了省委。不久，江天辉同志率部也在鄣公山找上了省委。在这以前，关英同志还找到了余金德，余熙庆、滕荣国等人，先后在鄣公山会合。在鄣公山会合以后，省委为了统一和加强各个根据地的党的领导，结束一年多来的分散坚持斗争的局面，于一九三六年四月间在鄣公山召开了皖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如下事项：

（一）对当前政治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讨论和决定了当时整个边区的工作方针任务，当时总的工作方针任务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大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为巩固与扩大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根据地而斗争。

（二）讨论了有关各种政策问题。

（三）决定成立皖浙赣独立团。

（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当时发展形势和具体情况，决定划分为五个特委。大会结束，省委开会讨论，决定扩大省委组成人员，通知各特委书记。据我们所知道的，关英同志仍为省委书记，唐在刚、余金德、刘毓标、李步新、江天辉、滕国荣、邵长河、王丰庆等为省委委员。

独立团成立和几个主要战斗情况

在省委扩大会议不久，即在水岚山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布皖浙赣独立团的成立。任命熊刚为团长，刘毓标兼政治委员，邵长河兼政治处主任，下辖三个营，以原皖南独立团为

基础，编为一、二两个营，各地调来的游击队，编为三营，共约八百余人，机枪十余挺。除独立团为边区主力部队外，各地仍留少数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当时省委决定独立团的任务是：积极到鄣公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外线，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随时随地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开展抗日宣传，筹集经费。

一九三六年秋，熊刚、刘毓标同志率领独立团向皖南和浙西北一带行动，七月转战到开化附近，侦知县城空虚，仅驻有伪保安团两个中队，战斗力较弱，同时这一带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即于七月七日拂晓，一举攻入开化县城，当场打死伪军中队长，被伤俘的一百余人，缴获机枪六挺，步枪一百多支，子弹无数。并捣毁县衙门，释放全部犯人。在开化县城逗留四小时后，继即回师婺源、经裔官、三坑至沱口，沿途乘胜摧毁碉堡及联防办事处数十个，俘保丁数人。

行至沱川月岭附近，俘伪电话兵二名，得知伪四十六旅二个连将从清华街开往沱川，即于沱川月岭组织伏击，一举击溃伪军二个连于月岭脚下，当场打死打伤伪军三十余人，大部为我俘虏，缴获机枪四挺，步枪一百余枝，子弹无数，剩下一小部伪军，沿水沟夹着尾巴逃回清华街。战后我独立团即迹回鄣公山休整。

休整后，独立团复向休宁方向行动，从休宁西乡、溪口转到汪村的途中，碰到一个邮差，得知驻休宁伪四十六旅一股伪军出动，经侦察了解情况后，即选择平鼻岭组织伏击，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乘其无备，猛扑下去，迅即解决战斗，生俘伪连副一名，打死打伤伪军很多，缴获枪枝七、八十枝。

由于独立团几次战斗的胜利，群情振奋，部队战斗力大

为提高，而伪保安团队闻风丧胆，不敢出来骚扰，即当时伪军之主力四十六旅，也不敢轻易行动。

省委根据这一斗争形势，一面指出，独立团在战斗胜利中必须防止骄傲和麻痹轻敌思想的发生，一面指示独立团要到更远一些地区去开展游击活动，扩大声势。一九三六年九月间，独立团即续向青阳、泾县、宁国、宣城、昌化等一带行动。

由于省委的正确领导，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独立团和各地红军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取得胜利，以及广泛深入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开辟了不少新的地区，边区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建立五个特委和发展地方武装

省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继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决定将边区划分五个特委：（1）在赣东北地区以德兴为中心，包括乐平、浮梁、婺源、上饶、横峰、弋阳、贵溪、余江、万年等县建立赣东北特委，余金德为书记；（2）以祁门为中心，包括休宁、婺源、浮梁、都昌、波阳、湖口、彭泽等地区为皖赣特委，王丰庆为书记，朱步新为副书记；（3）泾县、宣城、宁国、于潜、昌化、孝丰、郎溪、广德等一带地区为上浙皖特委，邵长河为书记；（4）淳安、遂安、歙县一带地区为下浙皖特委，何英为书记；（5）开化、婺源之东南及休宁一带地区为开婺休特委，赵礼生（又名曹立森）为书记，并派余熙庆在该地区指导工作。各地特委领导下又都建立了几个中心县委。如当时皖赣特委下设有四个中心县委：1.祁（门）婺（源）休（宁）中心县委，李步新兼书记；2.祁（门）浮（梁）婺（源）中心县委，江天辉兼书记；3.浮（梁）乐（平）婺（源）中心县委，老肖任书记；

4.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中心县委，田英任书记。在中心县委之下设县委区委组织。边区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除边区独立团外，每个特委都有一独立营，一般有两个连，准备发展为三个连，每个连都有一、二挺机枪及花筒手提枪。每个中心县委也有游击大队或游击队，每个县委有游击队或短枪队（大都是便衣活动）。根据地内，各地农民团、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象雨后春笋一样建立与发展起来。各地并在重点地区，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与培养，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加强党对根据地各项建设的领导和各种政策的转变

在省委领导下，对于边区党的建设，武装建设，文化工作，特别是在执行政策上的某些转变，都是有很大成绩的，这些直接关系到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1）军事上，我们的部队是在为了完成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的三大任务及广泛开展原根据地以外的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游击根据地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战斗和一切工作的。

皖浙赣独立团成立后，便采取了规模较大的行动，并狠狠地打击了当时的主要敌人（独立四十六旅）。在战术上主要的是采取奇袭，远距离的奔袭（如打开化、昌化县城）、伏击（如月岭和平鼻战斗）和速决的办法。

在作群众工作方面，部队中除了有足够的宣传员作宣传组织群众外，部队每到一地人人都自觉自动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我们许多新区工作，差不多都是首先经过部队的行动，向群众进行宣传，然后留下工作人员再进行组织工作搞起来的。如上、下浙皖特委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部队作群众工作除了宣传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实际行动和严明的群众纪

律。不论部队怎样苦，决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即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东西（如：油、盐、粮食和日用品）而群众又不在家的情况下，我们也得写好条子并将钱钞包好放在实物的原处。另外部队还经常帮助和掩护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抗债和反对抽壮丁等斗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的部队仍然坚持贯彻了党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与政治委员制度。团有总支部，连队有支部，政治委员不仅独立团营以上都有，而且各个独立连也有。因此，部队的政治工作都是以党支部为核心，根据每一时期的政治任务，部队思想情况来进行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主要内容有：阶级教育、时事与革命前途教育、政策教育（主要是俘虏政策，没收政策和对保甲长政策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官兵平等艰苦奋斗以及党员标准教育……等。其方式是：环境许可时召集会议作报告，一般情况下由营政委或连政指作简短讲话，有时则采取上课方式，另外还采取编印小调、歌曲（如打开化、昌化县后就编印了两支歌子）散发给部队和根据地群众，在较大的行动和战斗后，即时总结作战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进行表扬与批评。同时部队中一直坚持着党的生活制度，只要有时间，就召开小组会，进行政治思想和工作的检讨。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工作，便保证了部队顺利地完成任务。部队也得到了巩固和很大的发展。整个皖浙赣地区的部队由千余人发展到近三千人。

（2）根据不同情况和条件，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和活动方法。

以积极的军事行动作掩护，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向穷苦群众深入宣传我党主张和政策。然后有对象地进行个

觉串连教育。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活动，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主要是农民团、妇女会），再后，将经过革命斗争严格考验的同志发展为党团员，建立支部，扎下革命根子。在赤白交界区或在敌人占领的情况下，则教育群众采用“白皮红心”的政策，以应付敌人，但要坚定革命立场，不许破坏革命。

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抗租抗息和抗税反对抽壮丁的斗争。红军所到之处，虽然没有分田地，但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群众向豪绅地主进行抗租抗息抗税斗争，并以红军的军事威力，迫使豪绅地主实行这种政策，不许他们危害群众和进行破坏活动。此外在敌人抓壮丁的时候，领导群众反对抓壮丁的斗争，并警告抓壮丁的反动保长，不准他们胡作胡为。这样群众就靠向我们，我们就慢慢的在群众中站隐了脚根。

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实行打击首恶分子，争取中间力量，便利发动群众的政策。对于保甲长采取教育为主，打击其中个别坏的。教育争取大多数为我工作，允许他们做两面派，他们就为我们搞情报，给我们代购一些一般群众难以办到的东西；有时也掩护我们同志进行秘密工作。对于土豪除民愤很大有直接血债的予以镇压外，一般不杀，采取筹款办法，土豪为了生命安全，不得不接受罚款，和我们所提出的不打击报复群众、不进行破坏等条件，这样有的土豪就不大敢乱动了。对于城市商人（如香菇商、茶商、寮纸商、瓷土商……）允许他们来山区做生意，商人只要有利可图，就愿为我们打听消息，买些书报、文具、药品及其他的用品，但不准他们进行任何破坏活动。

（3）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发展党的工作，注意政治上的纯洁，不论部队和地方发展党员时，要具备三个条件：1.成分出身好；2.社会关系好；3.须经过革命斗争的长期考察。这种严格要求，就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战斗性。

加强党的教育，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地方和部队的党组织都能抓紧时间积极进行党章教育，党员须知教育，并注意党的活动（如党小组会、支部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保证党的团结与行动一致，并把及时反映当地政治情况作为支部生活重要内容之一，这样，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反映到党支部来，地方党组织就赶来报告我们。

培养提高党的干部。省委在莒蓉山开办有短期的干部训练班，每期二十人，时间五天。在环境好的时候，特委一般都办有短期训练班，如祁（门）浮（梁）婺（源）中心县委就在祁门办了训练班，在内容上，主要是教育干部加强群众观点，关心群众利益，紧紧地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并加强内部团结，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4）随着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不断的胜利，不论是部队和群众的文化娱乐都是非常活跃的，部队和群众编写出很多的歌子，现在可以搜集起来的有几十首，有的歌颂红军的胜利，有的歌颂苏维埃的幸福生活，有的号召人民向敌人作斗争。每当部队休息，同志们便打开嗓子唱起歌来，或者唱黄梅戏。在根据地每个角落里，都可以听到这种雄壮的欢乐的歌声。

妇女们要求解放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对妇女文化教育是非常注意的。她们参加妇女会，就要求学文化、学政治、学唱歌，特别是妇女解放歌，在根据地是普遍流行的。山间有些妇女不懂我们的话，就要求学普通话，通过这些学习，广

大妇女的思想觉悟提高了。

对儿童教育也是很注意的。红军每到一地，儿童们就如同自己亲人一样的接近，要红军讲革命打仗的故事给他们听，我们就抓住儿童们这种纯朴的心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儿童们进行教育，告诉他：什么是坏人，什么人是好人的区别，见到匪军不要乱讲，儿童们就这样受到教育。国民党匪军想利用儿童，买点糖果给儿童吃，骗他们，想从儿童口里探得我军情况，那是不容易办到的。

六　西安事变后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国民党反动派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军队和将领的反对。西安事变正说明了全国人民对抗日的强烈要求，也是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直接回答。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省委召开了会议，对当时的形势与任务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当时省委对时局的估计是基本正确的，省委一致认为在新的形势面前，必须积极寻找党中央的关系，只有得到党中央的及时指示，才能更好的掌握方向，才能避免在政治上犯大错误。但是当时对蒋介石对南方根据地实行残酷“清剿”这一形势估计不足。因此省委决定独立团离开根据地到浙西南找刘英同志（估计刘英同志那里可能还有电台与中央联系），与此同时，各特委和其领导下的独立营仍然继续坚持各根据地的游击活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不仅不接受我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对南方根据地的进攻，而且变本

加厉地集结了大量兵力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进攻，在我区周围就调集了十几个正规师和三省保安团及地方武装（当时国民党的驻军情况如：八十八师驻开化、五十五师驻歙县、一百九十二师和独立四十六旅驻屯溪、休宁、祁门一带，九十三师驻贵池、六十六师驻东流、至德，独立四十六旅驻婺源，浙江保安团两个团驻遂安、开化、安徽一个保安团驻太平，十六师和江西保安团三个团驻乐平、浮梁、婺源，刘建绪别动大队驻浮梁瑶里等）以刘建绪为皖浙闽赣四省“清剿”总指挥，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对根据地人民实行“移民并村”和“自首”政策。

为了应付敌人的“移民并村”，我们一面发动群众“在山靠山吃，下山没饭吃”与敌人进行斗争，如果敌人强迫群众到万一不能抵抗时，为了避免群众遭受重大损失，同意小村群众暂时并到大村去。一面我们也作些准备工作，群众卖给我们不少的粮食，我们把粮食分散埋藏在山区各处，还准备一部分干菜，准备长期坚持。

敌人“移民并村”的办法是很毒辣的，把所有山棚拆光烧光，将分散的小村庄的群众强迫并入大村庄，周围做起木城围住，并设关卡看管封锁，不准群众带出任何东西，然后将小村庄的房屋，锅灶等全部毁掉，不让我们有停脚之处，到处设立明堡暗哨，寻找红军踪迹，清山烧山，乱放冷枪，造成白色恐怖，以此来割断红军和根据地群众的联系，妄图把我军饿死、冻死在山上。

在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以前，党员、群众曾向我们反映这个情况，并请示办法。我们估计敌人这次“清割”比以往更加毒辣，但认为山区土特产很丰富（如香菇、茶叶、毛竹、木材……），如果敌人实行“移民并村”办法，不许

群众上山生产，任其荒芜，固然会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豪绅地主的直接利益损失更大，群众为了生活，长期不上山种庄稼，也是不行的，因而估计这个办法不能长期实行下去，而对“移民并村”的长期性、艰苦性则有些估计不够。

我们部队一面留些少数人在中心区坚持，与群众保持联系，与群众共生死同患难，使群众感到有希望，有靠山。一面把部队转到外线去行动，在敌人的空虚地带，积极加强武装活动，牵制敌人，并积极开辟工作。同时我们在各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条件好的地方保存了一部分粮食。

虽然，我们有了粮食准备，但数量终久是有限的，过了一定时间以后，粮食吃光了，就只好吃野菜，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有红芹、蕨萁苗、红菇、野洋姜等。没有火柴，我们用火镰刀和火石，打火石必须用纸引火，后来没有纸，就想办法用艾绒引火。没有烟吃，我们用树叶卷起来代替吃。敌人把山棚拆光、烧光了，我们在山区没有房住，就自己搭棚子住，有时敌人剿山，把搭的棚子又烧掉了，我们就随地临时搭棚子住，敌人把锅子都搞光了，我们就用洋瓷盆做饭吃。不论怎样的困难，我们都有信心坚持和克服的。

“移民并村”以后，根据地群众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与我们取得联系，尽力支援我们，如借口上山砍柴、妇女看娘家等名义给我们送信，运送粮食、医药、火柴、黄烟等日用品。我们没有粮食吃群众经常把上山砍柴时带的饭省给我们吃，到处设法替我们找野草、野菜吃。祁门县有个群众名叫土老（汪振丰同志），红军游击队一来到祁（门）浮（梁）婺（源）以后，他就跟着红军跑，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移民并村”后，土老坚决跟着我们走，他把一家搬到几十里以外的山角里住下来，我们吃带壳的谷子，需要石磨子，

他把一个小村子里群众没有带走的石磨，一盘一盘地翻了几个山坡背回来给我们用。每当吃一种新的野菜时，他总是抢先尝尝，会不会毒死人。土老始终是和我们一起坚持到最后胜利。我们就是这样依靠群众，战胜了种种困难的。

在这非常复杂而又非常艰苦的岁月里，千千万万的革命同志不屈不挠的斗争着。翻遍了无数的丛山峻岭和无人走过的羊肠小道，甚至走到无路的地方就自己开辟道路前进。漫山遍野到处都有我们的脚迹！到处都有我们革命烈士和革命者洒下的鲜血。

这时国民党用来“清剿”我根据地的刘建绪部队，正大量集结在浙赣边境，以优势兵力围剿我游击队，正在这时关英同志带几人和独立团正逐步向浙西南伸展，在浙江开化碰到国民党正规部队，便陷入敌人包围圈，我独立团受到严重损失，省委关英同志和独立团长熊刚同志被冲散，团政委刘毓标同志被俘入狱。

自从“移民并村”以来，国民党对我根据地的全面封锁，一天紧似一天，各根据地的游击活动，处于相当困难境地，上浙皖和下浙皖地区的游击队遭到敌人包围，受到很大损失，组织受到破坏，何英和苏宏发被俘叛变，邵长河同志冲散后失去联系。这时皖赣革命根据地亦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受到严重损失，同省委失去联系，粮食也发生了严重困难。四月间独立营由王丰庆率领和余金德部队会师，打乐平鸣山后，即被敌人十六师包围，王丰庆同志被俘，仅杨汗生政委带十余人及机枪一挺冲破敌人重重包围，回到祁（门）浮（梁）婺（源）根据地。由于张志成（原为景德镇秘密交通）叛变，敌人将张解到景德镇，破坏了景德镇党的组织，王丰庆亦同时被解到景德镇；后来又到浮（梁）乐（平）婺

（源）根据地（此时王丰庆乘机逃出），但是由于目标暴露，后来浮（梁）乐（平）婺（源）地区受到很大破坏。在这个问题上王丰庆同志是有错误的。

七　部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我们和国民党的谈判是如何开始的呢？自"七七"事变爆发了全面对日抗战，"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又进攻上海，国民党南京政府撤退逃到武汉。这时围攻我根据地主力调走了，我们部队就出击敌人，积极行动，敌人没有力量对付我们，他们就利用叛徒来搞我们，想通过叛徒诱骗我们下山，企图缴我们械。因为我们保持着高度警惕，粉碎了敌人这一阴谋，打击了叛徒可耻行为。国民党被迫派人来与我们进行谈判。这时特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利用和谈的机会，积极派人出去找部队联系，取得中央指示。当时南昌正在成立新四军办事处，陈毅、项英同志给我们送来"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收到不久，特委发表了"告皖赣同胞书"。此时刘毓标同志被刘建绪释放回来，也带来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这时，我们才开始正式与国民党谈判，驻浮梁瑶里别动队大队长张参议也被迫来找我们谈判，我们当时向国民党提出：谈判条件应由中央统一决定，在未得中央统一规定前，要求他们履行下列条件：

1.准许我们通行无阻，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

2.停止向我进攻，撤退根据地周围驻军，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恢复群众生产自由；

3.释放一切政治犯；

4.我们不打土豪是可以的，但要负责解决我们部队的供

给问题。

根据当时情况，皖赣特委决定派李步新、江天辉两同志为代表到南昌去找陈毅、项英同志的关系，请示当时党的方针政策，从瑶里出发，经婺源，在婺源我们向国民党县政府交涉释放了些同志。这时驻婺源伪剿总刘建绪侄子（伪团长）向我们提出，要我们写信调部队下山改编，当遭我们严正的驳斥和拒绝。到南昌找到了陈毅、项英同志的住处，这时陈毅同志到湘赣边联系部队去了，不在家，在我们未见到陈毅同志以前，国民党省保安团司令还要想利用陈毅不在南昌的机会，欺骗我们说：项、陈已留言，叫我们写信回去叫部队到景德镇集中改编，当场被我们严词拒绝。

不几天，陈毅同志到南昌，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他完全同意我们的警惕性，并介绍了闽南游击队在谈判过程中被骗缴械的教训。这时陈毅同志和李步新、江天辉同志一同来到祁门石灰山，陈毅同志给我们指示和勉励，要我们迅速将部队集中进行整编，加强政治教育。不久，我们将根据地原皖浙赣独立团熊刚所带领的部队和阙怀仰所带领的一支部队，共约五十余人，一挺机枪；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杨汗生所带领的独立营和活动在祁门、浮梁、婺源一带的游击队一百五十余人，二挺机枪；田英同志带领的在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一带活动的游击队一百五十余人。上述各地部队共三百余人，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

一九三八年一月，特委再次派李步新、杨汗生等同志到南昌参加会议，汇报了部队的联系和集中的情况及与各地党组织联系的情况。经项英同志指示，为了继续联系皖浙赣边区一带尚未联系上的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将皖赣特委改为皖

浙赣省委。会议结束后，陈毅同志再次同李步新、杨汗生等同志来到浮梁瑶里，中央并派来陈时夫、朱辉、李华楷、张振东（又名张福前）、刘玉林和袁大鹏等九同志到边区工作。陈毅同志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并召开会议，对王丰庆被俘后所犯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和处理，撤换了王丰庆皖赣特委书记的职务，同时宣布成立皖浙赣省委，以李步新同志为书记，委员有江天辉、陈时夫、朱辉、熊刚等同志。

省委为了处理部队改编后若干善后事宜（如安置残废人员、联络我红军烈军属等），经研究决定：在瑶里设立留守处，李华楷同志为主任，党内是祁（门）浮（梁）婺（源）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江天辉同志当时任书记，江调走后，李为书记。在都昌设立了留守处，田英同志任留守处主任（负责领导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地区党的工作），以后国民党背信弃义，派伪军包围我留守处，田英等同志英勇牺牲。在景德镇市设立"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朱辉同志任主任（党内负责联络指导各地党的工作）。

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这时部队已扩展到五百余人，三挺机枪，二百多枝长枪，三、四十枝短枪）全部集中瑶里，在瑶里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群众杀猪宰羊欢送。会后，除留下一部分短枪队和工作人员计百余人外，其余部队均开往岩寺，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

从此，我们这一支曾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队伍，走上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

刘　英

远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任务。

中共中央鉴于当时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亡国灭种的条约接踵而来，不仅及时的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战胜日寇，不驱逐日寇出中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极端困难与残酷的五次围剿中，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实行对日直接作战，故虽处在极端严重的情势中，特别是残酷的五次围剿中，本着为国忠诚、忍痛牺牲的精神，以前线主力红军中抽调红七军团为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实行它北上抗日的任务。另方面，通电号召国内外男女同胞、各党派、各阶层、各友军、各地各级党政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和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高举鲜红旗帜而行动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全体将士，本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党的事业，抱着英勇

而又顽强的斗争精神，遂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出发，实行它郑重而又光荣的北上抗日任务。正因为红七军团在行动上、政治上表明了自己的先进与抗日模范的先锋作用，它不仅冲破了南京政府首席顾问赛克特的堡垒政策，而且给了尾追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的军队以严厉的打击，它得到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军队及各阶层的先进人士热烈的同情与拥护，同样的它得到世界先进人士的同情和赞许。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对日作抗直接的先锋队，它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业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与永垂不朽的声誉。

这正如洛甫同志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论文中所指出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自它产生之日起，直到今天，始终为了民族的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的奋斗着，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动，以及它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然而它总是向着这个总的目标前扑后继的进行与奋斗着"。

中共中央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一)党中央与军委会派遣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根基地；红七军团应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切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以及广大先进的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在七军团肩上放着郑重与光荣的军事政治任务，(关于军事任务详作战命令)而且政治的任务是更加重大。因此先遣队必须在党的彻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民众进行各种各色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

（三）高举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而行动的七军团应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的表现着自己是有组织的英勇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应该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坚忍不拔的意志及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去告诉和指示最广大的劳苦工农群众，怎样才能够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四）如果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分割或对立起来，将是极端的错误。七军团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该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五）为着保证七军团肩上的伟大的政治与军事任务的完成，必须最高度的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觉悟性与政治水平；提高与巩固部队的纪律，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作严格斗争；应该不倦怠的进行吸收积极的革命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及在胜利的作战之中，扩大自己的部队。并由中央代表及军政首长组织军团革命军委处理一切政治与军事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内外形势变动与它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环境中，它总是面着这个总的目标前扑后继的进行与奋斗着。而且它处在当时极端残酷的五次围剿中，始终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不屈不挠与艰难困苦的奋斗。

北上抗日的经过及几次主要战斗的检讨：

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团军，忠诚的接受了

中共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所给予它的北上抗日任务之后，便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在万民欢呼的护送中，开始了它北上抗日的行动，经长汀、清流，占领大田县，继向闽清前进，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城，胜利的到达闽东游击区域，分驻于连江县属的桃源之线。经数日的休息，整理与动员后，则面福州城进拔，这一行动的主要意义，是为了进一步的号召，全国友党友军各阶层的先进人士，一致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配合主力红军反抗敌人五次围剿。但由于先遣队本身存在着某些的弱点与当时所处环境的关系，围攻福州的战斗经三昼夜之久。终于自动的退出战斗而回师闽东游击区域，整顿本身与加强闽东党及闽东独立师党政军的领导，特别是检讨了闽东过去的工作与给予今后工作的指示。

围攻福州的战斗自动撤退后，经一礼拜的整理与训练，则攻占罗源县城与袭击宁德县，另方面分兵占领西洋镇与木洋镇，继行经梅溪、下庄，一举而攻克浙江属之庆元县城。翌日与浙保三、四两团遭遇于竹口，由于先遣队全体将士英勇善战及指挥上的灵活，经数小时猛烈的攻击，卒将凭险抵抗浙保两团打得溃不成军，使蒋志英（浙保副处长）不得不深夜逃窜龙泉城。是役缴获迫击炮两门，机关十余挺，长短枪四百余支。活捉庆元县长×××。当日进至小梅镇宿营，翌日本可乘胜进占龙泉县与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打击尾追先队之四十九师。但由于军团首长战斗意志的不够坚强，进至龙泉八都镇经党溪，经忠信街与四十九师接触，此时极大多数指战员作战情绪非常高涨，且有闽北苏区的依靠。但由于军团首长不愿作战，终于是日进驻闽北浦城县属之古楼休息与整理部队三天，另方面给了闽北党工作上的指示。

事后接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责成中央代表与军团首长派遣得力的游击部队在闽浙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号召与组织广大人民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另方面应以极大的力量去破坏浙赣铁路，以使先遣队任务顺利的完成。除由先遣队留落一个营于该地长期行动外，主力经江山县属之廿八都仙霞岭石门而进占清湖镇，并派出两个营分途的破坏浙赣铁路，继则集中主力攻克常山城，缴获颇多，并得很多军用品。继经浙江边界之白沙关童家坊，石人殿而进驻重溪，除检讨了先遣队由瑞金出发至闽浙赣苏区时，党政军及居民工作外，则以全力整顿补充与训练自已的部队属，及解决七军团几个主要干部间某些无原则的纠纷，特别是关于叛徒曾洪易对先遣部队不负责，及毫无作战决心的机会主义动摇的倾向，加以彻底揭发，同样的指出了军团首长对于中央及军委命令的执行表现不重视之态度与失去自己战斗信心之表现，是极端错误的。越数日，中央及军委责成闽浙赣省委负责人，红十军团之领导者，中共的优秀干部，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组织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并且布置捍卫闽浙赣苏区之工作。经闽浙赣省委几个负责者及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会商后，除布置闽浙赣边党政军及群众工作外，当时对于各方面主要干部的配备是：闽浙赣省委主要负责者曾洪易，组织部长关英同志，青年兼宣传部胡仰山，先遣队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原七军团改为十九师，十军团改为廿及廿一师，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兼主任聂鸿钧、参谋长王如痴；廿师师长、政治委员则由军团长、政治委员兼任；廿一师师长胡天桃。各级干部配备就绪，闽浙赣苏区反抗敌人五次围剿的计划，布置完毕后，十九师仍

为先遣队，军团政治部亦随十九师行动。经怀玉山及德兴县之东北，深夜兼程的袭击了常山县，但因敌情变动，经芳村而到达白马，当日所得的情报，蒋志英率浙保两团业已尾追，于是遂决意给其严厉的打击，由于十九师英勇善战，蒋志英败退回常山，我先头部队尾追至芳村，蒋志英手部受伤，是役缴获颇多。于是经上坊，渡过新安江向分水县前进，距分水县城约四十里之处，与补充王旅遭遇，经先遣队猛烈的冲击后，将敌全部击溃。但因敌情与任务的关系进至河村，距徽州府仅十里处通过，该城当时只有驻兵一连，沿途群众纷纷请求先遣队打徽州，但因部队过于疲劳，且预计敌人增援部队可能赶上，于是经绩溪县附近一举而攻占旌德县，缴获军用品及西药颇多。翌日，经大坟与泾县宣城之间威胁芜湖，后得军委及军团首长命令，要十九师（即红七军团）回师黄山附近与主力汇合，于是经青戈江、章家渡、茂林、铜岭太平县附近，在新村与主力汇合，并经中央批准以方志敏、乐少华、刘畴西、涂振农、刘英五同志组织政治委员会，以方志敏同志为书记，该会职权是闽浙赣皖及先遣队行动区域中党政军最高的领导机关，另方面重新的配备了团以上干部，一切问题布置就绪后，经黄山到达古竹溪，翌日经汤口黄山脚抵谭家桥宿营，是日所得的情报：南京政府为防范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以及所谓籍以“避免国际纠纷和听闻起见”派遣了五个正式师、两个独立旅，另浙皖保安团四个团，采取“煮头燃箕，自残同种”，以及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政策，企图一举而扑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对方的布置：两师另一旅和两个团沿京芜铁道向徽

州前进，一个师及补充王旅则经南陵、泾县、太平，沿汽车路向黄山前进，另两师两团则经青阳、石台向祁门、黟县前进。当时政委会讨论的结果，认为左右两翼之敌则以皖南独立师及游击队迷路与牵制它，主力突破敌人中央纵队，同时左右两翼之敌靠得很拢，中央纵队之主力在八时内不能赶上前卫队——补充王旅。且补充王旅经我军于分水县附近击溃后，不仅士气很坏，部队的疲劳现象亦很普遍；另方面，在分水县附近作战时，低我十九师与之对抗，尚能击溃不能成军，在此我们以三师之众来攻疲倦溃败的独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且地形，群众条件及士气亦利于我军作战，若中央纵队被我突破，则集结主力配合皖南地方武装及独立师打击与消灭敌人之右纵队。翌晨一时半出发，离谭家桥十里之处布置埋伏侧击战斗，当时我军部署的布置大略如下：

随军教导团附地雷换丝炮队，在正西沿马路两旁布置适当的地雷与换丝炮，如未发现我主力埋伏于两旁，直待敌人进入火网内，才采取一致的动作给敌人极大的杀伤；否则需待主力打响后，才从正面动作，十九师埋伏于左翼侧的第一线，主要的任务是：正面或廿师或廿一师打响后，十九师应以全力截断敌人的归路；另方面如敌人向太平县溃退时，十九师应以主力尾追该敌，廿师、廿一师则集结于十九师的右翼。他的任务是：如敌人向正面前进而未发现我主力时，直到我正面部队接触与沿马路之地雷换丝炮爆发后，廿一师则同时出击消灭敌人于黄山脚附近。当我部队布置完毕后，约上午十时的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用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部队走火三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

立即集结部队，并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此时我廿师及廿一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结果十九师只用兵力一个连，廿师及廿一师由于野战经验太差，动作又不一致，而影响整个的战局，这一十分有把握消灭补充王旅的战斗，竟形成对持的战局。特别是在此次战争中，极大部分的主要干部负伤与阵亡，如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即前七军团军团长）负伤，但伤过重，经数日后光荣的牺牲了，政治主任刘英同志亦负重伤，乐同志因愤主要干部负伤过多，竟带保卫队一排人向敌人反攻而胸负伤。廿一师政委负伤，师长阵亡，军团保卫局长周群同志亦于分水之役负伤截去右脚。正因为如此，致谭家桥战斗后，全军党政军的工作而处于停顿的状态，以致作战的意志大为削弱，特别是×××同志作战决心的不果断，军事行动的迟慢，致引起极大多数的红色指战员非常不满，甚至有痛哭军团长不愿战的表现和议论。兹将此次战斗如何不能争取胜利，其主要原因特作如下的概括：

（一）轻敌的观念：当时在部队中是普遍的现象，认为补充王旅不经一击的部队，不是我们的敌手，以至骄傲自痺和轻敌，这是兵法上说的“骄兵必败”的教训。

（二）动作不一致，尤其是不服从军团号令致遭敌各个击破，这证明服从命令听指挥是革命军队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否则不但不能战胜敌人，而且会吃亏以至于自我灭亡。

（三）当敌人业已占领主要阵地，且我主力已退出战斗，凭着几个干部一时的热情反突击，这不但不能解决战斗，同时自身的损失是不该的，当时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的负伤与阵亡，大部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遭受损失。

（四）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在红军中政治工作条例里业已指出了它的重要性。但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虽然当时军团政治部有聂××同志代理主任，涂××同志为副主任，然而当时对部队中的政治文化教育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特别是没有抓紧谭家桥战斗的经验与教训，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服工作和动员工作，致使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士气一天天的低落，这将为历史上的教训。

谭家桥战斗后，经陶村附近，翌日与敌人一团人遭遇，本可一举而消灭其全部，由于军团长加油式的用兵（先用一营，打不过再用一营）。结果，不但未能将敌人迅速的消灭，反而遭受到诸多不应有的损失，以致影响战士们的不满和士气的降低，此时引起了许多负伤的干部从担架上跳下来，要求率领战士们一同奋勇杀敌之举动。但由于主要负责者没有作战的决心，终于自动退出战斗，当晚商讨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和指示。当时中央及军委给先遣队的命令和指示是：

1.先遣队应立即克服和纠正没有作战决心和斗志的倾向，特别是要从党的工作与政治教育上去着手，否则中央和军委给予先遣队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2.先遣队应派一个得力师，酌量的派遣工作人员与适当的配备干部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号召与组织广大的人民一致进入抗日阵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民众，改善民生，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部队，一直到创立革命的根据地，同时应与中央军委及政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络。

3.除充实皖南独立师外，应留两团以上兵力依靠皖南党与群众的力量，坚持该地的斗争与不断的号召和团结一切反日反帝的力量在自己的周围，作继续不断的坚持斗争。

4.其余的部队回闽浙赣原来的基本地区整顿休息，提高

部队中战斗情绪与加强部队中党与政治工作，坚决而又顽强的保卫革命根据地。

5.中央及军委责成政委在部队中开展由上而下的不愿在白区行动与缺乏作战意志的斗争。提高全体指战员胜利的信心与表扬应有的自我批评。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从党的工作与政治教育着手，使先遣队迅速的克服和纠正今天存在着的不良现象与倾向，而特别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与战斗中来表明自己是先进的有组织的，守纪律的、抗日反帝与土地革命斗争的模范者、号召者与组织者。

当时接到中央与军委指示之后，讨论时有两个争论：甲、大部分同志主张立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分头出动，粟、刘到浙行动；方志敏同志等回浙闽赣基本地区；乐少华、刘畴西等同志率一师留皖南行动，其余部队随方同志回基本地区。乙、少数同志主张暂不分开，统回闽浙赣基本地区，将部队整理、提炼与重新配备干部后，再行分开。由于军团首长坚持后一意见，结果抛弃了第一方案，同意了第二个意见，这是不该的。

翌日二时出发后，计划昼夜兼程的进至化、婺、德苏区（即开化、婺源、德兴之间的一块苏区）但由于军团首长认为敌人追赶不上，应该两天行程到达目的地，结果未按照原来计划，而直到上午十时左右才开始出发，当日我先头部队已进至化、婺、德苏区（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等主要干部随先头部队行动）但刘畴西、王如痴等同志竟迟甚翌日午后才到。此时我先头部队除派人与之联络外，并由方志敏同志以政委会负责人的名义，通知刘畴西等同志本日必须通过乐、常封锁线（即乐平、常山是也）。至午后三时我先头部队将要通过封锁线时，接刘畴西同志来信，略谓“部队疲

倦，本日不能继续前进”。此时方同志接到刘畴西同志来信后，即召集了几个主要干部会商，认为敌人的主力很可能追上，如今晚不进至基本地区，对今后任务的完成当遭到不少的损失；另方面，认为刘畴西同志那种“屎出不找茅厕”的作风非派一得力干部前往，协助主力通过乐、常封锁线，必然会发生诸多的困难。于是，首先决定粟裕同志回去随刘畴西同志一起行动（因乐少华、刘英二同志此时伤势尚重，不能随军行动）。后因志敏同志坚持自己随主力行动，要粟裕同志率领先头部队进入基本地区，同时明晚可以汇合；另方面，方同志指示前卫部队，明晚配合地方武装掩护主力通过乐、常线。于是粟、刘、乐三同志随前卫部队行动，志同敏志回去随主力行动。翌晨，我先头部队全部到达基本地区，除通知志敏同志我们业已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外，并根据其指示布置掩护工作，不料主力到达封锁线后，闻敌人堡垒枪声复又折回，且来电告诉我们，明日另走一封锁线通过。谁知数日未闻主力消息，于是除派遣大批当地干部通过封锁线并迎接主力外，并派遣游击部队分头出动，骚扰敌人。后据逃回来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指主力）曾经接连的通过七次封锁线，始终由于决心的犹豫，竟将全部折回。结果，化、婺、德的苏区日益缩小，粮食根本无法再找，有的饿了三天未食粒米，有的吃草根树叶，但战士们始终规劝高级首长，应不顾一切牺牲的冲过封锁线。但由于军团首长决心的不够和认敌封锁线是铜墙铁壁，竟宣布有本事的各多少自找方向出动。可是由于时间的延长，不仅敌人主力全部赶到，且将皖浙赣之保安团队亦集中封锁线之周围，以致敌人使用包围战术，逐渐缩小基地，且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特别对粮食的烧毁更尽其能事。这样一来，将近万人的部队，围困

于荒山僻野间，且又各自为政的毫无中心主张，试问将何以能战胜当时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呢？

当先遣部队进至化、婺、德苏区时，敌以十师之众围攻半月之久，除某些干部（如李素宾、李素、王天龙、钱××等同志）坚决的率领部属，突破敌人重围，回到皖南（有的回到闽浙）配合独立师（当时皖南独立师师长区龙海）和地方武装坚强的继续行动外，极大部分遭到惨痛的损失。当敌将要解围时，方志敏同志在广大民众拥护和爱戴之下依然无恙。不料方同志特务班长叛变，竟向敌告密而遭被捕（方同志被捕后受尽了一切非人道的拷打、辱骂与各种各色卑污无耻的欺骗和利诱，然而方同志本着"头可断而志不可屈"的精神，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与痛骂民族败类不已。他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精神，严正的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卒和民族的败类。他在任何严厉监视与非人道的污辱中，始终站在民族英雄的立场之上，指示与告诉广大的人民，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不致灭亡，中国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与出路。他处在极端的困难的囹圄中，对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始终念念不忘。他在牢狱里不断的指示闽浙赣的党及全体将士和广大的人民应如何坚持斗争，和继续不断的号召与组织全中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先进人士一致的进入抗日民族阵线，同时，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民族危机，争取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方同志虽遭不幸的屠杀与光荣的牺牲了，然其伟大的人格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方同志的损失不仅是我党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

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于化、婺、德遭到惨痛的损失之后，当时所处的环境异常险恶，不但敌人集中全力，企图一

举而扑灭我闽浙赣边区基地，而且叛徒曾洪易亦乘机活动，他主张放弃原来的基本地区，逃往闽北秘密；他以苏区食粮困难迫使战士回家，遭受痛心的屠杀；他以“共产党应以身作则”的口号，强迫党的干部回到反动的家乡去送死；他以自卫队，游击队不会作战，且暴露目标的荒谬怪论解散成千成万的红军后备军；他在党内外散播先遣队遭受惨痛损失的失败情绪和所谓闽浙赣基本地区无法保卫的荒唐言论；他对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与决议，一贯的怀疑与不坚决的执行。他是一个退却逃跑，对革命没有信心对上级的决议与指示一贯的不坚决执行的典型人物。他对于错误的接受，一贯的是采取口是心非两面派的态度。当时中央东南分局认为叛徒曾洪易已形成他自己的退却逃跑路线，责成政治委员会及闽浙赣省委开展反曾洪易为首机会主义斗争，并撤消他原来的一切职务，另方面要叛徒曾洪易向党申明和真正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待乐少华、刘英、涂振农、粟裕等同志进至闽浙赣基本地区时，闽浙省委在叛徒曾洪易的把持之下，不但没有撤消叛徒曾洪易的职务和开展斗争，反而以先遣队受损失为名，向党反攻。洪易路线的健将，亦极力赞助叛徒曾洪易。此时因乐、刘两同志伤势尚重，粟同志需要顾及部队，于是要涂××同志代表政委的意见去说服省委以及其他干部，坚决的执行中央分局的指示，开展反曾洪易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不料涂同志此行不但无效，反遭曾洪易、××等责骂不已。翌日，乐、刘、涂、粟诸同志到达省委所在地，并派人找关英同志回来（因当时关某同志出外巡视工作去了），另方面分别的说服了几位同志，于是接连的与叛徒曾洪易等作了三昼夜的思想斗争，并 改 组 省 委与重新配备干部。另方面要叛徒曾洪易在实际工作中去了解和认识自己错误的实质及

其严重性，同时认真的克服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接着得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电，要闽浙省委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

一九四〇年夏于皖南

编　　后

为了更好地研究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我们选编了这册资料。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是方志敏同志在敌人囹圄中写成的。最近我们在档案部门发现了这份珍贵的文献，特选上以飨读者。此外，还选辑了当年在闽浙皖赣根据地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一些老同志，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撰写的一些文稿（大多未公开发表过）。这些文稿对研究我党的历史是可贵的参考资料。方志纯同志的两篇文稿，是近年新作，在写作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作者当年在赣东北根据地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提供的材料是十分有价值的。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坚持保留原稿的本来面目，只在个别地方作了适当的文字修饰。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的张伊、唐志全、杨树标、周声柱同志，此外还有聂成根、高景春同志。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统一书号：7110·303
定　　价：0.52 元